

顾问委员会

总顾问 曾培炎

顾 问 董建华 蒋正华 唐家璇 徐匡迪

资深专家委员会

中国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春正	王伟光	王洛林	厉以宁	宁吉喆	冯国经	卢中原
许宪春	刘遵义	刘世锦	刘克崮	刘 伟	朱 民	李毅中
李德水	李若谷	吴敬琏	张国宝	张晓强	张大卫	张 祥
张卓元	陈 元	林毅夫	林兆木	周文重	高尚全	海 闻
钱颖一	郭树清	辜胜阻	聂振邦	楼继伟	樊 纲	魏建国
戴相龙						

国际专家

亨利·基辛格 / Henry Kissinger
傅强恩 / John Frisbie
欧伦斯 / Stephen A. Orlins
约翰·桑顿 / John Thornton
郑永年

康睿哲 / Richard Constant
约翰·奈斯比特 / John Naisbitt
杰弗里·萨克斯 / Jeffrey Sachs
马克·乌赞 / Marc Uzan

编委会

主 任 魏礼群

副主任 郑新立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一鸣	王晓红	牛铁航	吕 政	谷源洋	朱晓明	李晓西
李向阳	陈永杰	张宇燕	张燕生	张蕴岭	杨圣明	冼国明
施子海	隆国强	常修泽	徐洪才	裴长洪	霍建国	

主 编：郑新立

副主编：王晓红 牛铁航

• 本刊专论 •

设计的进化与面向未来的中国创新设计 路甬祥(005)

中国发展方式: 机制、挑战与建议 宋晓梧 陶 然(014)

• 宏观经济 •

经济增长中的风险与对策 韩永文(030)

创新应对重大环境事件思维 推动环保战略转型 杨朝飞(042)

化解过剩产能的思路与出路
——兼论推动东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 陈文玲(053)

• 国际经济 •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拉动因素: 东道国面板数据分析
张碧琼 李 论(064)

打造中国 - 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的远景与突破 匡贤明 何冬妮(078)

• 区域发展 •

打造浙江经济升级版的路径 黄 勇 潘毅刚 江振林(087)

• 案例研究 •

大型工程承包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探讨
——以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拓展非洲业务为例 朱 杰(098)

• 新书推介 •

一部推动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力作

——评析张祥、张健著《机遇与挑战：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 王晓红(108)

• 智库信息 •

加快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

——第三届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民间高层论坛综述 徐洪才(111)

• 权威观点 •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119)

• 国际统计数据 •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125)

• 英文摘要(ABSTRACTS) •

(133)

“铁的新四军”红色记忆·经典美术作品展征稿通知

(136)

2014年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暨1984年莫干山会议30周年纪念

征文启事

(封二)



CONTENTS

The Evolution of Design and the Future-oriented Chinese Innovative Design	<i>Lu Yongxiang</i> (005)
The Present Development Pattern of China: Mechanism, Challenges, and Recommendations	<i>Song Xiaowu and Tao Ran</i> (014)
Risks in Economic Growth and Countermeasures	<i>Han Yongwen</i> (030)
Create New Thinking of Tackling Important Environment Events,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trategy	<i>Yang Chaofei</i> (042)
Thinking and Solutions of Resolving the Excess Production Capacity: Promote Industrial Transfer from the East to the West	<i>Chen Wenling</i> (053)
Pull Factors of the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of Chinese Enterprises: An Analysis of Host Countries Panel Data	<i>Zhang Biqiong and Li Lun</i> (064)
Prospects and Breakthroughs of Creating Upgraded China-ASEAN FTA	<i>Kuang Xianming and He Dongni</i> (078)
The Way to Forging the Updated Version of Zhejiang Economy	<i>Huang Yong, Pan Yigang, and Jiang Zhenlin</i> (087)
Large-scale Engineering Contracting Enterprises to Implement the “Going Out” Strategy: An Example of the Business of Sinohydro Group Ltd. in Africa	<i>Zhu Jie</i> (098)
An Outstanding Book Promoting Chinese Enterprises’ Cross-border Merger & Acquisitions: A Review of Opportunity and Challenge: Chinese Enterprises’ Cross-border Merger & Acquisitions by Zhang Xiang and Zhang Jian	<i>Wang Xiaohong</i> (108)
Accelerating the China-Japan-Korea FTA Negotiation: A Summary of the Third High-level Forum on China-Japan-Korea FTA	<i>Xu Hongcai</i> (111)
Opinions of International Authoritative Institutes	(119)
Main Indicators of World Economy	(125)

设计的进化与面向未来的中国创新设计

路甬祥

摘要：设计是人类对有目的创造创新活动的预先设想、计划和策划，是具有创意的系统综合集成的创新创造。设计创造推动社会文明进步，设计也随着文明进化而发展进化，设计的价值理念、方法技术、人才团队等，也不断持续进化。经过 30 余年的改革开放、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快速发展，中国已成为举世公认的制造大国，但还不是设计创造强国。提升中国创新设计能力，必须将创新设计列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设计 进化 创新 战略

作者简介：路甬祥，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中国机械工程学会荣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原院长，第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设计是人类对有目的创造创新活动的预先设想、计划和策划，是具有创意的系统综合集成的创新创造。设计也是将信息知识和技术创意转化为产品、工艺装备、经营服务的先导和准备，并决定着制造和服务的价值，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环节。认知设计进化历程，展望知识网络时代的未来，对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创造强国跨越，建设创新型国家意义重大。

一、文明的进化

人类与其他动物最本质的区别是能够思维和创造，人类在劳动中设计创造了工具，

创造了物质文明和多样文化并不断发展进化。人类社会文明进化的基础和核心是生产力的进化和变革。生产力的进化和变革，推动社会经济形态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并引领生活方式、价值文化、社会结构和治理方式、人与自然关系的进化。而构成生产力的基本要素是：资源能源和材料、工具装备、掌握知识技能的人才和人力资源。设计创造尤其工具装备的设计创造，是信息知识和技术创意转化为生产力的关键环节，在人类文明特别是在生产力和经济形态发展进化中，发挥着基础和关键作用。正是工具装备的创新和资源利用方式的进步，推动了人类从农耕自然经济经过工业经济向知识网络经济进化。

人类依靠利用自然资源制作简单工具，创造形成了延绵几千年，以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为代表，以农业和手工业为特征的自然经济和各具特色的多源农耕文明。人们开发利用矿产资源，创造了以现代能源动力、机械化及工厂化制造、现代运载通讯等技术创新为主导，以机器大生产为特征的现代工业文明和多样文化传承与发展。始于上世纪中叶的半导体、集成电路、计算机、因特网等电子信息技术创新和应用，使人类进入了以信息化、数字化、机械电子一体化为特征的后工业时代，并开启了人类知识网络文明的序幕。纵观人类社会文明进化史，从原始蛮荒时代、农耕文明时代进化到工业文明时代，今天已经步入了主要依靠信息、知识大数据，依靠人的创意创造创新，通过全球网络设计制造和服务，实现以绿色低碳、科学智能、全球共创分享、可持续发展为特征的知识网络文明时代（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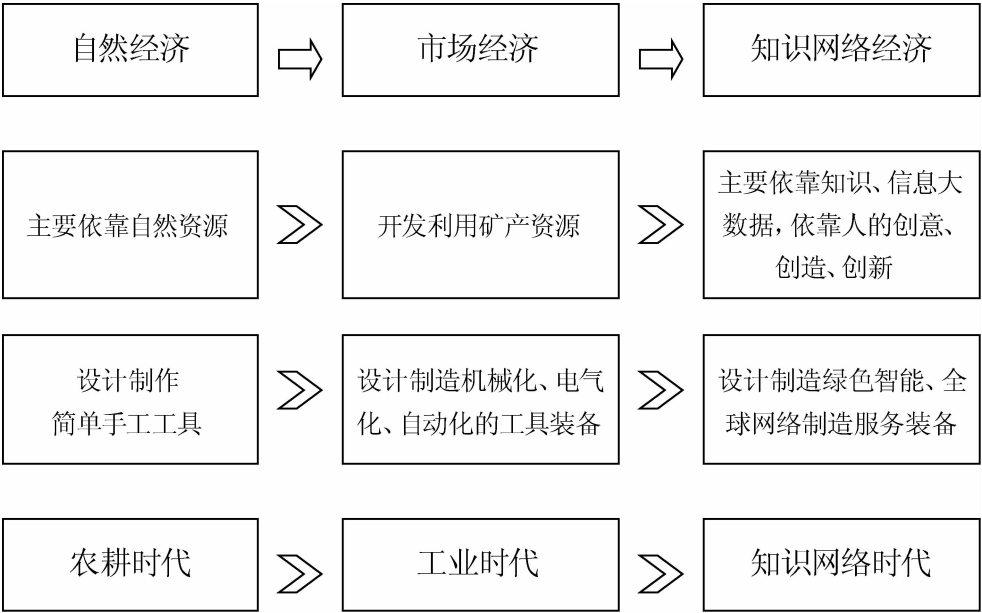


图 1 文明的进化——从农耕时代到知识网络时代

二、设计的进化

设计是人类对有目的创造创新活动的预先设想、计划和策划，是具有创意的系统综合集成创新创造。农耕时代的设计和手工业制造，适应农业自然经济和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经济、社会、军事、宗教及文化等需求，创造发展了农耕文明。工业时代的设计发明和创造，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导致了机械化、电气化、电子化、自动化，实现了生产力的大飞跃，适应和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多样需求，创造了现代工业文明。今天和未来的设计创新，将适应和引领知识网络时代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需求，促进引发新产业革命，将导致网络化、智能化、绿色低碳、全球共创分享、可持续发展。

面向制造服务的设计，致力于创新资源能源和新材料开发利用，致力于创新交通运输载、制造装备、信息通讯、农业生物、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金融商业、生态环保、公共与国家安全等装备与服务，设计还创造宜居环境和美好生活。上世纪 20 年代兴起的工业设计，倡导技术、艺术、经济的结合，实现功能与形态、性状与价格的优化，提升产品价值和竞争力。

设计创造推动社会文明进步，设计也随着文明进化而发展进化。设计的价值理念、方法技术、人才团队等，也不断持续进化。设计是制造服务的先导和关键环节，它决定了产品的功能品质和全生命周期的经济、社会、文化及生态价值。设计创新产品、工具装备、制造方式、经营服务，不仅创造和提升价值，提升企业品牌信誉和市场竞争力，还可以创造引领新的市场和社会需求。设计不仅推动着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革，标志着物质文明进化的程度，也承载反映了社会精神文化进化的水平。设计创造美好生活、创造美好未来，促进引领着人类文明持续发展的进程。探究设计进化的历史，对于认知设计进化发展的规律，展望设计进化的未来，提升中国设计创造能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跨越，建设创新型国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不同领域设计的进化

1. 动力系统设计的进化。农耕时代，主要设计利用人畜力和水、风等为原动力的简单机械动力装置。工业时代，人们设计创造了蒸汽机、水轮机、汽轮机、电动机、内燃机、燃气轮机、喷气发动机、风力涡轮机等动力系统。知识网络时代，人们将致力于设计创造绿色低碳、智能高效，具有可再生、可回收、可存储、可控制、可分配、自适应、分布式等特征的能源和动力系统。

2. 设计利用材料的进化。农耕时代，主要直接利用或简单加工土石、竹木、帛麻丝、皮革等天然材料。工业时代，人们开发利用钢铁和有色合金、无机非金属、有机合成与

高分子等多样性能优良的结构材料和复合材料,以及光电子、微电子等先进功能材料等。知识网络时代,将依靠设计创造超常智能结构功能材料、绿色可再生环境友好材料、纳米和低维结构功能材料、生物和仿生材料等。

3. 设计利用资源能源的进化。农耕时代,主要依靠土壤、阳光、水、动植物等自然资源,依靠人畜力和薪柴、水力、风力等天然能源。工业时代,主要依靠开发利用金属、非金属等矿产资源,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火电、水电、核能等集中规模化发电的电力系统。知识网络时代,将转向主要依靠信息知识大数据和人的创造力,实现金属、非金属、生物质等物质资源的清洁高效、循环持续利用,以依靠水力、风力、太阳能、生物质、海洋能、地热等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等清洁智能可持续能源为主的体系。

4. 交通运载设计的进化。农耕时代,利用天然土路、水道,设计营造路桥、驿道、栈道、索道、运河等,主要依靠步行和人畜、风力、车舟等交通运输方式。工业时代,人们设计发展了公路、铁路、缆车索道、桥隧、运河、高速公路、油气管道、传送带、海洋及空中航道等交通网络,发明并设计创造出蒸汽、内燃、电力驱动的汽车、火车、轮船、飞机、运载火箭等现代运载工具。知识网络时代,人们将设计创新发展高速公路、高速轨道、陆海空天等全球综合智能交通物流网络体系。

5. 农业与生物技术产业设计的进化。农耕时代,主要依靠土地、阳光和水等自然资源,依靠简单手工工具进行渔猎、种植、养殖和农产品简单手工作坊加工等生产方式。工业时代,人们致力发展优良品种及农药、农肥等农业生产资料,设计建设水利灌溉等基础设施,设计制造农业机械,提高农业生物技术产业的生产力。知识网络时代,将发展先进农业生物技术,依托网络和信息大数据,发展农业与生物技术产业云服务体系,设计创造绿色、智能农业生物技术设施和服务体系,发展生态高效农业和生物产业。

6. 制造方式设计的进化。农耕时代,人们使用简单工具,依靠家庭作坊和手工业工场方式,设计与手工艺制作紧密结合、融为一体。工业时代,发展进化为工厂化、专业化、批量化、自动化和数字化的柔性制造方式,设计与制造分离,设计工程师成为专门职业。设计服务并服从于制造,设计必须考虑制造的可能性。知识网络时代,将发展进化为依托网络和信息大数据的全球绿色、智能制造与服务方式,设计与制造重新融合。制造者、用户、行销、运行服务者乃至第三方皆可共同参与。3D 打印等技术创新,使得凡是能创意设计出来的,几乎都能够被制造出来,设计将变得更加自由。

7. 信息通讯设计的进化。农耕时代,主要利用结绳、刻痕、算盘等手工记事或计算,依靠烽火台、信使、驿站等通信手段,传递信息量少、存储能力和传输速率低、传播距

离短、分享程度低。工业时代，依靠邮路、电报、电话、数字、无线、铜缆、光缆、蜂窝网、GPS、GIS、因特网、物联网等信息基础设施，发展形成数字网络，快捷海量。从点到点，发展到IP协议包传输等。但在控制领域，仍局限于单机局域信息和人工智能。知识网络时代，依靠无处、无时不在的无线宽带互联网、物联网和智能终端等更先进的信息基础设施，将发展成为全球智能、安全可靠的无线宽带，共创分享、多样无限的大数据，云计算、云储存和云服务系统。

8. 生态与人居环境设计的进化。农耕时代，主要利用天然材料，设计建造民居、道路、寺庙、宫殿、园林、村落、城镇等，人的生存发展方式和自然生态环境总体和谐。工业时代，利用混凝土等人造建筑材料，规划设计建造现代城市住宅、公共建筑、公园绿地和基础设施等，形成现代城市。由于生产力快速发展，利用、开发、征服自然的观念滋长，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知识网络时代，保护修复生态环境，创造宜居环境，发展以绿色低碳、智慧和谐为特征的城镇化成为目标，生态环境和全球气候变化倍受关注，保护修复生产环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成为设计师的基本伦理和设计的基本原则。

9. 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设计的进化。农耕时代，从原始公社经过氏族社会、奴隶社会，进化为封建国家的社会治理，取决于国家制度设计进化和公众参与方式，但总体以封闭性、局限性、保守性为特征。工业时代，进化为以市场经济为基础，民主法治的社会管理，以制度化、社会化、专业化、信息化为特征。知识网络时代，将发展进化为高度依托网络与知识信息大数据，更加自由民主、更加公平法治、更加智慧和谐的社会管理，进化为以更加科学民主、公平公正、普惠高效为特征的管理与服务。

10. 公共和国家安全设计的进化。农耕时代，主要关注领土、主权、财产、统治权的安全，主要依靠人力和冷兵器、城堡、沟壕等防御工事攻防。工业时代，更加关注经济安全、资源能源安全、食品药品安全、信息安全、公共与公民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等，发展进化为以机械化、装甲化、信息化及兵员和火力投送、制海空天能力等为主要标志的现代化。知识网络时代，信息网络安全成为公共与国家安全的核心和关键环节，综合国力、制度与执行力、科技创新能力、公共与国防安全基础设施和信息、海洋空天攻防能力等成为关键和战略制高点。

（二）设计价值理念、方法技术、人才团队的进化

1. 设计价值理念的进化。农耕时代的设计，模仿自然，注重实用功能，崇尚自然美，契合社会伦理，创造成就了农耕文明。工业时代的设计，注重功能效率，主张设计为了人，强调技艺结合，发展人机功能学，适应工业化、标准化、模块化生产，追求性价比，

适应市场竞争需求,创造品牌价值,注重保护生态环境,创造了工业文明。知识网络时代的设计,融合科学技术、经济社会、人文艺术、生态环境等知识信息大数据,注重创意创造创新,更加重视用户体验,追求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综合价值,重视全球网络协同设计,追求绿色低碳、科学智慧、共创分享、可持续发展,将创造知识文明。

2. 设计方法技术的进化。农耕时代的设计,主要靠手工方法,只使用简单工具。工业时代的设计,发展了计算、平面、透视、三维等设计技法,及测绘、建模、实验、仿真、CAD/CAE/CAPP 等方法,使用数据库、设计工具、计算机和软件、数字-物理仿真、2D/3D 打印设备等。知识网络时代的设计,依靠知识和信息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3D 打印等,实现全球网络协同设计,发展超级计算、超级存储、3D+X 演示与打印等云计算、云服务等网络设计工具软件和协同设计平台。

3. 设计人才团队的进化。农耕时代的设计者,主要凭借个人天赋、爱好、学习、训练和经验,依靠家庭和师徒传承,工匠即设计师。工业时代的设计师与团队,依靠学校培养训练掌握知识基础,需要技术及艺术的结合与团队合作,出现专业设计师、专业设计团队、设计公司、设计学科、设计学院、学会协会等。知识网络时代的设计师,更需要科学技术、经济社会、人文艺术、生态环境等多方面的知识和多学科交叉融合,以及多样人才团队的协同与合作。基于网络大数据、云计算、云服务、3D+X 打印等开放共享环境,使得人人可以参与设计,人人可以成为设计师。

(三) 设计进化中值得思考的问题

1. 为什么历时数千年的农耕时代的传统设计,却未能导致社会生产力的根本变革?农耕时代的传统设计,关注服装、器皿、傢俬、礼器、兵器等实用功能和形式美。由于材料和加工能力等的局限,只能利用人力与畜力,小规模利用水力和风力,没能在能源动力方面取得突破。虽然在选用材料方面,从天然土石、竹木、纤维、皮革进化发展到制作陶瓷、玻璃、青铜、铁器等,但始终没能在材料科学和冶金技术、能源利用和动力机械设计制造等方面取得创新突破。农耕时代更没能在高效、精密工具装备设计制造方面取得突破。

2. 是哪类现代设计导致了第一次工业革命?钢铁冶金装备的现代设计与发明,为机械化、工业化提供了大规模优质金属材料的基础。是蒸汽机设计与发明实现了能源动力的变革,金属切削机床、纺织机械等工具装备和工作机械的设计与发明,突破了机械化、工业化制造,火车、轮船等的设计与发明导致了交通运输能力的飞跃,等等。由此,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使英国崛起成为日不落帝国,也使人类进入以蒸汽为动力的机械化、工厂化、规模化生产为标志的工业时代。

3. 设计怎样创造美好生活？怎样推进、引领了工业时代的文明进步？工业时代人们创造利用性能优异的合金、水泥、玻璃、陶瓷、高分子和复合材料等，设计创造了动力机械、现代运载工具与交通基础设施、现代通信工具与网络设施、科学仪器与测试设备、高效精密数控机床、先进医疗保健设备、金融商务机器、质优价廉的生活用品等，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的多样需要，提高了工作效率，改善了生活品质。同时，人们不断创新设计理念与方法，设计创造了风格功能各异、优美舒适、环境宜人的建筑与城镇规划。上世纪 20 年代兴起的工业设计，注重运用工程学、美学和经济学原理，优化工业产品设计，满足用户的物质和精神需要，提升产品价值和竞争力。正是发明与创造、设计与创新，推动引领了工业文明的进程，创造了幸福美好生活。

4. 怎样的创新设计，将可能推进、引领知识网络时代的新产业革命、发展方式转型、人类文明持续发展的进程？未来创新设计与智能制造将导致新的产业革命。如果说，工业时代的现代设计主要基于物理环境，全球知识网络时代的创新设计将基于全球信息网络和物理环境。未来的创新设计，将导致绿色、智能、超常、全球、网络协同、个性化及定制式创造与智造，将创造全新的网络智能产品、工艺装备、网络智造和新的经营服务方式；未来的设计制造，将超越数字减材与增材、无机与有机、理化与生物的界限，将创造清洁、分布式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可持续能源体系与智能能源和电网系统。

人类文明和设计的进化可以综合为图 2 所示。可以将农耕时代的传统设计表征为“设计 1.0”，工业时代的现代设计表征为“设计 2.0”，全球知识网络时代的创新设计表征为“设计 3.0”。与之相应，诞生于工业时代的“工业设计 1.0”，自然也将进化为全球知识网络时代的“工业设计 2.0”。它们将伴随着全球网络及科学技术、经济社会、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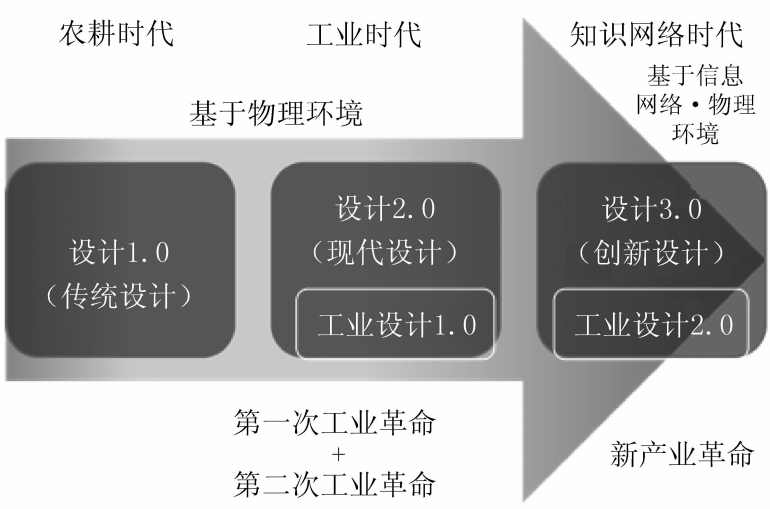


图 2 设计的进化：从传统设计 - 现代设计 - 创新设计

艺术、生态环境等信息知识大数据等创新发展，设计价值理念、方法技术、创新设计人才团队和合作方式也将持续进化发展。

三、面向未来的中国创新设计

经过 30 余年的改革开放、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快速发展，2013 年，中国制造已占全球制造的 20% 以上，居世界首位。中国制造不仅为 13 亿中国人民，也为全世界提供了物美价廉的多样产品，中国已成为举世公认的制造大国。嫦娥奔月、北斗导航、蛟龙深潜、航母入列、高铁成网、大运升空、超超高压直流输电投运等，标志着中国重大工程装备系统集成创新和设计制造能力已居国际前列。

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多数中国制造企业自主设计创新能力弱，多以 OEM 和跟踪模仿为主，制造服务的附加值低，仍处于全球制造产业链的中低端；高端数控机床、集成电路、民航客机、航空发动机、科学与医疗仪器、高端基础关键零部件等，仍严重依赖进口；中国自主设计创造并引领世界的重要产品、高端制造装备、经营服务模式少；因自主创新设计创造的国际著名品牌、国际著名企业少。中国还不是设计创造强国。由美国引发并波及全球的经济衰退和艰难复苏，必将加速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进程。奥巴马在今年国情咨文中提出“要使下一次制造革命在美国发生”；德国推进以网络智能技术创新为核心的“工业 4.0”；日本重点发展协同机器人和无人化工厂，提升竞争力。随着发达国家回归实体经济，以及资源、能源和人力资源等要素成本的上升，中国制造将面临发达国家重振高端制造和新兴发展中国家低成本制造竞争的双重挑战。中国自然秉赋人均资源储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粗放发展又付出了巨大资源环境代价，资源能源对外依赖程度逐年上升。生态环境约束加剧，水、土壤、大气污染严重。过度依赖要素投入、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传统粗放发展方式难以为继。未来十年将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发展方式转型，提升发展质量效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迎接新产业革命的机遇和挑战，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关键时期。

创新设计将促进引领全球知识网络时代的创意创新创造，将提升个人、企业和国家的想象力、创造力、创新竞争力和绿色智能、科学和谐、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将引导促进原始创新、关键技术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基础上的自主系统集成创新、管理制度创新，将创意创新创造引领世界的产品、工艺、装备、经营服务模式。创新设计将引领创造绿色低碳、智能中国制造，创造绿色低碳、网络智能的中国制造产品和制造服务方式；创造清洁、可再生能源新装备和安全、坚强、智能的电网体系；创造绿色低碳、智能高效的资源、环保、农业装备和技术支撑体系；创造绿色快捷、安全舒适的运载工具和交通

物流系统；创造网络智能的金融商业、医疗教育等商业及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创造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公共与国家安全装备和技术支撑体系。

提升中国创新设计能力，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将创新设计列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制订实施创新设计战略行动十年计划和路线图，增加国家、企业、社会对创新设计的投入。国家着重支持与创新设计制造相关的基础前沿和共性技术研究及开发，着力支持信息知识大数据和云计算、云服务，构建一批各具特色的创新设计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和 CAD/CAE/CAPP、3D 打印等网络公共技术支撑服务平台。

第二，完善鼓励扶持创新设计的相关政策。保护知识产权，设立创新设计基金，鼓励引导金融投资机构投资创新设计与相关产业，支持、鼓励企业重视和增加对创新设计与研发的投入，促进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创新设计联盟，着力提升重点领域的创新设计能力。扶持设计“创客”的创新和创业，支持小微设计企业发展，培育若干创新设计引领发展的国际著名企业。支持设立创新设计园区和专业设计网站、网络，促进形成设计人才和设计产业的集聚区，建设在区域和国际有影响力的设计园区、国际创新设计之都。

第三，发挥好设计学术、行业组织、产业联盟的作用。促进学术、技术交流培训合作，奖励优秀设计和人才团队，举办设计展览和论坛，促进多种形式的国际设计交流合作，引进国际优秀创新设计人才和先进设计企业。

第四，设计必须从娃娃抓起。从幼儿园开始培育鼓励青少年探索求知、设计创造的意识 and 能力。改革创新设计教育，促进学科交叉融合，促进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着力培育提升创意、创造和创新能力，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创新设计职业和继续教育体系。

第五，必须充分发挥媒体作用。通过开辟创新设计专栏和栏目，宣传“中国好设计”案例等。在全社会普及创新设计理念和方法，提升创新设计文化自觉和自信，在全社会创造重视、支持、鼓励创新设计的良好文化氛围。

责任编辑：李 蕊

中国发展方式：机制、挑战与建议

宋晓梧 陶 然

摘要：改革开放 30 多年，中国通过一系列的政策组合，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中国模式”与“东亚模式”有相似之处，也各有其特点。中国在改革过程中，由于各种制度因素的影响，导致了地方政府过度追求 GDP 增长，对经济、社会、环境和生态都带来了负面影响。针对中国当前发展方式，本文提出了六点改革建议。

关键词：发展方式 东亚模式 竞争 改革

作者简介：宋晓梧，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顾问、常务理事；

陶 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过去近 30 年，中国的经济转轨与高速增长引起国际关注，并日益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许多政策分析者试图根据中国经验，寻求具有创新性的发展思路和可行性的政策组合。其中一位研究者拉莫十年前就宣称，“中国模式”已经出现（Ramo，2004）。据他所述，中国的成功是建立在一系列政策组合之上，包括强调研发、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平等，以及政府在协调国家内部发展和参与全球化方面所扮演的积极角色。2005 年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也得出了相似结论（World Bank，2005），虽然不太情愿，这份报告仍然承认了“华盛顿共识”的终结。该报告放弃了过去世行报告中有关“公认的最佳政策实践和资源配置效率”的讨论，转而研究“增长战略”问题，比如政府产业政策的作用等，并举出了中国和其他高增长亚洲国家的例子。尽管所谓“北京共识”把中国的发

展经验过度简单化了（Huang，2011），但这种讨论提出了如下问题：中国过去的发展经验，能不能用一个内部逻辑一致的框架去理解？如果可以，什么是其主要支柱？政府积极干预是中国经验的重要部分吗？它有没有副作用？

过去 30 年，中国一直沿袭一条类似，但又不完全等同于“东亚模式”的道路。一方面，政府都追求经济增长，其中重要手段是抑制消费并刺激投资，为了弥补疲软的国内市场需求，又强力推动产品出口。在整个高增长时期，政府利用一系列政策工具来影响和塑造增长环境，包括对特定产业进行支持、税收返还、出口退税、技术创新补贴和放宽外企市场准入限制等等。无论东亚四小龙经济体，还是中国最近 20 年来的发展实践，都具备上述特点。另一方面，“中国模式”和传统“东亚模式”也存在重大区别，主要是中国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投资，特别是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发展，表现出超强的，甚至可以说是难以满足的欲望。这种 GDP 竞争，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上半期，中央政府进行财政集权后，得到进一步强化：为了 GDP 竞争、彰显政绩、增加收入，地方政府开始了对制造业投资的激烈竞争，这是因为制造业投资不仅带来了增值税，而且还会产生对服务业发展的溢出效益，并带来营业税、商住用地出让金等收入。政府也运用各种政策工具极力建设亲商的投资环境，造成了过度的制造业投资，并对土地利用、劳动力保护、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都带来了严重的不利后果。当中国迈入中等收入门槛之后，前阶段的发展路径，尤其是促成地方政府 GDP 竞争的体制机制和相关政策，必须尽快加以转变，以利于发挥市场在全社会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一、中国发展方式与“东亚模式”的相似之处

分析 20 世纪后期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应与其发展所处的区域背景相脱离。二战后，东亚见证了现代史上成功的发展神话。在经过 30 多年的稳定增长后，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香港等国家及地区通过学习、利用先进技术，从原来次要经济体一跃成为全球工业生产的发动机。80 年代晚期和 90 年代早期，一些学者开始发表为东亚发展型国家叫好的论述，公开支持政府干预经济的作用（Haggard，1990；Evans，1987）；同时，随着美国取得冷战胜利，以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也取得了巨大成功，所谓“华盛顿共识”逐渐被接受。为此，学者们针对东亚奇迹开始了不休争论。尽管对政府干预的影响好坏仍存在分歧，但所有人都认为东亚经济体采取了一种非传统的发展模式（Krugman，1994），而中国改革后的高速发展，也是对“东亚发展模式”的一种积极模仿。“东亚模式”与“中国模式”的相似之处表现得非常明显。

（一）以增长为目标的行政体制

尽管韩国、台湾现在已被认为是较为成熟的民主体制，但二者在 70 年代和 80 年

代经历高增长时，仍处于军事独裁体制之下（Haggard，1990）。日本当时名义上是一个民主体制，实际上却掌握在一个受到较少约束、具有高度自主性的官僚集团手上。虽然，政治集权经常会导致统治者为获取个人利益而滥用权力，但这些东亚经济体的领导者几乎都一心一意地专注于国家经济发展。这种“东亚例外论”也许应归因于，在二战之后东亚地区面临的独特的安全环境。在冷战期间，两次代价昂贵的战争曾在东亚展开。促进经济增长，不仅有助于巩固这些经济体的军事力量，而且也可以在民众心中提升政权的合法性。70 年代后期，中国也发现自己处于类似情况之中，当时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趋于和缓，邓小平意识到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的发展。他告诫，如果不推动改革，执政党就会存在合法性危机，并公开提出到 20 世纪末国民收入翻两番的目标。邓小平把经济建设提上党的最高日程，同时推出了改革和增长相结合的政策组合（Shirk，1993）。这种政府对经济增长的高度专注持续至今。

（二）投资和出口推动的增长

研究“东亚模式”的一些国外学者认为，集权政府的优势在于它有能力调动众多资源为经济增长服务。如果政府领导人不受选举约束，他们就能够通过抑制消费的方式将资源更多转向投资。60 年代至 70 年代之间，日本的投资占 GDP 的比重为 30%-40%，到 70 年代中期，该比例才下滑到 30% 以下（图 1）。当韩国经济开始起飞时，其投资占 GDP 的比例迅速上升至 30%，到 80 年代末，差不多接近 40%，并一直保持到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在高增长时，日本和韩国的投资占各自 GDP 的比重，都显著高于大约 20% 的世界平均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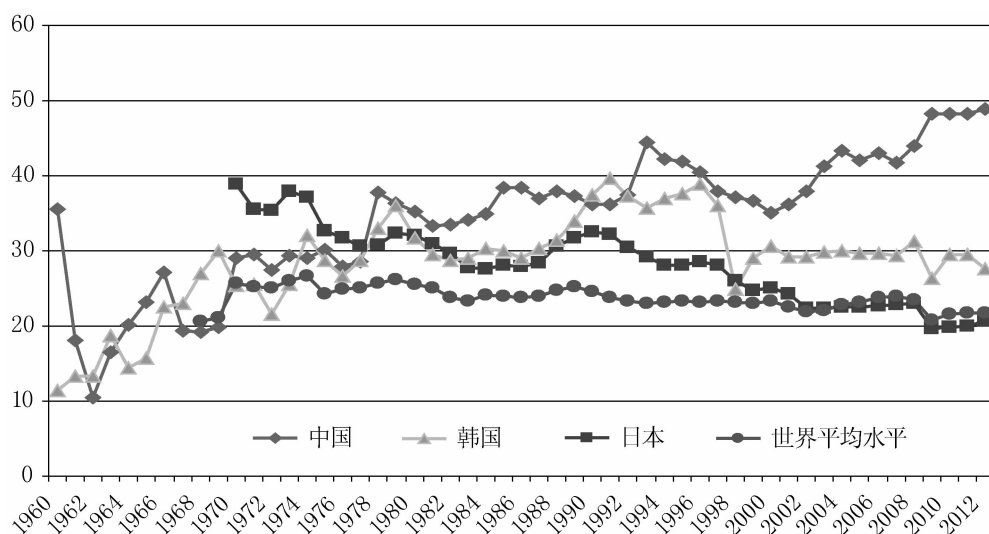


图 1 1960 年-2012 年固定资本形成总值占 GDP 比重（中日韩与世界平均水平）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

即使以东亚高水平的投资比例来衡量，中国经济增长对投资依赖也是超高的。80年代，中国资本形成占GDP比重已经升至31%，90年代和21世纪头十年，这个比例分别又增加到34%和50%，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资本形成对经济的贡献处在较高水平。与此同时，居民消费却被抑制。如图2所示，近年来日本居民消费占比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有所缩小，但仍然持续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之下。在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前期，韩国和中国居民消费水平都处于世界平均水平之下，但韩国居民消费一直保持占GDP比重的50%左右，中国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却从90年代的45.9%不断下降到21世纪前十年的39.7%。为了弥补国内疲软的需求，这些东亚经济体都向国际市场出口大量商品。1980年，中国出口才占GDP比重的10%，2006年已升至39%。投资和出口抑制了国内消费，这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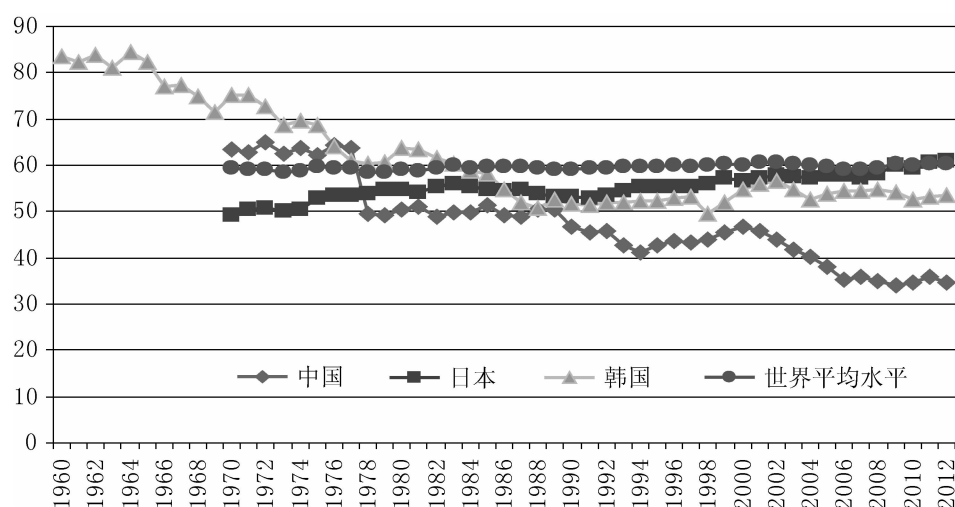


图2 1960年-2012年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中日韩与世界平均水平）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

过度依赖出口的局面，增加了中国面临外部冲击时的脆弱性。2013年，中国继续保持双顺差局面，全年经常项目顺差1886亿美元，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2427亿美元，国际储备资产增加4314亿美元。至2013年底，中国外汇储备达到3.82万亿美元，而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以及债务危机导致美元近年来不断贬值，使中国外汇储备面临巨大风险。在现实情况下，中国巨额外汇储备已经成为美国的“人质”，中国落入了“美元陷阱”，而且进退两难（余永定，2010）。

最后还有产业结构失衡。地方追求GDP增长，捷径就是投资重化工业，导致制造业发展过快，而服务业比重过低。现代服务业中的医疗、教育、金融、保险、交通、通信等行业，有的是政府垄断，有的是过度行政管制，造成供给不足，第三产业比重长期徘徊在40%左右。

（三）过度亲商与忽视劳工权益

一些研究“东亚模式”的国外学者认为，正是由于政府有能力抑制工会，才使得“东亚模式”变得可行。在冷战期间，日本、韩国和台湾对工会组织施加了严格限制，有的经济体甚至还宣布过劳工组织是非法组织（Haggard, 1990）。这类亲商政策的结果是，工人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受到严重约束，但却给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带来了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由于拥有廉价的熟练劳动力，这些经济体掌控了世界出口市场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大量份额（Deyo, 1987）。当这些经济体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后，企业又运用积累的资本进入了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部门。抑制劳工的另外一个结果是，左派政党没有能力获得政治权力并促进福利再分配。这种所谓的儒家式福利国家，使企业减轻了许多所谓的“浪费性”支出。

与其他东亚经济体相比，中国劳工的权利更加有限，并且在集体谈判上缺乏讨价还价的力量（Chan, 2001）。80 年代早期，中国的改革提高了劳动报酬在 GDP 中所占份额，但从 1990 年以来这个比例就开始逐渐下降，而且下降趋势在 2000 年以后进一步加快，在 8 年的时间里下降超过 10%。同期，政府在教育、卫生、养老金和失业津贴上的支出也在下降（Solinger, 2005）。特别是随着 90 年代中后期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制，企业员工权利日益缩减。

（四）政府的“援助之手”

除了为投资创造有利环境外，东亚发展型经济体的政府也毫不犹豫地直接引导投资，并对企业进行微观管理。一些学者争论说，政府通过扭曲市场环境可以获得国际贸易中的动态比较优势并获取技术诀窍，让经济长期获益。日本、韩国和台湾制定了经济优先发展目标，并锁定了一些特定产业。为了给企业提供激励，政府采用了包括税收减免、出口退税、对外企进行市场限制等政策工具。政府还同时垄断或干预金融体系，向那些符合政府发展策略的企业提供廉价贷款。

中国也不例外，首先在经济特区进行了产业政策实践，通过免税和出口配额政策，成功地吸引了一批制造业企业来华办厂。90 年代早期，中国仿效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发布了一系列产业政策。例如，1994 年中国首次发布了汽车工业产业政策。为使中国成为一个有自主设计能力和品牌的主要汽车生产国，中国政府为国内三大和三小汽车制造商提供明确支持。除了汽车进口关税壁垒，外国汽车生产商要想在本地经营，还必须同意在中国国内生产一定比例的汽车零配件，并转让相应技术。为适应 WTO 规则，2004 年中国调整了汽车工业产业政策，关税、进口许可证和技术转移要求逐渐被取消，但政府还是增加了对本国厂商的补贴，并持续对外国汽车制造商通过非正式渠道施加影响。2006 年，中国本土的汽车制造商在国内市场所占份额超过了日本、欧洲、美国和韩国的厂商，其部分原因就是这些政策支持。依靠类似战略，中国已经在如半导体、电信、飞

机、计算机和高铁等技术密集型产业部门，取得了显著的技术进步和更高的市场份额。

二、中国发展方式的独特性

中国并不仅仅是日本、韩国等经济体发展经验的简单扩大版本。早期的数字显示，即使以东亚发展模式各经济体的平均水平来看，中国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的投资依赖和消费抑制也是相当极端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中国地方政府之间进行了非常激烈的制造业投资竞争。主要是以下制度性因素导致 90 年代中期之后地方大规模招商引资竞争，并与银行、房地产商共建“经济增长联盟”格局的出现。

（一）财税改革与政府收入需求

从 80 年代开始，政府预算收入占 GDP 比重就趋于下降，从 1978 年的 31% 下降到 1992 年的 12%。更令人不安的趋势是，中央政府收入占总收入的份额不断下降，1984 年超过 40% 的政府收入流入了中央财政，但这个比例到 1993 年减少到 22%，这不是当年中央政府推动“财政承包制”希望得到的结果。1984 年后的“财政承包制”，允诺地方政府在上缴给中央财政一个固定收入后，保留剩余收入的大部分（Montinola, Qian and Weingast, 1995; Oi, 1992）。尽管这种制度的设计是为了激励地方，而且还允许中央不断调整固定上缴数额，但由于地方政府得到了超出固定上缴部分外收入中的更大份额，而且地方政府也不断将地方国有、乡镇企业的收入，转到与这些企业相联系的预算外账户，结果是中央在整个政府预算中的比重随经济增长迅速下降了。

出于对中央财政能力的担忧，1994 年中央政府对税收制度进行了大幅调整，具有普适规则的分税制代替了按照（各级政府）所有制确定、可谈判的利税上缴体制（Shirk, 1993）。中央政府独享消费税和关税，营业税和所得税归地方政府所有，而增值税这个最大的税种，中央拿走 75% 的份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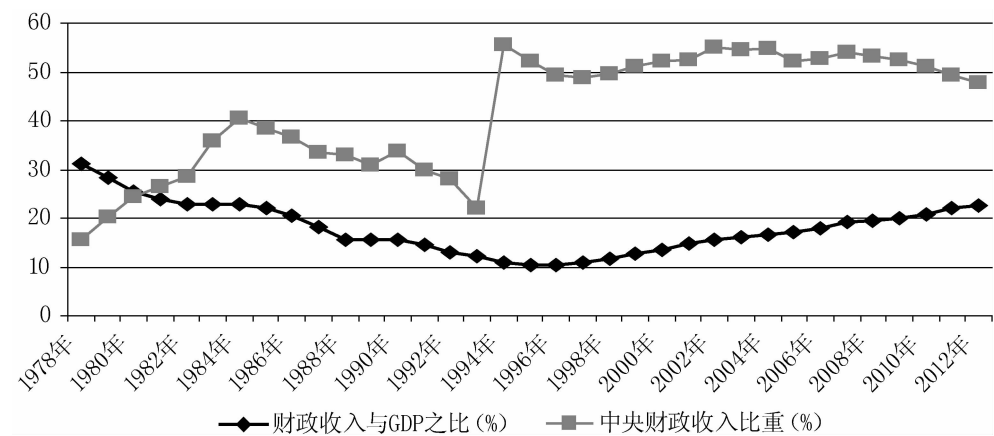


图 3 1978 年-2012 年政府收入占 GDP 比例和中央收入占全部收入比例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分税制改革基本上重新集中了预算内收入，并使中央可以对地方支出行为进行更加直接的控制。分税制在集中收入方面的效果非常明显：1994 年，中央政府在预算内财政收入中的比例上升至 56%。分税制改革后，所得税作为地方主要税种迅速增加，中央政府进一步调整了规则，2002 年拿走了所得税的 50%，2003 年更将这一比例提高到 60%。分税制修复了旧体制下存在的许多漏洞，作为一种流转税，增值税很难逃避，同时还能有效防止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合谋并进行会计操作。此外，独立国税系统的建立也确保了税收收缴。过去，税务系统隶属于地方政府，有着很强的动机与地方官员合谋减少税收，即所谓的“把肉烂在锅里”。而分税制后新成立的国税系统由中央直接管理，工资与办公经费都来源于中央财政，国税局负责征收增值税，然后再给地方属于地方分成的那部分。

但分税制改革在集中收入的同时，并没有调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支出责任，这就进一步增加了地方的财政压力。作为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可以给地方政府增加任务，如教育、卫生、基础设施等，并希望地方政府买单。正如后面我们将会讨论到的，90 年代中后期许多地方政府对自己所有的中、小型国有企业实施了破产或重组，而地方政府承担了提前退休员工和下岗职工的社会保障支出（Tsui and Wang, 2004; Tao et al., 2010）。90 年代中期的分税制改革，给地方政府造成了巨大的财政压力，逼迫后者不得不努力扩大收入来源。其最佳策略就是促进本地经济发展，以此增加独享的营业税和所得税。地方政府尽管只分到增值税的 25%，但增值税却构成了全部政府预算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在 1995 年-1999 年之间大约是 40%）。因此，地方政府仍有很强的内在动力鼓励制造业发展。除了预算收入，地方政府还渴望开辟预算外收入新来源，如土地出让金。

（二）地方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重组破产与区域间招商引资竞争

如果说，增加中央政府对税收的“垂直竞争”加剧了地方官员的财政压力，那么，90 年代中期后区域间的“水平竞争”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压力。资本的流动性促使了地方政府保护产权，由此，可以解释 80 年代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Montinola, Qian and Weingast, 1995）。虽然这种分析在逻辑上有一定道理，但事实上，直到 90 年代中期，中国才开始大规模出现跨区域的资本流动和激烈的投资竞争（Tao et al., 2010）。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市场才开始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机制，对私营企业的歧视才开始逐渐减少。90 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全国市场逐步一体化，资本、劳动力、原材料和产品才逐渐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比较自由地流动。

在 80 年代的财政承包制下，地方政府自然会偏爱地方所有的国有和乡镇企业。当时，中国尚未引进现代税收制度，所以地方国有企业上缴的税收和利润，构成了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如前所述，作为本地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地方政府往往与企业经理合谋，把预算内资金转移到预算外，以减少中央共同分享这些收入。地方政府在 80 年代

不断发展本地国有和乡镇企业，当时有两个因素直接促进了那一轮的地方 GDP 竞争。一是从需求面看，计划经济体制下消费被抑制，消费品投资与生产不足，因此市场上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地方政府只要能够把企业建起来，就可以获得盈利（Naughton, 1996）。二是从供给面看，地方政府和银行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地方能够为本地国有、乡镇企业配给的贷款提供隐性担保。地方政府利用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建立了大量中小企业，这些企业所涉及的行业包括砖厂、自行车厂、服装厂、家用电器厂、家具厂、啤酒厂和许多其他消费品及一些生产资料部门。

某种程度上说，地方政府最后成为自己 80 年代大办本地国有与乡镇企业的牺牲者。虽然中国当时对消费品有着很大需求，但百姓收入终究较低，地方政府在消费品部门的过度投资最后带来了产能过剩。地方政府对此的反应是进行贸易保护主义，限制其他地区产品进入。恶性循环接踵而至，狭小的市场迫使越来越多的企业陷入亏损。90 年代早期，两方面的制度性变化降低了地方政府对本地国有、乡镇企业的偏爱。除了前面提到的分税制改革外，1993 年的金融改革也加强了银行体系的监管，限制了地方政府对银行信贷决策的干预。地方政府开始悄悄地对本地中小型国有企业民营化。甚至早在 1998 年中央政府同意大规模民营化之前，一些省份超过 70% 的小型国有企业已经民营化或者关门倒闭（Yang, 1997）。当新世纪来临时，大部分地方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已经完成了改制。这些变化导致地方政府从企业所有者，变成更为单纯的企业征税者。

这种政府角色的重新定位，对地方政府行为产生了极大影响。作为企业所有者，地方官员有着很强的动机照顾自己的“孩子”，并确保他们继续存活。而作为征税者，地方政府则必须为所有的潜在纳税者提供公共服务。除了更有效率的民营企业开始增加，外资企业在 90 年代后半期也开始大量进入中国。与国企和乡镇企业不同，这些企业具有更大的流动性，且对地方的优惠政策也更敏感。如果其他地区能提供更有利的税收、土地优惠，以及更好的基础设施，这些企业就会离开。外资及民企大规模出现，使地方政府在当时的经济社会背景下，不得不进行非常激烈的招商引资竞争来扩大税基。

（三）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产业间联系和溢出效应

制造业能够为地方政府直接带来两种税收，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基本上，地方政府可以获得 25% 的增值税和全部企业所得税（2002 年、2003 年后企业所得税地方比例分别下降到 50%、40%）。为了招商引资，地方政府大规模投资于基础设施，包括土地、道路、水、电力等。90 年代中后期开始，地方政府在企业所得税方面给予两免三减半的优惠。在一些较发达的县市，大部分乡镇都设有“开发区”或所谓的“城镇工业功能区”。为吸引工业投资者，这些开发区一方面事先进行“三通一平”等配套基础设施投资，另一方面制定各种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在 2003 年前后的一波开发区热潮中，各地制定的招

商引资政策几乎毫无例外地设置了用地优惠政策，包括以低价协议出让工业用地，按投资额度返还部分出让金等。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基础设施完备的工业用地仅以名义价格甚至“零地价”出让给投资者。由于地方政府需要事先付出土地征收成本、基础设施配套成本，因此，出让工业用地往往意味着，地方政府从土地征收到招商入门这个过程中，在财政上实际是净损失的。根据审计署的数据，2012 年 4 个省和 17 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中，有 55% 承诺以土地收入偿还，但这些地方 2012 年需还本付息额已达其可支配土地收入的 1.25 倍。

要理解地方政府的行为，还需要多问两个问题：为什么地方政府在制造业的招商引资上如此不遗余力？如果通过低地价与税收优惠来招商引资无法在短期甚至中期赚钱，地方政府为什么还要这样做？这两个问题都可以通过考察不同产业间的联系，特别是制造业对服务业的外溢效应来回答。

为使分析简化一点，假定所有地区有两个行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制造业企业能够带来稳定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而更吸引地方政府的，是这些制造业企业所产生的对服务业的溢出效应。一旦制造业工厂开始生产，就可以增加就业和税收收入，而这会带动对本地服务业的需求，从而推动服务业部门发展，并给本地带来营业税和高额商住用地出让金收入（Tao et al., 2010）。在目前税制下，这两项都是地方政府独有收入。因此，地方政府在工业用地出让上的盘算是，只要吸引到投资后直接带来的未来增值税流贴现值，和其对本地服务行业推动后间接带来的营业税收入流贴现值，再加上土地出让金的收入，能超过地方政府的土地征收和建设成本，那么就值得低价出让工业用地。

与低价出让制造业用地不同，在商住用地出让上，地方政府往往采取高价策略。很多地方政府成立土地储备中心，垄断城市土地一级市场，通过限制商住用地的供应并以“招拍挂”的竞争性方式，追求土地出让金收入最大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制造业部门与服务业部门有不同特点。制造业部门，特别是那些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中、低端制造业部门，有一个重要特点是缺乏区位特质性。换句话说，大部分制造业企业并不是为本地消费者进行生产，他们往往是为其他地区乃至其他国家消费者生产。在国内各地区乃至全球争夺制造业生产投资的激烈竞争下，这些企业对生产成本非常敏感，而且也比较容易进行生产区位调整。面对制造业部门较高流动性，处于强大竞争压力下的地方政府，不得不提供包括廉价土地、补贴性基础设施、企业所得税减免、宽松的环境政策和降低劳工保护标准在内的优惠政策包。地方政府往往并不预期工业用地出让能够带来净收入，甚至可以接受短期财政上的净损失。与制造业不同，大部分服务业部门提供的是本地居民消费服务，这些属于非贸易品，服务必须在本地被提供和消费。而由于中国地方政府基本垄断了本地商住用地一级市场，从而在提供商住用地上有很强的谈判能力。结果是，虽然工业用地由于各地投资竞争而形成“全国性买方市场”，但在商住用地方面

形成了众多“局域性卖方市场”。地方政府完全可以通过“招拍挂”方式高价出让土地，并将这种高地价转嫁给本地服务业的消费者。所以自然会观察到，地方政府通过设立“土地储备中心”来调节和控制商住用地供地规模，提高其商住用地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实际上，为了弥补工业用地带来的亏空，一些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商住用地收入进行横向补贴。

（四）独特的土地管理制度

特别需要指出，中国独特的土地管理制度，使得土地成为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联系以及产业间溢出效应的完美媒介。中国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村集体所有。城市扩张和工业园区建设所需的土地绝大多数来自农村集体，这些土地必须通过政府征地后，才能进行开发和出让。2004年《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出于公共利益需要可依照法律对土地实行征收、征用并给予补偿。然而，《宪法》及《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公共利益”的确切内涵却始终缺乏明确界定。实际操作中出现的情况往往是，除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向农村集体组织征地外，绝大部分的非公益类型用地需求，包括工业、商住房地产开发用地等，都通过集体土地征收来满足。上述制度意味着，地方政府在城市土地一级市场上有垄断地位，同时，政府对农村农用土地转为非农用途以及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流转，都实施了严格控制。由于集体土地农转用一般都要政府先征再用，而且补偿标准与方式主要由政府制定，因此，不论农村土地的所有者（村集体）还是使用者（个体农户），在关于土地征收价格和补偿的谈判中都处于十分弱势的地位。

实际上，这种地方性的土地垄断供应，使地方政府能够使用土地作为经济发展的杠杆，并歧视特定类型的土地使用者。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有意限制辖区内商住用地规模，这样可以抬高商住用地出让金（Tao et al., 2010）。而商业、住宅业用地者则别无选择，只能向地方政府支付很高的土地出让金，并将成本转移给作为商住业消费者的本地居民。从省级数据来看，土地出让金相当于省预算内收入的50%，在一些地区，这个比例竟高达170%。正是这些预算外收入，使地方政府有能力在制造业招商引资过程中，提供一揽子刺激性补贴，包括廉价土地和税收减免进行竞争。90年代以来，中国的投资比例攀升到非常高的水平，这正是地方政府为吸引制造业建造更多工业园区的结果。2003年7月，全国各类开发区清理整顿结果显示，全国各类开发区达到6866个，规划面积3.86万平方公里，这些开发区到2006年底被中央核减至1568个，规划面积压缩至9949平方公里。事实上，这些被核减掉的开发区大多数只是摘掉了“开发区”名称而已，多数转变成所谓的“城镇工业功能区”或“城镇工业集中区”，原有的开发区功能几乎没有改变。考虑到中国只有2862个县级行政单位，这个数字意味着，平均每个县级行政单位至少有两个开发区。

以上分析说明，以分税制为代表的财政集权、地方国有企业与乡镇企业改制后的资本流动性、制造业对服务业的溢出效应以及独特的土地管理制度等机制共同起作用，造就了中国自 90 年代中期以来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强大动力。但由此而产生的负面经济社会效应，也到了必须根本转变的阶段。

三、地方政府 GDP 竞争的负面影响

在从计划经济渐进地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政府和市场的边界需要逐步加以划清。但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的政府与市场边界不清晰的问题反而被掩盖了。由于在改革过程中，中央政府相对放权，地方政府权限扩大，加之各种制度因素的影响，导致了地方过度追求 GDP 增长，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倾向，加剧了资源配置的扭曲程度。然而，一些学者却认为，这种“地方竞争”的格局恰恰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因之一，是“中国模式”中的独特经验。继美国学者拉莫之后，香港的张五常提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密码在于“县域竞争”（张五常，2009）；上海的史正富在《超常增长》一书中更是认为，地方政府已经成为参与市场竞争的三大市场主体，“在中国，尤其是市县两级政府，长期在经济发展的第一线竞争拼搏，已经成长为与企业界共生互动的有生力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动机之一。”对《超常增长》一书，国内一些著名经济学家认为是中国经济理论的创新（林毅夫等，2013）。

我们认为，地方政府的 GDP 竞争曾经极大地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但这一地方竞争模式也极大地扭曲了市场配置机制，付出了过高的资源、环境成本，同时压低了劳动力成本，降低了国民福利，还提供了巨大的权钱交易空间，造成了严重的腐败问题。

（一）地方政府竞争割裂了全国统一市场

地方政府参与市场活动不可能和企业一样遵循公平竞争原则，由于手握行政大权，同时单一追求 GDP 增长，导致众多地方政府打着“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旗号，使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公平竞争，对本地区的企业及其产品采取保护措施，或是实行优惠政策，抵制外地产品进入，严重影响产品和要素的合理流通。在一些地方保护主义泛滥的地市，公安、工商、税务、防疫、技术监督等部门甚至纪检监察部门，都为外地产品的进入设置障碍，动用一切力量保护本地企业，宣传消费本地产品是“爱县”、“爱市”，而消费外地产品是违法行为，直接损害消费者利益（陈东琪等，2002）。在本地企业和外地企业发生经济纠纷的时候，地方法院公然偏袒本地企业。这些现象说明，在“地方竞争”格局下，全国统一的公平竞争市场秩序难以建立。

（二）地方政府竞争严重加剧产能过剩

早在 2000 年就有学者指出，“全国按 31 个省区市建制，各有各的计划制定权，都把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作为主要目标，相互攀比，竞相赶超，必然造成大量的重复生产和重复建设”（房维中，2000）。但多年来，地方政府在 GDP 竞争的格局中陷于“囚徒困境”。如果一个地方政府在上重大项目、建重化工业方面落后于其他地方，不仅影响当地财政收入、就业，更影响当地官员升迁。这使得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和扩大产能时，很少甚至根本不考虑环境和社会成本，而竭力追求本地区 GDP 增速。地方政府尽一切可能上项目扩大产能，一方面是“跑步进京”要各种优惠政策和重大项目，另一方面违反国家产业政策，根本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就私自上马。例如，2003 年后新增的电解铝和氧化铝产能，80%以上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地方政府在恶性竞争中，惯常使用的优惠政策包括：低价出让工业用地、税收返还、违规贷款、压低劳动力成本和水电价格等。这些政策扭曲了要素价格，带来了畸形的资源配置。有时候，地方政府还会破坏企业自由进出的市场机制，强令亏损企业继续经营，通过财政补贴或政府担保为这类企业输血，进一步加剧了产能过剩。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 年上半年，中国船舶行业产能利用率仅为 75%，平板玻璃为 73.1%，电解铝为 73.7%，水泥为 71.9%，钢铁为 72%。有的钢铁大市，2014 年第一季度产能利用率不到 50%。此外，汽车、多晶硅、风电设备等也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各地政府的“十二五规划”纷纷提出要扩大汽车行业产量，规划合计产量为 5292 万辆，比国家发改委的行业规划多 70%。产能过剩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心腹大患，而地方政府的盲目竞争，对产能过剩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地方政府竞争加剧恶化生态环境

近 20 年来，中国的环境、生态急剧恶化。京津冀的严重雾霾天气已经引起世界广泛关注；2012 年，在 113 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空气质量达到新标准的仅为 23.9%；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报告指出，以 PM_{10} 为指标，空气污染每年导致中国 35 万-40 万人“早死”；80 年代末，土壤污染面积为几百万公顷，现在已经高达 2000 万公顷，占全部耕地面积比重超过 20%，受“工业三废”污染的土壤面积约为 1000 万公顷；根据对 198 个城市地下水的监测，处于较差到极差的监测点占 57%；长江、黄河等十大水系劣质断面比例为 39%；淮河流域的水污染，已经导致沈丘等 8 个县区居民消化道癌症高发或新生儿残疾；监测的 26 个湖泊中，富营养化状态占 53.8%；四大海域的清洁面积已经减少到 4.78 万公顷，不到 2003 年的 60%。国家环保总局和 OECD 联合发布的《中国环境绩效评估》估计，2020 年，中国因环境污染导致的健康损失将达 GDP 的 13%。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与地方政府在恶性竞争中牺牲环境换增长的思路密切相关。很多地方政府成为污染企业的保护伞，导致环保审批、监管在地方层面失灵、失控。不少地方的污染企

业就是当地招商引资的“一把手工程”和纳税大户，当地环保部门对此束手无策甚至为虎作伥。

（四）地方政府竞争造成巨大债务隐忧

地方政府为了兴建基础设施需要大量资金，过去主要依靠“土地财政”，但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由于货币政策宽松，监管也一时放松，很多地方政府转通过“融资平台”向银行举债。此外，一些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将企业缴纳的税收、土地出让收入等，通过财政列支手段返还给相关企业，也相应地减少了地方政府可支配收入。国家审计署 2012 年第 26 号公告披露，审计调查的 54 个县中，有 53 个县在 2008 年-2011 年期间，出台了 221 份与国家政策明显相悖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文件，以财政支出方式变相减免应征缴的财政性收入 70.43 亿元。

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快速累积，成为中国经济体系中存在重大系统性风险隐患的领域。据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数据，截至 2013 年 6 月底，全国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 20.7 万亿元。其中，地方债务约为 17.9 万亿元，包括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 10.89 万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 2.67 万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 4.34 万亿元。由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存在严重的“土地财政”依赖症，随着房地产风险的累积或爆发，土地财政可能成为“无本之木”。此外，地方政府债务与金融体系的内在关联性极其密切，可能引发重大风险传递。根据国家审计署数据，截至 2013 年 6 月底，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债务总额（考虑或有债务）约 7 万亿元。这些融资平台公司主要从事基础设施建设，其现金流状况差、资产负债率高，存在重大信用风险，而其资金来源主要为银行贷款、信托、债券、融资租赁等，融资平台几乎与中国所有金融子行业联系在一起。这其中的银行贷款，还不包括通过银行同业业务等“影子银行业务”变相为地方政府融资的部分。有研究认为，中国地方债务规模和融资平台债务水平被低估，比如影子银行体系的信贷供给，为此，可能的风险将更为巨大，地方债务的违约率可能超过 50%^①。

（五）地方政府竞争扭曲城镇化进程

地方 GDP 竞争驱动型的城镇化，要求政府支配大量土地、资金、人力等资源。地方政府收入来源严重依赖于“土地财政”，因此，有强烈的动机挤占农业资源和掠夺农民土地，以满足城镇化需求。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制造业投资受阻，很多地方政府又转而选择大拆大建的造城之路。全国有 12 个省会城市要建 55 个新城，144 个地级市要建 200 个新城，还有不少于 30 个城市要斥巨资重建老城。就征地来看，为推动制造业发展而进行的大规模低价圈地，已经造成高达 3000 万-4000 万的失地农民，处理不好很容易

^①渣打银行：《中国地方债务违约率可能超 50%》，《华尔街日报（中文版）》2013 年 12 月 31 日。

恶化城乡关系，造成社会不稳定。^①在农民工的主要流入地，地方政府为吸引投资而放松劳工保护标准，有时连劳工的基本权益都难以得到保障，更不用说去进行有实质内容的户籍制度改革，从而为流动人口提供在城市永久定居的相应福利（如最低生活保障、子女平等就学和廉租房）。由于地方政府把主要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能够用于提供公共服务的资金就捉襟见肘，导致医疗、教育、保险、养老、失业、救济等领域，会出现公共服务长期总量不足、结构失衡的状态。

（六）地方政府竞争扭曲宏观调控

由于地方政府实际充当了资源配置的主体，国家宏观调控被扭曲为中央政府调控地方政府，且地方政府执行的是各地人大自己通过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因而中央指标往往在执行过程中落空。在地方普遍追求高增长、大投资的背景下，中央不得不为地方的经济增长调配煤、电、油、运等，还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地方“调控”中央的局面。以“十二五”规划中 GDP 增长指标为例，中央是 7%，而各省制定指标的加权平均达到 10.5%，11 个省市“十二五”期间 GDP 要翻番，年度增长要达到 14% 以上。2013 年，中央提出的 GDP 增长幅度为 7.5%，而地方有 24 个省市区高于 10%，各省市区 GDP 总额超过全国 GDP 约 6 万多亿。

中央提出经济增速的上下线后，一些地方又纷纷提出各自的 GDP 增长下线，各地的下线大大高于中央指标，而保下线的手段仍然是层层下达 GDP、投资、招商、项目等各种经济指标，有的一直下达到街道，分解到各级党政干部。一些地方明文规定，任务完成情况要与干部政绩考核任用挂钩，对未完成招商引资分解指标的干部，要给予组织处理或党政纪律处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中央提出压缩过剩产能任务后，一些钢铁、水泥产能严重过剩的地方，又分解压缩产能指标，采取党政工团人大政协齐动员的办法，分别包干落实到企业，指导和帮助企业解决压缩产能面临的困难。多年来结构调整进展十分迟缓，宏观调控难以达到预期目的，因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主要不是企业，而是地方政府。

（七）地方竞争产生巨大的权钱交易空间

无论是层层分解 GDP 增长指标，还是层层分解落后产能压缩指标，都给权钱交易搭

^①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2007 年的一个报告估计，有超过 4000 万农民因城市扩张和交通工程建设而失去土地。地方政府在城市土地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低价征收农民土地，失地农民对补偿费的数额不满。2005 年对中国 17 省、1962 名农民的调查显示，过去十年来，与土地相关的突发事件数量增加了 15 倍多，而且这种情况似乎仍在增加。事实上，与土地尤其是征地相关的问题，已成为近年来农村民怨和抗争的最主要原因，近年来中国农村发生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中约有 80% 与征地有关（Zhu and Prosterman, 2007）。

建了无形平台，极易引发腐败。“地方政府公司化”现象导致地方官员的偏好出现异化，很多官员不是把民生问题放在首位，而是“在官言商”。由于地方政府在追求 GDP 的过程中，决策的随意性和自由裁量权很大，地方官员手中掌握的权力和资源过多，难免会导致其为个人和家族利益而利用权力寻租的现象。加之在激烈的 GDP “锦标赛”中，对官员的考核机制也设计失当，在考核者和被考核者之间存在较大的信息不对称，各级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结构遭到破坏，因此难免会出现一些“漏网”的腐败官员，这进一步导致地方官员心存侥幸，而且，在某些地方，腐败已经成了“潜规则”，不时会出现“窝案”。随着官员腐败案件的多发，导致反腐难度越来越大，使得地方官员腐败积重难返。

四、改革建议

界定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涉及行政体制、财税体制、外贸体制、土地制度、分配制度、价格机制和社会管理等多个方面。建议从以下六个方面逐步破题。

一是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议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共设施基本完备，作为衡量省、市、区是否协调发展的主要指标，尽快取消地方的 GDP、投资等规划指标，以利于保证全国政令统一、市场统一。同时，加快劳动力、土地、资金等要素配置的市场化进程，打破行政性分割，特别是“诸侯经济”分割对要素市场配置的阻碍。

二是对多年来形成的 80 多个各类国家级规划进行梳理和整理。突出抓好西部大开发，其余跨省的重在指导，省内的由各省自行协调。要警惕过多的国家级区域规划形成层次不等、种类繁多、画地为牢的各类财税、土地、外贸等优惠政策，形成地方政府主导的不同层次的区域性 GDP 竞争，结果反而割裂了全国统一市场。

三是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不仅要求政府弥补市场失灵，而且要求政府进一步培育生产要素市场，打破地方行政性市场分割，建设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地方政府要确保中央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加强对本地经济社会事务的统筹协调，侧重提供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维护市场公正、公平竞争秩序和社会安定。

四是明确划分各级政府事权财权。按照公共财政框架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明确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落实与之相匹配的财力。建议逐步将基本公共服务事权适当集中到中央，由中央统筹平衡各地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并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经费保障机制。尽快将各级政府间财税关系、责权划分等基本制度，以法律形式加以规范，限制中央部门的自由裁量权，杜绝“跑部钱进”的弊端，同时减少地方政府对“土

地财政”的依赖。

五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把政府与社会组织、市场中介组织分开。把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如企业经营决策等坚决转移出去；把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如基本公共服务等切实管好。以制度保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六是大力发展和规范社会组织。中国现在已有近 50 万个社会组织、中介机构、基金会等，但绝大多数还存在“官办、官管、官运作”的现象。市场主体自律和自协调机制的缺失，迫使政府在社会和经济管理方面维持“管得过宽、管得过细、管得过死”的局面。在国家法律框架内，发展完善社会组织，形成灵活的社会自协调机制，有效平衡不同社会群体利益，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的内在要求，是清晰界定政府与市场边界的重要前提，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题中应有之意。

参考文献：

1. 房维中：《建议地方政府不再指定和实施无所不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未来十年的改革：政府市场模式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2 年版。
2. 高尚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未来十年的改革：政府市场模式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2 年版。
3. 国家审计署：《关于 2012 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2013 年 6 月 27 日。
4. 宋晓梧：《“三维市场经济”与地方政府职能界定》，《学术前沿》2013 年 12 月下。
5. 宋晓梧：《关于培养市场主体的几个问题》，《改革：企业·劳动·社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
6. 宋晓梧：《政府、市场与中国模式》，《未来十年的改革：政府市场模式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2 年版。
7. 陈东琪、银温泉：《打破地方市场分割》，中国计划出版社 2002 年版。
8. 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 2013 年四季度及全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初步数据》，2014 年 2 月 7 日。
9.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10. 史正富：《超常增长》，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
11. 韦森：《探寻中国经济增长之路》，FT 中文网，2013 年 7 月 9 日。
12. 余永定：《见证失衡：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三联出版社 2010 年版。
13. 《政府工作报告》，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2013 年 3 月 5 日。

责任编辑：李 蕊

· 宏观经济 ·

经济增长中的风险与对策

韩永文

摘要：本文分析了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长期与短期风险，提出了通过构建开放型经济新格局、优化投资结构、健全收入分配机制、深化金融改革等一系列深化改革的举措，来破解发展难题，化解经济运行中的风险。

关键词：经济增长 经济安全 深化改革 风险 对策

作者简介：韩永文，湖南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

潜在经济增长率放慢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积累起来的矛盾被高速增长所掩盖，经济增长放慢后这些矛盾“水落石出”而显化。必须高度重视这些矛盾和问题，深入贯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积极应对、逐步化解。

一、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长期性风险

（一）经济长期增长动力减弱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不对称，轻实体经济、重虚拟经济趋势增大，金融“脱媒”现象越发突出；出口与美日欧经济复

苏“脱钩”，产能过剩、成本上升、效益大幅下滑趋势日益加剧。

1. 出口与发达经济体复苏部分“脱钩”，稳定外需压力增大。受国际环境、人民币升值、成本增加等多重因素影响，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 GDP 的贡献率越来越低。2011 年 - 2013 年，我国净出口对 GDP 的贡献率分别为 -5.8%、-2.2%和 -4.4%。目前，发达国家市场需求回暖，对拉动我国出口有一定帮助，但有几个因素需高度重视。一是美国经济复苏和量化宽松政策退出将带来美元走强、利率提高，新兴经济体可能面临资本流出、融资成本上升，被迫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从而会影响从我国的进口。二是美国经济复苏主要依靠企业投资拉动，其投资需求对技术水平较高的经济体作用较大，但我国的代工制造业处于全球制造业价值链的低端，受益于美国“产业再造”的比重有限；三是我国制造业相对成熟，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劳动力成本增加以及国际政治秩序多变等因素，使我国制造业相对于美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国际竞争力下降。

2. 产能过剩和成本上升困扰经济持续增长，企业效益大幅下滑。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目前国内钢铁、水泥、电解铝、船舶、工程机械等产能利用率低于 75%，明显低于国际上公认的 82%左右的正常水平。IMF 则测算认为中国整体产能利用率已降至 60%。2013 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速 12.2%，虽然较 2012 年的 5.3%有所回升，但较 2011 年的 25.4%仍大幅下滑。而且，从 2013 年 9 月以来，工业企业利润连续 6 个月同比增速下滑，很多企业为了生存而进行亏本生产，恶性竞争愈演愈烈。不仅传统产业产能过剩严重，部分新兴产业也存在产能过剩，个别行业甚至出现绝对量和长期性过剩。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国内 3545 家企业的调查，71%的企业认为，目前产能过剩非常严重。产能过剩导致宏观债务水平和风险增加。据分析，我国每 1 亿吨钢产能背后背负着 2500 亿的融资，而目前 1 亿吨钢只有不到 2 亿元的利润。

3. “脱实向虚”效应不断累积。全球场外金融衍生品迅速发展的结果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规模比重失衡，2000 年前者规模是后者的 5 倍，2010 年上升到 13 倍，不均衡趋势日益明显。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比值 2000 年在 0.9 左右，2008 年上升到 3.5，2010 年进一步上升到 9.8。2012 年，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 5.5%，虽低于美英等金融业发达国家，却高于日本、德国等制造业发达的国家。2013 年底，国内委托贷款余额、信托资产和商业理财产品余额总计为 32.8 万亿，而 10 年间股票融资只有 2.8 万亿元。

4. 资本结构性过剩趋势日显，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效率下降。在经济繁荣期，融资结构会从有助于经济稳定的状态转向加剧经济动荡的状态，转换的拐点被称为“明斯基时刻”。剔除季节因素影响，用名义 GDP 和工业增加值的季度同比增长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可以发现，2003 年到 2008 年第三季度，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和经济增长较为

契合，融资结构处于促进经济增长的状态。2008 年末到 2010 年末，社会融资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出现较大偏离，2011 年第三季度再次出现大幅背离。这种情况表明，现行融资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再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对比 2013 年的国际数据可以发现，在发展中国家，我国贷款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最高，达到 126%，与葡萄牙、西班牙、希腊和爱尔兰等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一样，都位于本国贷款余额占 GDP 比值趋势线上侧的较高水平（巴塞尔委员会通过对比当前的信贷占 GDP 比重及其长期趋势间的缺口来评估银行业信贷风险，瑞信在 2011 年分析认为，我国该缺口已远远超出 10% 的警戒线）。

（二）影响经济安全的内生性问题日渐突出

1. 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日益严重。一是居民收入增速长期低于 GDP 增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倍数不断扩大。2013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当于人均 GDP 的 64.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相当于人均 GDP 的 21.2%，分别比 2012 年下降 5.5 和 1.3 个百分点，分别比 1978 年下降 25.8 和 13.9 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倍数从 1978 年的 2.6 倍扩大到 2013 年的 3.1 倍。行业间收入差距不断加剧，收入最高 10% 群体和收入最低 10% 群体的收入差距从 1988 年的 7.3 倍上升到 2012 年的 23 倍。2013 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 0.473，远高于 0.4 的国际警戒线。二是劳动者报酬占 GDP 比重大幅度下降。1990 年为 53.4%，2000 年为 51.4%，2007 年为 39.74%，2012 年回升到 46% 左右。与我国现有产业结构相似时期的美国这一比重为：1920 年-1929 年为 60.5%，1950 年-1954 年为 67.0%，1980 年-1984 年为 74.3%。此外，我国社会上大量存在的灰色收入、黑色收入进一步加剧了收入结构不合理和社会贫富差距。三是中间收入阶层占比较低。按照亚行的中产阶级每人每天消费 2-20 美元计算，中国只有 38.8% 人口算中产阶级，而国际上中等收入阶层占社会人口比重和城市人口比重都超过 70%。四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连续下降。1995 年-2010 年，居民收入比重从 65.87% 下降到 53.35%。五是二次分配合理性不够。2011 年我国基本住房、基本教育、基本医疗和基本社保等支出比重下降到 25.9%，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在 50% 左右。

2. 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一是岗位供给满足就业需求的压力较大。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期，每年约有 900 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700 万大学毕业生需要就业，加上其他社会就业需求，维持城镇登记失业率在 5% 左右的底线，每年需要提供 1000 万个以上的就业岗位。二是就业需求与合适岗位的匹配性不够。我国 15-59 岁的 9.3 亿劳动人口中，大学生占比约 7% 左右，近 6500 万人。但劳动力结构却不能满足创新驱动发展的要求。生产和管理一线的技术工人和工程管理人员短缺，企业面临设备技术先进、

操作人员技能低的问题。三是短期内就业压力大与未来劳动力供给不足并存。我国已经步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阶段，2012 年底我国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口 1.94 亿，预计 2020 年将达到 2.43 亿，2025 年突破 3 亿，届时将进入老年人口占比达到 20% 的超级老龄社会。就眼前看，我国就业处于困难叠加期，一方面适龄人口就业困难，另一方面人口红利到了拐点，许多企业用工不足、招工难，劳动力价格年年大幅攀升。

3. 公共投资浪费和投资效率低下。一是资源浪费严重。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大多数地区可赖以发展的资源如土地、能源、资金等都很稀缺。但城市发展与开发区建设对土地节约重视不够，大量重复性建设和闲置的开发项目占用和浪费了大量土地资源。二是配套不完善，“半拉子”工程在基础设施建设中普遍存在。很多项目赶工期，重形象、轻配套，重地上、轻地下，缺乏系统规划，功能缺失，浪费严重。三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缺乏以人为本的理念。考虑市民对生活环境的需求不够，缺乏对居民行为规律的研究，脱离居民生活实际，营建“大广场”、“宽马路”、大型“音乐喷泉”等耗资巨大、功能甚微工程的情况比较普遍。

4. 预防性储蓄居高不下。2013 年底，我国居民储蓄余额 46.7 万亿，人均超过 3 万元。居民储蓄率超过 50%，远高于世界 20% 左右的平均水平。我国是全球储蓄总额、人均储蓄额以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居民消费率却只有 35%。居民储蓄率高，除了收入增加外，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担忧是一个重要原因。最近 10 年来，居民在购房、教育、医疗等家庭大额支付领域需求增多，预防性储蓄行为增强。由于房价、房租、食品等关键支出上涨幅度超过工资、利润上涨幅度，中低收入工薪阶层和小微企业主实际收入和消费购买力趋于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即期消费和最终消费的增长，也导致高投资率。

（三）影响经济安全的外部性问题日益凸显

1. 粮食安全问题。粮食是特殊而敏感的产品，供给即使出现一些细小的问题都可能引发人们的恐慌，进而影响社会和经济稳定。我国粮食供需一直处于紧平衡状态，隐忧不少。一是耕地严重不足。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显示，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我国全国耕地 203077 万亩，但有 14945 万亩位于东北、西北地区的林区、草原以及河流湖泊最高洪水位控制线范围内和 25 度以上陡坡，相当部分需根据退耕还林等政策进行调整，有相当数量耕地受到中、重度污染。目前，全国人均耕地不足 1.52 亩，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二是粮食浪费严重。中国农业大学的调查数据显示，全国一年餐饮浪费的蛋白质和脂肪高达 800 万吨和 300 万吨，相当于两亿人一年的口粮。三是粮食自给的社会意识有待强化。随着经济增长和国民财富的积累，很多人认为我国可以花钱买粮食而不一定完全依靠自给。2008 年日本 60% 以上的粮食依赖进口，韩国 75% 的粮食依赖进口，海湾

国家 80% 的粮食依赖进口，非洲有 3 亿人营养不良。如果 13 亿人口的中国出现粮食自给危机，必然引起全球粮市振荡，并使我国的安全放在别人手中。四是我国部分粮食品种对外依存度很高。据商务部的数据，2012 年我国粮食进口超过 7000 万吨，粮食自给率已经下降到 88% 以下。2013 年我国大豆进口 6340 万吨，占国内市场 80% 以上。蔬菜等进口种子占据国内高端种子市场的 50% 以上。五是谁来种地很可能演化成战略性问题。湖南省宁乡县农业局 2013 年对 100 个村 1000 户农户的调查显示，在家种地的以老年人和妇女居多，50 岁以上的占了 63%，女性占了 65.7%；小学文化程度的占 17.2%，初中文化程度的占 67.7%，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 15.1%。种地已经成为农村的非主流工作，粮食安全的重要性与种粮的劳动力布局很不匹配。

2. 环境污染问题。一是大气污染严重。2013 年以来，全国平均雾霾日数 29.9 天，较常年同期偏多 10.3 天。按照新标准，2012 年全国 325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的仅为 40.9%，113 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的仅为 23.9%。二是水域污染严重。全国主要流域的 I-III 类水质断面占 64.2%，劣 V 类占 17.2%。其中，海河流域重度污染，黄河、淮河、辽河流域中度污染。湖泊（水库）富营养化突出。56 个湖（库）营养状态监测显示，中度富营养的占 5.2%，轻度富营养的占 17.2%。三是地下水水质堪忧。2012 年，全国 198 个地市 4929 个水质监测点中，水质优良、良好、较好的占 42.7%，较差、极差的占 57.3%。有 2.98 亿农村居民的饮用水不安全，20% 城市居民的饮用水水源地不达标。据考察，凡是河岸边的村庄和劣五类水长期滞留的地方，就可能有癌症村。2013 年 6 月出版的《淮河流域水环境与消化道肿瘤死亡图集》指出，污染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地区，也是消化道肿瘤死亡上升幅度最高的地区。

3. 公共服务不足问题。一是教育、医疗、入托、养老、食品安全等公共服务保障严重不足。近 10 年来，相对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公共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公共服务建设明显滞后。公共服务不足以及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导致离境移民不断增加。抽样调查显示，我国个人资产超过 1000 万元的高净值人群中，近 60% 有意向或正在办理投资移民。截至 2013 年，我国海外移民存量 934.3 万人，转移资产 2.8 万亿元。大批人才和优质资产流失，既削弱了我国的竞争力，又为其他国家的发展注入了动力。据加拿大经济学家对 2001 年 -2008 年缴交联邦投资移民经济贡献的跟踪研究，移民投资每年能为加拿大贡献约 20 亿加元。二是我国的公共安全管理体系亟待加强。当前，我国民众反恐教育训练几乎处于空白状态，政府与社会的应急机制建设落后。世界经济与和平研究所编制的“全球恐怖主义指数”分析认为，过去 10 年我国的恐怖主义指数从 2.72 上升为 4.99，全球排名由 43 上升至 23。恐怖主义蔓延不仅造成短期的直接损失，更对中长期经济发展产生恶劣的影响。

二、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短期风险

（一）债务风险

目前，全社会总债务水平较高。中国社会科学院估算，2012年我国非金融部门债务达到了GDP的2.21倍。其中，2012年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达到63万-66万亿元，相当于GDP的121.4%-127.2%。远高于世界成熟经济体50%-70%的水平（美国企业负债率40%左右）。近几年，地方政府债务增长速度过快。2010年-2012年，地方政府债务增长率分别为18.86%、24.11%和19.43%。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产生了17.87万亿元左右的债务，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增长了63.5%，其中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增长了57.6%，年均增长20%。另一方面，债务偿还压力进一步加大。民生证券分析认为，2004年-2008年，1个单位债务能创造1个单位的GDP，但从2012年开始要3-4个单位债务才能创造1个单位的GDP。

（二）影子银行风险

近两年，我国影子银行发展迅速但缺乏有效规范。一是资金投向过多集中于一些风险暴露较高的行业或企业。“影子银行”代替传统银行信贷成为我国房地产行业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重要融资渠道。在商业银行房地产开发贷款逐年下降的情况下，房地产企业自筹资金比重由2010年底的36.52%上升到2012年第三季度的41.68%，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房地产信托、房地产投资基金、民间借贷等“影子银行”体系。在地方融资平台融资结构中，银行贷款占比已由2010年的80%下降到2012年的69%。为了筹措资金，地方融资平台除发行城投债外，主要是通过“影子银行”融资。二是融资期限错配。从银行理财产品期限结构看，1-3个月占60%左右，3-6个月占22%，6-12个月占10%。从理财资金的投资期限看，具有高流动性的债券与货币市场工具占34%、同业存款占22%，其他项目融资类（主要包括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其期限多为1-3年）占30%，其他权益类投资占比11%，存在明显的期限错配问题。三是风险传染效应很强。由于银行理财在“影子银行”体系中的比重较大，加上与其他“影子银行”中介机构业务交叉紧密，从而形成了“影子银行”风险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传染效应，主要表现在银行表外与表内的风险传递，银行体系之间以及银行与其他“影子银行”中介机构之间的风险传递。2013年6月，我国银行间市场出现的流动性风波，就是由于部分商业银行同业业务出现期限错配和流动性风险，激发市场避险情绪，导致同业拆借利率大幅上升，恐慌情绪蔓延到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另外，随着银行理财业务与信托、券商、基金、租赁、财务公司等金融机构之间交易链条拉长、交易模式复杂化以及监管分割，出现监管空白和漏洞，致使流动性风险和交易对手风险传染效应加大。

（三）房地产泡沫风险

一是房地产过度投资导致我国经济结构畸形化。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 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8.6 万亿元，占当年 GDP 的 15.1%。在经济泡沫高峰时期，日本房地产投资占 GDP 比未超过 9%；2008 年美国因“两房”引发次贷危机时这一比重也未超过 6%。2013 年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国投资总额的 20%，住宅投资又占房地产开发投资的 68.5%。房地产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信贷，房地产业一旦崩盘，很容易造成系统性风险。二是财政收入严重依赖房地产业。2013 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 12.9 万亿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4.1 万亿元，同比增幅高达 44.6%。加上房地产营业税、契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房地产相关税费收益，房地产开发税费总计 5.7 万亿元，占总财政收入的 44.4%。三是房地产贷款占比过高。2013 年我国贷款余额为 71.9 万亿元，其中房地产贷款余额占 20.3%，贷款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 28.1%。据 2013 年半年报，房地产业的资产负债率已达 71.28%。四是房地产市场趋势性分化，泡沫膨胀与崩溃风险并存。以往一、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变化趋于一致，而且一线城市具有先导、带动作用。目前，房地产市场区域格局发生了趋势性变化，三、四线城市呈现住房和土地供给“双松”状态，部分三四线城市存在供应规模过大的风险。

（四）资金流动性风险

一是我国流动性错配累积。一方面，以“票据 + 非银”的银行影子业务规模迅速膨胀，使负债端的持续期明显变短。另一方面，大量资金流向地方政府项目，形成资金的沉淀，资产端的持续期却明显变长，资产周转率大幅下降。近几年，由于外汇占款的萎缩和产业部门回报率的下降，银行体系低成本负债资源趋于枯竭，只能用更短的、不稳定的、高成本的负债去支持其信用资产扩张，累积了信用系统的脆弱性。二是举新债还本付息现象开始增多，长期资产的现金流不能够覆盖短期负债成本。有学者计算，以非金融部门的存量债务规模计算，2012 年 1 年利息支出就逾 6 万亿元，占全年社会融资规模的 1/3。2012 年底，有 2 个省级、31 个市级、29 个县级、148 个乡镇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借新还旧率超过 20%。这些情况倒逼中央银行必须时刻保证货币市场流动性充沛，一旦央行不能及时对冲，短端利率就会快速飙升，甚至出现长短利率倒挂，导致经济加速下行和资产价格下跌，可能引发局部资金链断裂风险。三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集中到期。目前，政府负有直接偿还责任的债务中，信贷资金占到 50.5%；在所有负债中，信贷资金占到 65.6%。目前，地方债务加权平均到期时间不足 5 年，2014 年和 2015 年到期的政府债务分别达到 3.57 万亿元和 2.78 万亿元，分别占 20%和 16%。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金额分别为 2.38 万亿元和 1.86 万亿元，分别占 22%和 17%。另外，预计 2014 年将有 1000 亿元城投债券到期兑付。四是影子银行带来的流动性风险较为突

出。与国外“影子银行”投资大量标准化、高流动性的信用资产不同，我国“影子银行”大量投资的是非标资产，如信贷资产、委托贷款、信托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信托受益权等，这些债权资产流动性较差，抵押品往往是土地、房屋、机器设备等不动产，即使设置了较高的抵押率，但处置起来难度大、程序复杂，一旦出现大面积信用违约或资产价格下跌，将面临巨大的流动性风险。

三、深化改革，破解难题，化解经济运行中的风险

应对和化解我国经济所面临的长、短期风险，需要“统筹考虑整体政策与具体政策安排的关系、系统政策链条与某一政策环节的关系、政策顶层设计与政策分层对接的关系、政策统一性与政策差异性的关系、长期性政策与阶段性政策的关系”。坚持标本兼治，突出主要矛盾，既要把握好长期风险的防控，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又要防控好短期性的主要矛盾和紧要矛盾，刹住风险蔓延的势头。

（一）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格局，稳定外部需求

当前，在以要素流动和产品内分工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分工形势下，外需的内涵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守住经济增长的底线，稳定外需增长是需要的，必须保持和发挥“中国制造”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比发达国家所拥有的成本优势，保持和发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比很多发展中国家所拥有的产品性价比优势，保持和发挥外汇储备充裕、国际化经营能力不断增强的优势。

1. 分类构建立体化的对外贸易战略体系。新兴经济体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产生巨大需求，特别是电力、交通运输、通信设备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巨大。2013年我国对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俄罗斯的出口分别同比增长42.1%、25.8%、18.6%和12.6%，均高于我国整体出口增长率。要高度重视新兴经济体市场需求特点，加强与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外交与经济合作，抢抓亚非拉新一轮基建投资大潮，综合利用产品出口、工程承包、劳务合作、投资实体企业等手段，积极承揽重大基础设施和大型工业、能源、通信、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加大对新兴经济体国家高铁、核电、通信等成套装备的出口力度，带动国内技术、装备、产品、标准和服务等出口。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将降低对我国最终产品的需求，但会增加对原材料、中间零部件和配套劳务的需求。我国要加强统筹协调，适应欧美等国际市场准入标准，增强国际贸易维权能力和品牌竞争力，充分发挥在资源、劳动力等方面的传统优势，提高中间产品的质量和科技含量，提高国际市场占有率。比如，稀土在工业中十分重要，被应用于手机、平板显示器及风力发电设备等关键零部件，而全世界超过90%的稀土产自中国。我国可加强对以稀土为原料的关键零部件生产研发，提高产品附加值和市场影响力。

2. 不断提升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和水平。2012 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5319 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 1/10、德国的 1/3、日本的 1/2,这与中国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我国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餐饮、批发零售等低端服务业和采矿等资源行业,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建筑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比较低,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所占比例非常低。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是要制定行业对外投资指引和引导政策,协调引导获取资源型、转移落后产能型、技术升级型等对外投资,以对外投资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二是完善对外直接投资法律法规体系,增强法规和政策透明度,简化审批手续和环节,取消多头管理等制度弊端。三是支持私人企业海外投资。与国企相比,民营企业对外投资面临的意识形态阻力较小,成功率高,但经常会遇到国外的法律障碍。要研究给予民营企业在对外投资方面平等的政策支持,加强国家对民企投资海外的法律援助,强化民营企业在对外投资中的作用。四是加强以产业链为单位的集群式对外投资,降低个体对外投资的偶然性风险,合理应用整体优势,提高在国际谈判中的话语权。五是要充分利用国家间多边合作机制,鼓励钢铁、水泥、电解铝、炼油、轮胎等行业优势企业“走出去”,建立境外原材料基地和初级加工产品生产基地,提高跨国经营水平,拓展国际发展空间。

3. 完善对外贸易配套服务体系。一是鼓励大型流通企业集团通过收购、兼并、联合等方式整合外贸进出口公司和一些中小加工贸易企业,提高内外贸一体化流通效率,加快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贸易促进平台和国际营销网络等配套设施建设,增强对外贸易发展后劲。二是针对人民币持续升值预期所造成的贸易压力,加快外汇管理体制变革,形成稳定的本币汇率机制,改变市场对人民币持续升值的预期。学习日本等对外贸易大国由财政发债持有部分外汇储备,对冲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更多地用公开市场操作而不是用准备金率、用利率而非汇率来调节总需求,使经济更加稳定。三是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加大对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战略与宏观经济利益的重大项目的金融支持,放宽对外投资项目外汇管制,给予符合条件的跨国企业一定境外融资权。四是加强对外贸易法律、会计等方面人才培养和应用,加强对全球产业变迁、资源布局和对外贸易战略的研究,提高对外贸易软实力。

(二) 优化投资结构,夯实经济转型升级的基础

现阶段的经济的发展,投资依然对促进经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我国投资面临三重制约,即地方政府高负债、环境高负担、产能高过剩,必须在优化政府投入结构、提升投资效率上下功夫。

1. 优化城镇化投资结构,控制基础设施投资,加大公共服务领域和环境保护投入。一是加大新型城镇化的公共服务供给。目前,城市综合承载力建设,除基础设施供给不

足外，公共服务能力不足是主要矛盾。“人的城镇化”关键是要能“安居乐业”，幼有所托、少有所学、人有所居、老有所养。这就需要加大保障性住房、养老、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投入，健全相关公共服务供给与居民需求有效对接的机制。二是增加环保产业投入，保护好生态环境。生态环境也是公共产品的重要内容。目前，一般性商品基本上供过于求，清洁空气、干净水、安全食品则成为公众的关切与期盼。在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上，政府的监管作用和市场的运营作用都不可或缺，要研究建立生态和公共产品价值补偿机制。制定强制性的排放标准，强制企业安装并运转污染物的减排和回收设备。这既有利于扩大环保产业的市场，使环保成为投资热点和经济增长点，又有利于保护环境。要建立和完善规范的生态税费体系，加大生态环境治理的财税来源。

2. 加大中西部和贫困地区投资，促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中西部地区和贫困地区是我国经济整体发展的重要回旋余地，中部地区人口 3.7 亿，西部地区人口超过 3 亿，全国 14 个连片特困地区人口 2.5 亿，加大对这些地区的投资既有利于扩内需稳增长，又有利于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国家的重点基础设施建设要更多向中西部和贫困地区倾斜，有效补齐“路”和“水”的短板问题。要引导产业转移和扶持优势产业，支持劳动密集型、环境友好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引导中西部地区就近生产、就近就业、就近消费，降低社会成本。利用当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围绕龙头企业和重点工业园区，打造特色产业集群。要在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前提下，注意发挥政府建设市场、建设制度、建设信用的作用，加大基础性、普惠性领域的投入力度，减少财政直接投资或补贴。

3. 统筹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产业投资协调发展。产业结构调整要协调好增加就业和加快升级的关系，不能脱离国情盲目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要继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寻找优势，向降低生产成本、精细化管理和提升产品品牌要效益。要制定有效政策，加快中西部地区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形成中西部地区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东南亚等国家的比较优势，为我国稳增长、保就业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同时，也要形成一些紧约束，逼迫有条件的地区加快转型升级，紧跟新一轮产业重塑浪潮，合理布局新兴产业，培育适合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的科研体系、金融体系、社会文化和制度体系，形成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平稳交接。

（三）健全收入分配机制，提升扩内需的动力

从投资拉动向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均衡发展转变，是实现我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基础。必须下决心扭转投资、消费不均衡的结构，下力气调整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

1. 提高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2013 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

改革若干意见》，要认真研究落实《意见》所提出的目标、任务和措施。为此要有底线思维，确保低收入居民实际收入（扣除 CPI）增速不能低于 GDP 增速，使基尼系数三年内止升回落，五年内回到 0.4 以内。重塑收入分配公平所依赖的价值基础。初次收入分配的关键在于初次收入分配要与劳动价值挂钩，恢复多劳多得原则的社会基础和执行基础。下大力气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强化法治建设，完善全社会信息征集体系，坚决抑制不合理收入。

2. 千方百计扩大和稳定就业。我国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要充分考虑就业问题，推动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协调发展。要全面推进营业税改增值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据测算，全面推开“营改增”后第三产业的税负将降低近 1/3，有利于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如果五年内能使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由现在的 35% 提高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50%，可以新增 1 亿 1 千万个就业岗位，相当于 2013 年城镇新增就业的 7 倍。要积极支持小微企业发展，降低创业成本。小微企业是就业的主力军，要从行政审批、财税体制、金融保障、文化宣传等环节松绑，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激发市场活力、发展动力和社会创造力。要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地位、改善农村环境，构建职业农民队伍，提高现代农业的就业吸纳能力，统筹解决保障就业和“谁来种地”的问题。

3. 扩大二次分配中社保民生的比重。加快健全以转移支付、税收、社会保障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健全公共财政体系，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税收调节力度，逐步建立个人综合所得税制度，完善财产税制度，尽快建立房产税制度。推进结构性减税，减轻中低收入者和小微企业税费负担，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稳步提高保障水平，实行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卡制度，便利社保医保全国流通。

（四）深化金融改革，提高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

1. 构建多元化金融供给，建立与实体经济相匹配的金融组织体系。推进商业银行综合经营业务，提高综合服务能力和风险防控能力。健全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功能，明确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合理分隔，提升政策性金融服务国家重点战略与市场失灵领域的的能力。积极发展“小微金融”，鼓励民间资本以新设、并购和转制等多种方式设立村镇银行、小贷公司等中小金融机构，通过金融创新尤其是互联网金融创新增强服务小微企业的能力。发展融资性担保机构、保险公司等增信体系，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降低社会金融交易成本。

2. 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我国的资本市场是一个倒金字塔型，主板市场 2513 家，中小板 719 家，创业板 379 家，场外的三板、四板市场还没有很好地发展起来，导致对企业资质要求越高的板块上市公司数量反而越多，越是容易上的板块上市公司企业数量越少，这不利于实体经济发挥资本市场的融资作用和监督作用。有必要加快构建金字塔型的资本市场，扩大创业板、三板、四板市场数量，让大量中小企业、科技公司得到上市融资的机会，同时，也增加风险投资基金等社会资金的退出渠道，加大其投资实体经济的动力。

3. 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循序渐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开放。人民币国际化是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战略的组成部分，由于利率、汇率改革比较复杂及渐进式推进，资本项目开放还不完全。随着 QFII、QDII、境外人民币债券、前海跨境人民币贷款等业务陆续试点，人民币国际化和我国资本项目开放的宽度和深度不断扩展。随着国内金融市场对民营资本的逐步开放、利率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可考虑先逐步放开资本项目下的信贷类项目，如逐步扩大跨境人民币贷款试点范围；在国内资本市场及金融衍生品日益完善的基础上，再审慎放开对资本市场及金融衍生品交易项目的管制，如适当扩大对境外人民币债券境内回流的渠道，逐步扩大 QFII 的试点额度等。

4. 适应金融综合经营发展，完善金融管理体制和体系。在银行表外业务创新和以资产管理为特点的金融综合经营快速发展的条件下，现行分业监管架构以及法律法规体系已明显不适应。对金融业务的监管主体、监管规则不统一，导致监管套利和跨行业系统性风险上升。故此，一是考虑研究整合金融监管体系，形成有机统一的监管制度。近期可以在分业监管组织架构下加快推进统一监管规则，梳理、整合、完善金融法律体系，推动监管体制逐步从机构性监管向功能性监管转变。二是修改完善《信托法》，在此基础上，对各类金融机构开展的信托业务从业务分类、运作模式、风险管理、信息披露等环节进行统一规范。三是加强信息披露和投资者教育，提高各类资产池的透明度，整合现有多个金融监管部门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职能，研究制定统一的法律制度。

5. 营造稳定的经济金融环境，提高化解风险能力。要按照总量控制、分类管理、区别对待、逐步化解的原则，防范化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加大对房地产、钢铁等产能过剩行业金融风险的关注，完善市场化的风险处置机制；加强对“影子银行”体系的监管，防控银行体系风险叠加；推动民间金融阳光化、规范化，发挥对小企业融资和农村金融支持的积极作用；完善地方金融监管体系，推动地方金融办等管理机构切实担负起打击高利贷、非法集资行为的责任，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

责任编辑：刘英奎

创新应对重大环境事件思维 推动环保战略转型

杨朝飞

摘要：文章回顾了近年来我国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环境事件，分析了环境群体性事件主要分布领域及特点、发展趋势、变化特征及其网络观点，提出了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若干创新举措。

关键词：环境群体性事件 环保战略 创新思维

作者简介：杨朝飞，中国工业环保促进会会长，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

当前，环境形势严峻、环境压力增大、环境事故高发、环境群体性事件增多，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突出问题，成为环保工作面临的重大挑战，是环保战略转型必须直面解决的重要课题。只有从实际出发，创新应对重大事件的思维，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否则，只是就事论事、治标不治本，只能放任许多相同的环境群体性事件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复制重演。

一、对重大环境事件的回顾和分析

近年来，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接连不断，进入高发期。2008 年奥运会期间，北京市朝阳区因建设垃圾焚烧厂发生群体性事件，而且在很多城市都发生了类似的事件。2009 年 8 月 4 日，湖南浏阳市镇头镇数百村民，对政府有关受镉污染群众停止发放临时生活

补助的决定不满，多次到镇政府集体上访，要求政府统一安排体检和发放临时生活补助。2009年8月8日，湖南武冈市文坪镇横江村200余名村民，因血铅污染问题，聚集阻断公路，随后冲入镇政府、镇派出所以及污染企业进行打砸。2009年8月17日，陕西宝鸡市凤翔县长青镇400村民，因部分村民血铅超标，强行进入厂区并打砸办公楼和车辆设备，致4名执勤民警、厂区保安等受伤。2010年9月，由于风暴潮的影响，紫金矿业位于广东的尾矿库发生溃坝事件，受损房间达到1863间，直接损失超过9.5亿元，22人死亡，发生群体性事件。2011年9月30日，中缅合资在缅甸建设的密松水电站项目，由于群众抗议，被缅甸政府叫停。该项目于2009年启动，由中国电力投资集团等投资，总投资36亿美元。2011年8月8日，受强热带风暴影响，大连福佳大化石油化工公司PX项目防波堤发生溃坝，经抢险没有造成物料泄漏；14日上万名大连市民集会游行，要求PX项目“滚出大连”，当日下午大连市委、市政府决定PX项目立即停产，该事件平息。2012年3月，广东惠州的一个污水厂由于土地问题发生群体性事件。2012年6月29日，四川什邡市宏达钼铜多金属资源深加工综合利用项目举行开工典礼，第二天群众聚集市委抗议，后来出现打砸事件，7月3日市委市政府决定，项目不仅停建，而且今后也不再发展该类项目，事件终告平息。2012年7月28日，由于担心排海工程对当时民众生活产生影响，数千名启东市民于清晨在市政府门前广场及附近道路集结示威，并冲进市政府大楼，当日上午南通市政府宣布，永远取消该排海工程项目，随后抗议活动平息。2012年10月22日后，浙江镇海部分村民持续聚集在区政府及主要路口，表达反对PX项目的诉求。28日上午数千名群众冲击政府大门并游行，当晚宁波市政府宣布“坚决不上PX项目”，此后群众陆续散去，事件得以平息。2012年11月-12月，京沈线高铁北京段的建设项目所在地的居民，由于项目的噪音污染、电磁辐射、环评造假等问题，引发群体性事件，当地居民代表先后向有关部门反映意见，后来又开展以“晒太阳”为题的集会活动；2013年8月，部分居民又到环保部门前集体投诉。2013年4月，上海松江区多个小区的居民反对新上电池扩建项目，在网络上开始了维权行动，组建了多个QQ群讨论，动用各种方式，开展了抗议活动；5月15日，公司决定收回松江项目全部投资，并表示将把土地退还政府，不要求任何赔偿。2013年7月，在广东鹤山建设一个核燃料加工项目，因群众闹事反对，后来政府宣布下马。2013年7月，广州市花都区 and 广东清远市群众走上街头，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厂，最后导致项目下马。2014年3月30日，广东茂名市群众反对PX项目，并发生打砸事件，公安部门拘留若干人员。

二、网络观点值得关注

近年来，网络对环境群体性事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观点。

一是认为当前的重大建设项目出现了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即“不闹就上、一闹就撤”，这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成为群众表达利益诉求的基本模板，也成为重大项目从上马建设到下马收场的行进轨迹。其危害甚大，一方面，影响重大项目顺利上马，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另一方面，影响政府的公信力。

二是政府与民众在这些建设项目的博弈中没有赢家。因为群众不闹项目就上，从表面上看是政府占了上风，但是表面的平静却掩盖了群众的不满情绪，为今后的群体性事件埋下更大的祸根；群众一闹建设项目就撤，好像是民众占了上风，但是群众利益诉求的正常渠道并没有因此建立起来，今后的诉求依然不能畅通；同时，由于项目的下马，有关政府最终成为事件名副其实的输家。所以网络认为，在这些事件的博弈当中，政府和民众都是输家。

三是我国出现街头抗争型的环境社会运动。所谓社会运动，就是由过去是一些个人的上访，演变为现在的群体性上访，而且人数越来越多，此起彼伏，成为一种表达群众利益诉求的社会性运动。过去说群众“信访不信法”，有问题找政府，既可以解决问题，又成本低廉。但是现在许多群众认为，政府公信力下降，信访也已经不能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了，只有大家联合起来走上街头，把事情闹大，才能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四是群体性事件是一种暴力边缘的诉求表达方式。如果社会运动不能解决问题时，群众就会以更加激烈的行动引起政府的重视，以期问题解决。暴力边缘的诉求表达方式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包括上街堵路、静坐示威，甚至与司法机关发生冲突，打砸政府、党委等领导机关，这种现象已经多次出现，充分表达了群众强烈的利益诉求，同时也表明了群众对项目建设的看法与当地政府、党委的意见分歧巨大，双方都没有找到沟通思想、弥合分歧、融合观点、实现双赢的方式与途径。

五是我国现在环境群体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存在“共识断裂”的重大风险。社会共识是社会稳定的思想基础。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如果对重大问题的观点基本一致的话，这个社会就比较稳定；如果大多数人对重大问题的观点不一致，甚至观点尖锐对立的话，这个社会就不稳定。观点对立的背后是利益的冲突。当前社会的共识断裂主要是，一些政府官员一味地强调招商引资，上项目加快发展，增加财政收入；而增加财政收入之后再上更多更大的项目。但是，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则是希望尽快解决入托难、入学难、就业难、看病难、物价上涨、房价上涨、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生活与工作压力加大、食品药品与交通安全问题、社会治安与司法公正问题、官员腐败问题等。老百姓认为，这些年经济发展速度的确很快，但人们并没有从高速度的发展中公平合理地享受到发展的成果。我国当前环境形势严峻，与严重环境污染相伴随的是环境公平的失衡。一些企业和地方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向环境排放了大量的污染物，他们享受了发展的成果，却没

有承担相应的环境损害代价；而许多群众在没有享受到污染者的发展成果的同时，却承担了环境损害的后果。更加确切地说，一些污染项目使少数人享受了发展的成果，而多数人却承担了环境的损害。环境公平失衡成为社会不公平的一个重要方面，群众迫切要求扭转这种局面。由于这些共识断裂与认识差距，导致在环保方面的群体性事件高发。

六是关于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问题。过去人们认为，只要有了决策的科学化，就不会出现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的重大失误，民主化不民主化无所谓。但是，近年来决策的不科学化问题越来越多，决策失误越来越多。既造成了经济损失，也脱离了群众。人们观察发现，这些政策的出台和项目的上马都是通过了专家们的论证，程序合规，手续齐全，而且许多专家都是些名牌大腕。专家也是人，拿了评审费能不投赞成票吗？如果专家在会上讲了不同意见，下次开论证会时就再也不会请他来了。因此，信息公开与民主监督则是决策科学化的主要保障。

七是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时，传统的媒体正在被边缘化。在什邡事件发生以后，当时的各级官方媒体基本上不报道、不评论、不参与。但是，却不能丝毫减弱网络的评论。有人统计证明，网络上的大小文章有上万篇，阅读过的人数高达 3000 多万人，提出个人回复意见和看法的约有 15 万人。一些网民甚至批评说，没有传统传播媒体的参与我们照样可以取得胜利。党的十八大以后，官方媒体的态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引导性和批评性的评论增多，一些观点还很鲜明、很尖锐，发挥了引导性的积极作用。

三、环境群体性事件主要分布领域及其特点

经过分析统计，当前的环境群体性事件主要分布在四大领域：一是大中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引发的环境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包括铁路、公路、机场、磁悬浮、电力、垃圾焚烧厂等。二是农村和中小城镇违法排污、暗管排污、私倒垃圾与危险废物，引发的环境群体性事件居高不下，特别是重金属、有毒废物的污染等。三是大型企业由于安全生产事故引发的流域性、区域性的污染事件引发的环境群体性事件增多，如紫金矿业尾矿库溃坝以及松花江污染、龙江镉污染、渤海石油污染等。四是由于建设现代化工业项目引发的环境群体性事件大增，如什邡、启东、镇海、昆明、彭城、鹤州、茂名等工业加工项目。

诸多环境群体性事件具有九大共同特点。

第一，这些投资项目都是大型的、现代化的项目。其中许多项目的投资高达百亿元以上，甚至高达几百亿元，其技术都是国内或国际上最先进的，符合当地产业规划和国家生产力布局。如什邡项目建成后，将产生年 400 亿-500 亿元的产值；鹤山核燃料加工项目建成后，可年增产值 300 亿-400 亿元。

第二，这些项目的经济效益都很好，可以大大拉动当地的 GDP，而且可以带来高额的利润和税收。比如，什邡的项目建成后，每年可以带来 50 亿的利税；上海松江电池厂项目，虽然投资仅 10 亿元，但其产值可以高达 100 亿元 / 年。

第三，项目的审批手续都是合法的，所有应该去履行审批的部门都已经盖章，项目建设的程序合规。包括发改部门、土地部门、环保部门、住建部门、规划部门、工商部门、安全生产部门等都依规审批，符合政策和法规要求。

第四，建设项目的各项环保措施扎实，经费落实。像什邡项目的环保投资 10 亿元，镇海石化项目的环保投资 36 亿元，启东的达标排海工程本身就是一个环保项目，污染治理都可以满足国家和地方环境法规与环境标准的要求。

第五，建设项目都得到了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什邡项目是汶川地震之后，国家支持灾区重建的一个重点项目，这些项目都是经过各级政府办公会议的充分讨论，政府领导与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也都去实地进行了考察。

第六，这些很好的项目都引起了群众的不满，都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甚至出现了群众与司法机关、群众与政府和党委的冲突，而且一些冲突矛盾还异常激烈。

第七，到现在为止，这些发生了群体性事件的建设项目，基本上都是以政府的妥协让步实现最终的和解，尚没有由于群众的妥协让步而实现最终和解的。

第八，这些项目发生群体性事件的时间都很短。什邡事件从开工剪彩到政府宣布妥协让步，一共只有 5 天的时间，启东事件只有 6 天的时间，镇海事件只有 10 天的时间，大连福佳事件也只有 10 天左右的时间。

第九，这些群体性事件都造成了重大的政治损失和经济损失。政府先是决定要上项目，群众表示强烈反对，经过激烈的冲突，后来又实现了以政府的妥协让步为转折点的官民和解，这本身就是对政府公信力的一次巨大的冲击，政治损失不言而喻。有许多项目在群体性事件发生以前，就已经开工建设或是进行前期工作了，工程建设半截子下马，自然经济损失不小。这些损失都是直接或间接地由纳税人或全体人民承担了，这个问题应当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四、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趋势及其变化特征

（一）当前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六种发展趋势

一是从农村环境纠纷上访向城市民众走上街头蔓延。早期的环境投诉大多发生在城市，因为那时的工厂和企业大多建在城市。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许多城市大规模关闭或搬迁污染企业，许多污染企业搬迁到了农村，或是进入了工业园区。城市环境随之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必须承认，这样的城市环境改善在一定

程度上是以牺牲农村环境为代价的，所以，一度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高发。但是，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又重新回到了城市，而且以群众走上街头为特征的城市群体性事件的规模 and 影响，都已经大大超过了农村，这是当前出现的一个新趋势。

二是从个人的环境利益诉求向社会群体性的环境利益诉求发展。环境诉求的人群有扩大的趋势，个人环境诉求虽然没有减少，但是集体性的环境诉求在大幅度上升。不仅直接利益相关人要表达环境诉求，而且没有直接利益的相关人也要表达环境诉求。

三是从环境污染的民事纠纷向反对新建项目上马扩展。过去是群众在遭受环境污染以后，走进政府表达环境诉求。而现在许多工业项目还没有开始建设，还没有产生环境污染，还没有对群众的健康和财产造成损害，群众就要走上街头表达反对意见。

四是从工业污染项目向环保项目延伸。过去，群众反对污染项目，支持环保项目；可是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群众不仅要反对工业项目，而且也反对环保项目，特别是反对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建设。

五是民众从过去对企业的抗争逐步转向对政府的抗争。过去污染受害群众与污染肇事的企业冲突较多；近年来发生的多起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主要表现为群众与政府的对峙和对抗，作为建设单位的企业却很少公开出头露面地表达意见，企业似乎退出了矛盾激烈冲突的漩涡。这是因为政府要招商引资，政府拿着优惠条件，求着大型企业来投资上项目，所以，群众的反对意见也要由政府去摆平。过去企业躲不开，因为群众总是直接找企业表达环境诉求；现在政府比企业还想上项目，项目是政府引进的，是政府求来的，所以，有了矛盾政府必然要身先士卒，冲在与群众对立、对抗的第一线。

六是由原来单纯的环境事件正在逐步与复杂的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如惠州项目涉及到土地征用的问题，因为污水处理厂的土地被政府卖了钱；镇海的项目也是与征地、房屋拆迁问题密切相关。

（二）环境群体性事件的七大变化特征

一是群众诉求覆盖的领域更加广泛。过去要求赔偿污染损失，现在是要求维护公民的集体环境权益。他们认为，在城市附近建设大型石化项目，将会影响全体市民的环境；在小区建立垃圾焚烧项目，也将会影响小区居民的环境。从反对老污染源到现在反对新建项目；从反对工业污染项目到现在反对环保项目。

二是环境诉求的目标在不断升级。群众环境诉求由过去要求解决污染问题，保护个人的环境权益；现在已经扩大到要求政府和企业公开环境信息，要求参与一些重大项目的决策，也要求解决环境公平失衡的问题。这个方面的环境诉求日益增多、日益强烈。

三是诉求表达的方式趋于激烈。一些地方的群众依然通过上访请求政府解决环境问

题，但另一些群众则以走上街头，堵塞交通，冲击政府机关，向政府表达环境诉求，请求政府解决问题。

四是诉求表达的渠道更加现代化。目前，群众表达诉求的平台不完善，表达诉求的渠道不畅通，信访是唯一的、大众化的渠道。因此，老百姓开始为自己搭建表达诉求的渠道，他们普遍选择了网络渠道，其好处是时间快、成本低、影响大。如启东事件发微博 10 万条，群众 90% 的相关信息是从网络上得到的，而不是依靠官方媒体报道或是传达文件获得的。

五是诉求表达的形式日趋多样化。如大连福佳 PX 项目的群众采取到广场晒太阳的活动；上海松江群众采取配戴绿丝带的形式；昆明群众上街的统一标志是戴口罩，导致当时口罩一度脱销。

六是应对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方式依然落后、被动。许多地方官员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思维模式，甚至一些官员怀有个人私利。比如一些官员认为，引投资、上项目、增长 GDP，有利于个人升迁，其执政理念仍然处于极力主张多上项目的视角。当然，现行的财税体制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群众闹事了，先是压制，压制不下去了，马上态度 180 度大转弯，立即决定项目下马，本来应该上的项目也随之流产。因为这些官员十分清楚，如果群体性事件处理不好，出现失控局面，自己的乌纱帽就保不住了。这就是为什么“不闹就上、一闹就下”的深层次原因之一。

七是许多政府部门的工作存在着漏洞与不足。首先是信息不公开，许多官员认为环境信息公开越多工作上的麻烦也越多，因此，对相关环境信息公开的少、公开的晚，信息公开流于形式。其次是环评作假。比如秦皇岛垃圾焚烧厂的群体性事件，环评单位在上报的文件中说，群众 100% 同意。群体性事件发生以后，记者调查发现，在被调查者的名单中，有的人常年在外打工没有回家，有的人是监狱的在押犯，有的人已经去世多年，更多的人声称自己从来就没有接受过调查。上海松江的电池项目，环评单位说一共发出了 150 份调查，100% 收回，其中，68% 支持，14% 有条件支持，16% 无所谓，只有 2% 的人反对。但是，当项目对社会公开后，许多群众走上街头说我们是“被同意”的。

五、有关环境群体性事件的争论与探索

在对以上情况分析基础上，我们是不是应该质疑，面对高发的环境群体性事件，现行应对重大环境事件的指导思想与思路是否符合实际情况？政府对重大项目的决策程序与决策方式是否符合群众的意愿？政府工作是否有值得反思的地方？主要有以下代表性的观点值得质疑与反思。

一是经济优先的认识仍然主导着项目能否上马和如何应对群体性事件。在许多有关

PX 项目讨论的会议上，不少官员和专家认为，PX 项目有市场，而且经济效益又很好，经济发展也需要，因此，不能因为群众反对就不上。其实群体性事件问题的实质不在于项目应该不应该上，这些项目经济效益好是毋庸置疑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项目上马应该由谁来作出决策？应当以何种方式进行决策？能否保证群众利益不受侵害？无视群众参与决策，无视相关群众利益保障，而自认为项目应当上马的思想本质，还是一种经济发展优先和崇尚 GDP 的观念主张发挥了主导作用。而信息公开、民主监督、基层协商、群众参与决策等，正是当前国家政治改革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却被一些人抛出了应对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的视野。

二是要提高群众的觉悟，防止坏人闹事。一些人坚持认为，好项目不能顺利上马的主要原因是一些群众自私，没有考虑到当地发展的整体利益；一些人认为，群众目光短浅，没有考虑到未来的长远发展；甚至一些人认为，群体性事件是别有用心的人在与政府作对。去年国内一家有影响的报纸评论认为，环境群体性事件是意见领袖为了捞取政治资源，反抗中央政府而带领群众所为的结果。

三是应当加大对群众普及科学知识的力度。普及科学知识对任何人群，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很重要，是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战略举措。但是，以此应对环境群体性事件并不恰当，受到了人们的很多质疑和批评。如广东鹤山的核燃料加工项目，项目公示风评报告后第二天群众上街反对，鹤山市和江门市针对主要人群分别举行了三场有关核燃料加工的科普宣传，而且聘请了清华大学的著名教授，给江门市政府的各级官员讲课。大规模的科普并没有扭转公众的认识，最后政府还是不得不依照民意，宣布取消该项目的建设。许多群体性事件的本质并不是科普的问题，而是环境信息要不要向群众公开的问题，政府在对重大项目建设作出决策之前要不要群众参与的问题。

四是要依靠增加或强化政府的行政审批，来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2012 年国家有关部门印发了“关于国家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开展社会风险评估”的文件。这种用产生问题的思路去解决问题的方式，不仅不会减少问题的发生，反而还会导致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当前的许多问题往往是由于过度依赖行政审批造成的，而现在许多部门又要依靠增加新的行政审批来解决问题。多设一个行政审批，就要延长项目的审批时间，就要增加项目的前期成本，评估文件的费用最终都要摊进项目的成本里，而且依靠行政审批并不能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2013 年鹤山的核燃料加工项目完全证明了这一点，3 月份鹤山市政府和中核集团公司签定引进该项目，而且在鹤山公示之后群众并无不同意见，由江门市发改委公布了该项目的社会风险评估报告后，当即引发群体性的抗议事件。所以，靠政府增加行政审批，是不可能规避项目建设的社会风险的。

五是在发生群体性事件后，要求一级抓一级，以层层领导负责来化解矛盾。这是一

个传统的工作方法，问题出来后，主要领导同志不深入一线，不直接听取群众意见，只是简单开个会，要求各个单位一把手负责，要求各单位管好自己的人、管好自己的家属，以为层层抓落实，就不会出问题了。各单位一把手在会上都做了很好的表态，结果群体性事件还是发生了。传统的工作方法实际上是一个懒政的方法，把责任推给下级的做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六、创新应对群体性事件的思维

不能用产生问题的思维去解决问题，因为这样不仅不会解决问题，反而会使问题更多、更加复杂。因此，必须依靠制度创新，创新应对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思维模式。

第一，协调发展，保护环境。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非常重要。我们必须下决心改正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模式，真正转到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上来。上项目也好，搞基础设施建设也好，一定要考虑到公众的幸福指数。有人评论，我们现在这种崇尚 GDP、招商引资的发展方式，实际上是以资本为中心的执政理念，过度强调经济发展就会忽视民生问题，忽视环境问题。目前，在很多政府官员的头脑里面，还是先把经济搞上去，环保的事慢慢说，讲白了还是先发展经济、后治理环境的思路。

发展的目的不是为增长 GDP，增长 GDP 只是手段，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这已成为世界性的共识。2011 年第 65 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非约束性的决议草案，建议世界各国“走全面发展之路”，将“幸福”的概念纳入“国家发展指数”的考核中。2012 年，联合国首次发布“全球幸福报告”。该报告比较了 156 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幸福程度，检视了各个国家居民的幸福状况，展示了新的幸福科学研究是如何解释个人幸福和国家整体幸福的变化。与此同时，许多国家越来越看重“国民幸福”问题。法国提出对经济发展测量体系从“生产导向”转为“幸福”导向；英国将“公民幸福”作为政策制定的新依据；OECD 公布“幸福指南”和“更佳幸福指数”，“更佳幸福指数”包括居住、收入、就业、人际关系、教育、环境、健康、政府治理、生活满意度等。不丹更是提出，用“国民幸福总值”取代“国民经济总值”，并立法规定，政府制定政策不是以经济利益为考虑基准，而是以所能带来的幸福快乐为出发点。为了确保该项法律的落实，不丹还设立了一个权力很大的“国民幸福指数审查委员会”，对各个大型建设项目具有“一票否决”的权力。参照国际的先进理念，我们对执政理念也应进行反思和调整，执政理念一定要下决心从以增加投资为本转到以人为本上来，从以经济利益作为项目能否上马的衡量标准转变为以居民幸福程度作为衡量标准。

第二，转变职能，服务社会。政府职能转变是改革的一个重点，转变职能的核心是处理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政府减少对企业的行

政干预，可以增强企业和市场的活力；政府减少对社会事务的包办，通过购买服务，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让政府从具体的经济利益纠葛中独立出来，让政府真正成为公共利益的执行者、经济利益的平衡者、公众利益的责任者，也让政府的身份从运动员变成裁判员。而现在政府的身份既是运动员，也是裁判员。环境群体性事件反映出来的问题，不在于项目该上不该上，也不在于项目是否有很好的经济效益就必须一定要上的问题，而在于政府应该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政府的角色应当是管好该管的事情，放手不该管的事情。

第三，重塑诚信，增强公信力。这是一个作风问题，也是一个执政理念的问题。政府官员一定要从对群众负责的角度出发，认真履行职责，扎扎实实干好每一件事情，兑现自己的每一个承诺，不说空话，不说大话，不说假话，不说兑现不了的话。兑现说过的每一句话，干好承诺的每一件事情，真正取信于民。一些政府官员急于求成，为了早日干出政绩，对群众的各种诉求一味迁就退让，不顾条件是否成熟一概承诺，事后又不重视抓落实，不兑现承诺。一些政府官员文过饰非，只要是前任官员的承诺一概推脱不管。凡此种种都影响了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都为后面的群体性事件留下了难以根除的祸根。

第四，平等对话，参与决策。传统的项目决策是由政府和企业互动的过程中作出来的；现代的项目决策是由政府、企业和公众互动的过程中作出来的。政府、企业、公众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重大决策机制，这个三角形的决策机制是一个相互协商、相互妥协、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关系。而在现行的三角形的决策机制中，群众在审批过程中没有应有的位置，这是发生群体性事件一个基本的原因。为此，我们要建立政府、企业、公众协商的机制和协商的平台。平台建立之后，政府要真正听取群众的各种诉求，包括环境权益的诉求，合理的问题要帮助解决，不合理的问题要讲清原因，当时能解决的当时解决，当时解决不了的逐步解决。建立和维护政府、企业、公众三者共同参与的三角形重大决策机制，必须要解决政府、企业与群众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为此，必须做到信息公开，信息公开是政府、企业、公众平等对话和决策的前提。在信息公开方面，环保本身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环评报告书不能真正公开。如什邡建设项目的环评报告书有 900 多页，公开的环评简本报告书只有 80 多页。今后不仅要公开环评报告书的全文，而且要建立“不公开事项保密专门申报制度”。因保密不能公开的部分内容，应向政府说明不公开的保密理由；否则，政府、企业与群众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很难建立起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关系。

第五，平衡利益，兼顾各方。应该看到，即使是再好的政策、再好的项目都会对不同人群利益产生正面的或是负面的影响，都会无形地改变现有的利益格局，都会对现有的利益格局形成冲击。北京一个垃圾焚烧厂的做法很有创新性。过去群众对建设垃圾焚

烧厂很有抵触情绪，后来垃圾焚烧厂和居民开展对话，全面了解群众的诉求，然后从实际出发，探讨群众可以接受的方案。通过协商，垃圾焚烧厂向居民做出承诺：一是企业所发的电以半价供应居民用电；二是垃圾焚烧厂帮助小区绿化，清除卫生死角，完善基础设施，客观上可以保证居民房价不仅不会下降，反而可以上升；三是企业向居民全面公开环境信息，既然群众担心焚烧炉温度过低将可能产生二恶英污染，那么，企业就全面公开环境信息，欢迎群众随时进厂监督，让群众放心。垃圾焚烧厂和群众达成协议后，项目建设非常顺利。国际的通常做法，投资方在哪里兴建企业就一定要给当地居民带来好处，比如，帮当地建学校、建医院、修公路等。企业为当地居民带来的好处越多，自然当地居民就越欢迎企业落地。从政府的角度，要注意不断调整企业和居民的利益、局部居民和整体居民的利益，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平衡利益。群众的利益平衡了，取得了企业与居民的共赢，矛盾就可以顺利化解。用市场化手段化解社会矛盾是今后政府的重要工作方法。

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在众多的城市环境群体性事件的背后，都有存在着一些大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如一些房地产开发商明确反对这些建设项目的上马，他们往往是 PX 项目、垃圾焚烧厂项目等建设的最大利益受害方。这些人不会公开站到反对项目建设第一线，但是他们的能量不容忽视。

第六，依法行政，建立多元化的环境监管体制。依法行政：一是要严格按照环评要求，向群众公开环境信息，对未履行承诺的单位要给予处罚；二是对在环评中出具虚假信息的单位和个人要给予严厉的处罚；三是建设批准的工程项目必须保证质量，要严格追究豆腐渣工程有关人员的责任。

建立多元化的环境监管体制：因为政府不可能包揽全部环境事务。过去强调政府主导的环境监管体制，政府要大包大揽，结果包揽不下来，越包越累，环保监管工作也不能做好。另一方面，政府也要接受监督，这是因为现实的环境监管工作中的确存在着不少政府不作为、乱作为、主观决策等不当行为，削弱了环境监管，损害了环境质量。只有让政府也处于被监管的位置，才能避免上述问题的产生。

第七，关注舆论，慎重应对。网络的作用已经超过了传统媒体的作用，用传统的手段不能控制住网络。一是传统的政府管制方式的作用是有限的；二是传统的媒体控制方式的作用是有限的；三是传统的思想工作方式也是有限的。

综上所述，应对群体性事件必须首先创新工作思路与工作方法，否则，难以走出持续多年的“不闹就上、一闹就撤”的尴尬与被动的怪圈。

责任编辑：刘英奎

化解过剩产能的思路与出路

——兼论推动东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

陈文玲

摘要：文章分析了形成过剩产能的内外部原因；提出了把推动东部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有序转移作为化解过剩产能的重要手段，同时，在我国形成更优、更强产业布局和产业能力的主张；设计了化解过剩产能的指导思想，预测了需要积极防范的可能风险，提出了需要研究配套的政策措施。

关键词：过剩产能 产业转移 产业布局 产业能力

作者简介：陈文玲，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兼战略研究部部长。

化解产能过剩是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也是这次“两会”上代表们议论的热点，对产能过剩问题必须高度重视并下决心化解。中国受产能过剩问题困扰多年，特别是行政性过度过剩的产能和对资源环境产生巨大负能量的过剩产能，不仅给中国国内经济转型带来了困难，还使我频遭国际贸易“双反”狙击，是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顽疾。要解决这一难题，必须坚持正确的思路，并选择正确的出路。

一、正确认识形成过剩产能的外部原因，世界通过制造业产业转移和资本等要素重组形成一个国家产能累积，是近现代全球经济的一个普遍现象

从世界经济的大背景看，近现代世界制造业转移遵循一个基本规律，即产业的转移带来了产能。世界制造业转移和要素重组经历了四个大过程。

第一轮世界制造业产能集中在欧洲。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是世界制造业基地，也是近代走在世界前列的工业革命国家，当时德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 30%。但是，随着英国、德国等国家生态资源消耗、劳动力成本上升，世界制造业进入了第二轮产业转移阶段。

第二轮世界制造业产能集中在美国。全球制造业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美国的工业革命带来了制造业繁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制造业产值曾经长期占世界制造业产值的 50%，成为二战以来第一制造业大国，该称号一直保持到 2011 年被中国打破。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美国制造业产值仍占世界的 30% 以上。上世纪 80 年代，美国出现了 4 次严重的产能过剩，除了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在国内化解外，开始向国外转移过剩产能。

第三轮世界制造业产能集中在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世界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到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当时，日本制造业产值最高峰占到世界制造业产值的 16%。实际上，日本上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很多产业如材料产业都出现严重过剩。日本通过产业政策和产业链重组化解过剩产能，把产业链的下游、中游转移到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形成了以日本为领头雁的“雁型模式”。

第四轮世界制造业产能集中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和一批发展中国家。世界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加快，中国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已经成为第一制造业大国，建成了完备的工业体系，快速形成巨大产能。2011 年，中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 19.8%，美国占全球 19.4%。

因此，2000 年以后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持续存在的重要外部原因之一，在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是全球第四轮产业转移的承接地，加之建国 60 年形成的工业基础，使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中国产能、产业体系、产业能力的形成，既是世界制造业转移的结果，也有过度行政干预造成的产能，还有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中集中投资快速积累的产能。中国制造业从 2011 年首次超过美国，目前占世界制造业产值超过 1/5，但

中国制造业的整体竞争力和核心竞争力仍亟待提升，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也亟待调整，推动东部产业有序、有效、有选择地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通过产业空间布局的调整带动和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把已经形成的优势产业基础和产业体系更长时间、更大范围地留在境内，从而顺利完成中国工业化进程，实现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

美国、英国、日本等老牌工业化国家和亚洲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都经历了区域内产业转移和调整的过程，利用生产要素区域流动的规律延长或强化制造业，保障本国完成了工业化的进程。英国 1928 年出台《产业转移法案》，在工业部和环境部下设区域办公室，地方政府下设各大省市布局委员会和开发局，通过产业转移和优势互补促进经济竞争力提高，促进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和国家内源性发展。美国把产业转移纳入国家经济发展计划轨道，制定中长期指导计划和法律法规，保障产业转移政策的长期性和稳定性。日本制定产业转移和重组战略，确保本土企业处于产业链的上游，采取“进口－国内生产－出口”的承接产业转移路径，强化了制造业。

二、认识形成过剩产能的内部原因，进行有效分类， 以新思路和新举措，消除体制性过剩和绝对性 过剩，化解结构性过剩，避免周期性过剩

适度过剩是市场经济常态，通过优势劣汰的竞争规律，可以使社会平均利润率发挥作用，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但是，适度过剩、绝对过剩、行政性过剩，不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无规制经济和行政过度干预的产物。

（一）中国产能过剩的类型

当前，中国的产能过剩主要有周期性过剩、结构性过剩、体制性过剩和绝对性过剩四种类型。

一是周期性产能过剩。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产能不断地增长。1998 年中央政府提出“遏制产能过剩”，当时钢铁产能是 2.5 亿吨，经过若干轮宏观调控抑制产能，钢铁产能仍然从 2.5 亿吨上升到 10.5 亿吨，这其中就有周期性产能过剩的部分，这部分产能是伴随着经济周期、经济发展需要的产能增长。问题是，在此过程中一些行业的产能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经济发展速度。

二是结构性产能过剩。以钢铁为例，目前总产能 10.5 亿吨，产量 7 亿多吨，但仍然是结构性产能过剩，因为中国生产的大部分钢铁是粗钢和一般钢材，大量五星级建筑钢

材、军事原材料和大飞机制造所需钢板，以及很多高端钢和特型钢，都需要进口。一方面我们大量出口粗钢，另一方面大量进口特种钢、异型钢或高端钢，这种过剩是结构性产能过剩，低价、低质钢材过剩，高端钢材不足。

三是体制性产能过剩。这种产能是在地方利益驱动下、GDP 导向下产生的巨大产能过剩，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落户大项目、行政性干预的结果，这种体制性产能过剩，是最难解决的大问题。中国制造业结构中重化工比例目前已经高达 71%，原来传统优势产业，如服装、箱包、鞋帽、纺织、玩具等，下降到 29%。这种产业结构急剧变化，特别是重化工超前发展，沿海、沿江、沿河近 3 万家重化工企业，是体制性产能过剩的主要表现。

四是绝对性产能过剩。例如，中国纺织品贸易额占了全球 30% 以上，全世界平均每人购买中国 3 米布、2 件服装、2 双鞋。即使以全球市场需求来计算，国内产能也明显过剩。还比如光伏产业、生化制药产业，中国的产能全球市场都消化不了，这是绝对性产能过剩。

要化解过剩产能，一方面要分类、分级、分业、分步进行分别处置，还需要在处理方法上运用创新，既要保持中国制造业全球竞争力，又要把长期积累的弊端和问题，特别是把严重的过剩产能逐步化解掉。应把工作重点放在消除体制性过剩和绝对性过剩，化解结构性过剩、力避周期性过剩上。

（二）处理和化解产能过剩的突破口

在处理和化解过剩产能方面，可考虑从五个方面寻求突破。

一是把化解过剩产能与形成新的产业布局结合起来。通过创新驱动、高端产业带动，在产业布局、产业升级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比如日本曾经采取的产业政策，通过提高产业标准、产业进入门槛等办法，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当前，中国产业结构除了重化工和消费工业品严重失衡外，产业布局也严重失衡，应推动东部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有序转移。通过创新驱动和产业转移，在产业转移中实现产业升级并形成新的产业布局。

二是把化解过剩产能与形成新的区域布局结合起来。再造更多的经济增长点和增长引擎，必须寻求重大突破，应推动东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在转移中实现优化区域布局。例如，在调研中发现，浙江一个纺织集团向新疆库尔勒等地区转移产能，形成了面向国际市场的一流生产能力，产业规模达到 1000 万锭。

三是把化解过剩产能与形成新的贸易、投资布局结合起来。除了国内产业转移外，还应顺应贸易流向、贸易生成地、主要贸易伙伴所需贸易货物，以最小的物流成本和最合理的物流流程设计，来考虑中国制造业在这些贸易生成地的布局。比如，向新丝绸之

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欧亚大陆桥沿线、长江中上游流域和广西建成面向中南、西南战略支点等重要地带成套转移产业链和配套服务能力。国家综合战略设计要有制造业基础，特别是高端制造业基地。另外，中国在沿边规划设置了 10 余个跨境经济合作区，也是中国制造业带动周边制造业共同发展的重要平台和载体。

四是把发挥制造业优势和贸易优势结合起来。中国目前是 120 多个国家最大贸易伙伴，是 70 多个国家第二大贸易伙伴，和五年前美国的情况相似，但五年之后中国的贸易和制造业在全球的地位和美国的位置互换。因此，必须在制造业和发挥中国贸易优势的结合上寻求突破，形成制造业与国际贸易融合参与全球竞争的新优势。

五是把化解过剩产能和形成新的市场布局结合起来。应发挥中国已形成的市场优势，这一独特优势是难以复制的，比如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已经成为全世界小商品的风向标，应该把这种优势复制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使现代流通成为带动制造业转移、产业重组和要素集聚，走向国际市场的引导性力量和先导性力量。

应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仍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中后期、城市化发展的中后期、农业现代化的初期，仍处于加快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是经济大国转向经济强国的关键期，需要制造业支撑将是一个很长历史时期的客观要求。在中央提出解决产能问题“四个一批”中，重中之重是“消化一批”，必须在需求端下功夫，将我们的产能变为即期和奠定未来几十年基础的巨大供给，这是一篇大文章。建议除党中央、国务院在已形成的战略安排外，对有可能形成支撑国家战略安全、经济中长期持续发展的战略安排、新经济发展带、关键性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等方面，作为消化和利用好产能的最大出口，把巨大产能变为难以复制和短期内难以抗衡的新优势。同时，还要向国际市场输出我国已经形成的先进产业能力，如高铁、智能电网、大型装备等。

三、把推动东部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有序转移，作为化解过剩产能的重要手段，同时在中国形成更优更强的产业布局和产业能力

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四国时提出并深刻阐述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将推动建立一个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的市场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李克强总理最近提出，中西部地区是中国经济的最大回旋空间，实行差别化经济政策，推动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不仅与习近平主席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高度契合，有利于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战略支点，也有利于中国拉长战略机遇期、经济

发展周期，并顺利完成工业化进程。化解过剩产能，其中一条重要出路是推动东部产业和要素向中西部转移和流动，形成未来支撑中国更长周期发展的产业布局和产业能力，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产业支撑，这是新形势下党中央正确和智慧的战略选择。

中国通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努力，包括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和代价，成为几代人梦想的制造业大国，应从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更持久的时间维护国家战略安全与发展利益的高度，整体谋划和设计中国产业布局 and 产业结构的优化，强化中国制造业基础并提升能力，其中，推动东部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在转移中推动产业转型并形成更优的布局，是我们当前应采取的重大战略。

这是中国拉长战略机遇期、经济发展周期和顺利完成工业化进程的战略选择。要实现中央提出的稳中有为、稳中有进、稳中提质，实体经济不能削弱，实业基础不能削弱，制造业不能削弱。把制造业关键产业的产业链高端和产业配套能力留在境内，形成东中西、东北地区以及周边国家互动互补互利的崭新布局。在推动东部产业、产能和要素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和流动中，形成更为合理的产业布局 and 产业链重构。逐步改变中国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和服务链处于中低端的现状，向高端迈进，推动重大科技创新，占据突破性技术的高端，这是中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性战略步骤。

这是促进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区域差距、创造区域发展新优势的战略选择。通过推进东部产业和要素向中西部转移，把中西部发展起来，这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应有之义。受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加强的“推力”与中西部地区资源禀赋和要素成本比较优势的“拉力”双重作用，部分产业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是大势所趋。西部地区人口 3.6 亿人，市场比非洲还大，加上中部 6 省的几亿人口，这是一个蓄势已发的巨大市场，是中国在外需受阻情况下最大的内需替代市场。

这是应对美国“亚太战略”、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支点的战略选择。从国家安全战略看，要应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迫切需要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等周边国家和地区加强合作。亚洲成为全球发展的引擎和重心，中国中西部处于亚洲的中部，处于向西开放的战略前沿，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强化中西部地区的制造业基础，形成若干现代产业的基地和高地，打通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的运输大通道，形成连接东亚、西亚、南亚的交通运输网络的迫切需要，是我加强与中亚、西亚、北亚国家经济、交通、人文互联互通的必要保障。“丝绸之路经济带”将联动亚欧 30 亿人口的巨大市场，甚而影响更深远的亚欧经济新版图。中国西部地区既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起点，也有若干重要节点，以点带面，从线到片，可以迅速使这个地区成为跨国、跨区域大合作的重要战略支点。

中西部已具备了承接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的基础和能力，产业在转移中转型升级和优化布局恰逢其时。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不仅显著改善了中西部、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因素得以消除，能源供应能力、产业配套能力、金融服务能力、技术创新能力显著提高，出现了一批具有人才集聚、资本集聚、产业集聚的新引擎和新高地。中西部地区已具备了优于周边国家和更远国家承接产业转移的条件和基础。优化在这个区域的产业布局，提升产业发展能力，对中国扩大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辐射力、带动力至关重要。

化解过剩产能，推动新一轮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与过去历次不同，是在应对全球新一轮冲击波和国内经济下行之时的主动作为，是从企业自为状态、零散状态转向战略谋划和有组织实施的大动作。从拉长国家战略机遇期、经济发展周期、巩固制造业大国地位和争取成为经济强国的高度出发，在推动产业转移和产业重新布局时要把握好几个关系。

处理好产业转移与产业转型、产业优化升级的关系。产业转移要与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要与保护资源环境相结合，要与本地主导主业相结合。要提高产业集群配套能力，提高招商门槛，不能使一些落后产能企业和污染企业趁机进入，把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彻底抛弃。不能脱离传统产业去承接产业转移，要从弥补传统优势产业的短板链条出发，有针对性引进缺失链条，补强薄弱链条，促使承接产业转移和传统产业发展形成良性互动，也要与加强自主创新相结合。传统优势产业已经处在改造提升和转型升级的关键节点，要平衡引进产业和本地企业的关系，要渐进式地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传统优势产业平稳发展，也要注意引导本地企业强化与承接的大型企业集团的配套协作，这样才能解决好发展与土地、资源、环境等之间的矛盾，实现多赢。

处理好产业转移与产业互动、产业互补的关系。产业转移要有利于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这既是贯彻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推动中西部地区跨越式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推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率先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然要求。可以有选择性地开展城市结对，如地域相邻的省际城市结对，由于两地相邻、交通方便、习俗相近，更容易沟通和衔接，可以作为产业转移的试点和先行区；产业类型相近、资源优势互补的城市结对，特别是东部地区纺织服装、建材化工、塑料制品、机械电子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压力，而中西部地区部分城市又有这方面的资源原材料、产业基础和发展需要。这些城市结对后能很好地为产业转移提供平台。要鼓励中西部地区通过委托管理、投资合作等多种形式与东部沿海地区合作共建产业园区，积极探索承接产业转移新模式，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支持中

西部毗邻地区之间合作共建产业园区，创新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实现资源整合、联动发展。

处理好产业转移与新一轮区域布局、对外开放布局的关系。要按照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要求，在产业转移、新一轮区域合作和扩大对内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加强区域互动合作，建立利益共享机制，实现良性竞争、互利共赢，把承接产业转移与加强区域分工合作结合起来，创新合作方式，探索建立利益共享机制，调动承接方与转移方两个积极性，注重区域内科学布局、有序承接，促进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良性竞争、互利共赢。

处理好发挥已经形成的产业转移承接带与建设新的承接带的关系。要从各地实际情况出发，立足比较优势，合理确定产业承接发展重点，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要推动建立省际间产业转移统筹协调机制、重大承接项目促进服务机制等，引导和鼓励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有序转移。在中西部条件较好的地方设立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充分发挥其典型示范和辐射带动作用。做好产业转移与对口支援、对口帮扶工作的衔接。同时，也要加强沿海其他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互动，进一步密切合作。要发挥皖江城市带等承接转移带的支撑和辐射作用，带动皖北、皖南、皖西联动发展，实现中部地区整体协调发展，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处理好产业转移中政府、行业组织、市场和企业的关系。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减少行政审批，简化办事程序，提高服务效率。推动相关行政许可跨区域互认，做好转移企业工商登记协调衔接。要把承接产业转移与引导资源优化配置结合起来，遵循市场规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突出企业主体地位，促进各类企业及要素资源向承接地带有序转移。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搭建产业转移促进平台，提升各类大型投资贸易会展活动的质量和水平。

处理好产业转移中“四个一批”的关系。中央提出在对待和化解过剩产能的过程中，实施“四个一批”政策，即“通过扩大内需，消化一批；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向海外转移一批；优化组织结构，兼并重组一批；严格环保安全能耗标准，淘汰一批”。西部有广阔的市场，可能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消化一批东部过剩产能；西部地区与国外接壤省份较多，可以充分发挥沿边优势，在向国外转移一批过剩产能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连接与推动作用；西部地区还可以发挥资源与劳动力成本优势，在实施优化组织结构、兼并重组一批过剩产能的过程中，发挥承接与转移作用。东、西部地区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只要把环保、能耗、质量等执法检查做好了，通过市场化手段，一些不好的企业会自动淘汰。

四、化解过剩产能需要设计正确的指导思想，积极预防可能的风险，研究配套的政策措施，在整体推进这场硬仗中立于不败之地

从后发优势看，中国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区域主要有四大板块：西南、中南地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新欧亚大陆桥等向西开放战略通道中的重要节点；长江黄金水道与上游流域整体开发；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在产业转移中应“以线穿点、以点带面”，不能遍地开花，不能搞大呼隆，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一）总体指导思想

应对全球新一轮冲击波和国内经济下行风险，通过推动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有序转移，积极化解过剩产能，带动中国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经济结构调整优化。推动产业转移从企业自发状态、自为状态、零散状态转向国家进行战略谋划和规划、主要靠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和企业选择的有组织实施的重大战略。在产业转移中合理确定承接产业和发展产业的重点，既要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也要防止高水平重复建设，提高产业集群、产业集中、产业集成、产业集聚的水平，提高产业配套能力和产业链拓展能力，加快形成东中西互补互动的产业新格局。

（二）在化解过剩产能中注意防范风险

一是防止过度生硬的行政手段。现在不少地方政府把化解产能过剩作为政绩考核指标，或将化解任务压到各级政府，采取强制性手段摧毁产能。更应该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创新机制，形成市场对过剩产能特别是落后产能和绝对性过剩产能的“倒逼机制”，加快使其退出。

二是在产能退出过程中严密关注金融风险。在产能化解过程中，一些企业可能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使其银行贷款变成坏帐。因此，应对分步化解多少产能和哪一类产能，做出财政和金融风险预估。特别是要有针对性地防范金融风险，还要高度关注由此对地方债务产生的直接、间接影响，务必防止对政府财政收入和银行贷款造成大的冲击。

三是要防范失业的风险。特别是那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和企业，在过剩产能化解过程中，应研究如何合理安置这些剩余劳动力。防止在化解产能过程中产生严重的失业问题，政府和企业应同时发挥作用，做到既化解过剩产能，又不引起社会动荡。

四是要防范可能的产业空心化。对于中国的产能过剩，应采用两分法的辩证思维，一方面，要认识到制造业产能是综合国力重要标志；另一方面，要认识到过剩产能特别是严重过剩产能、绝对性过剩产能对整个经济肌体的危害。因此，需要防止美国、日本等国家产业转移中出现的产业空心化问题，向国外转移一定要适度，应注意将高端产业、关键零部件和核心研发能力留在国内或周边与我友好的国家。

（三）化解过剩产能和产业转移应采取有效措施

化解过剩产能，应采取突破性的差别化政策，鼓励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优势产业和承接东部过剩产业转移，形成有利于支撑中国迈向经济强国的产业布局与产业结构，关键在于用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政策，并研究制定新的差别化政策。

加大对关键性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加快西部地区与东中部地区联系的区际通道建设，重点建设西部地区连接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的出海通道，以及西南地区连接西北地区的南北通道。加强与东北亚、中亚、东南亚、南亚地区互联互通的国际通道建设。建设承接产业转移和要素集聚的战略平台。

制定鼓励产业转移的差别化税收和金融政策。如对东部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转移并达到转型升级要求的企业，可考虑比照改革开放初期优惠的税收政策，如“免二减三”的税收政策，用作产业转移成本。对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的重点地域和重点企业，延长所得税按 15% 上缴的期限。对承接产业转移并已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和地处边陲的中西部重要城市，可以比照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有关政策，支持建立各类要素市场交易中心，股权交易中心、中小民间金融机构。建设保险创新试验区，将政府性资金存放银行与信贷投放挂钩，激励银行加大产业转移的信贷支持力度。

制定新的产业目录和人才政策。应实行差别化产业目录，如在准入产业及准入规模等方面给予倾斜，对环境容量大的区域，碳减排标准可以低于东部；在能源资源富集的产地，适度提高单位能耗指标，允许耗能指标适度高于东部地区的产业和企业。加快建立人才、智力、项目相结合的柔性引进机制，推进产业与人才向承接产业转移地区同步双转移。提高人才转移到中西部的地区特殊津贴，应使高寒地区、沿边地区等地的人员工资标准高于东部地区。

实施鼓励东部产业向西部转移的土地政策。对新疆、广西、青海、内蒙、西藏等土地广袤的省区，应允许采取更为灵活的土地管理政策。对一些跨省、跨区域战略通道建设、对服务于国家战略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用地应适当放宽，不占用城镇规划建设用地

规模指标。戈壁滩、沙地、荒山等用作建设制造业基地的，不占用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同时，做好存量土地文章，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实施更加优惠和便利的贸易和投资政策。支持承接产业转移地区从事加工贸易，原则上应放开经营，免除配额（或对进口自用和开展加工贸易涉及进口许可管理的资源类商品允许量）和许可证。对进口周边国家资源性产品在开发区内加工生产，增值达到30%以上的，应视同国内产品，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即征即退。完善新特区政策，对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充分发挥已建立的与哈萨克斯坦国经济合作平台作用，对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内从毗邻国家进口石油、天然气、金属矿产等资源并就地加工的企业，不受进口资源配额限制。支持喀什设立专项发展基金，启动海外上市交易“喀什发展信托基金”，在东南亚、中东发行外币债券。创造大通关新优势，优先在中西部全面实行保税工厂安排，创造大通关的新优势。对中国企业在境外开发土地形成农产品基地的，进口农产品应视同国内产品，使其快速通关，并不受配额限制；进行结构性进口关税政策调整，逐步取消对资源、能源、技术和关键设备的进口关税，对关键技术和关键设备进口实施“绿色通道”，推动进口便利化。

在产业转移中实施更加严格的生态环保政策。加大中央财政对重要生态功能区均衡性转移支付力度，进一步完善水、土地、海洋、矿产、森林、草原等各种资源税费政策和征收管理办法，研究建立资源型企业可持续发展准备金制度。逐步建立区域间生态补偿机制，鼓励和引导下游与上游地区、开发与保护地区、生态受益与生态保护地区之间开展生态补偿。积极探索水权交易、碳汇交易等市场化生态补偿模式，以保障在产业转移中同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完善政绩评价考核指标体系。对于产业转出区域，实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先的绩效评价，强化经济结构、资源消耗、环境保护、自主创新等指标的评价权重，弱化经济增长速度、招商引资、出口等指标的评价权重；对于中西部、东北承接产业转移的区域，实行工业化、城镇化水平优先的绩效评价，综合评价经济增长、吸纳人口、质量效益、产业结构、资源消耗、环境保护等内容。针对不同发展水平区域，制定不同的绩效评价体系。

责任编辑：刘英奎

· 国际经济 ·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拉动因素： 东道国面板数据分析^{*}

张碧琼 李 论

摘要：本文在讨论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及影响因素机制的基础上，研究东道国因素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分析的结论表明：东道国的 GDP 水平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正向关系；东道国的能源产量越高，对于我国的对外投资吸引力越强；东道国的市场开放程度大，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作用；东道国的科技水平越发达，也越能吸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后，对优化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FDI 东道国吸引力 面板 PCA 模型

作者简介：张碧琼，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金融学院国际金融系主任；

李 论，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

一、引 言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全球化的趋势已成必然，对外投资和利用外资已经成为当前世界开放经济的主要表现形式，如何有效参与国际竞争是我国企业所面对的重大课题。自改革开放迄今，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2011 年度中国对

^{*} 本项目得到中央财经大学“211 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批准号：10YJA790240）资助。

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1 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接近 750 亿美元，较 2010 年增长 8.5%。在 2002 年-2011 年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连续 10 年增长，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速达到 44.6%^①。

开展关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的研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从企业层面讲，有助于我国企业在进行对外投资过程中考虑到一些重要因素并同自身的实力情况结合起来，从而做出优化的选择。这有利于我国企业能够以稳健的步伐走向世界，一步一个脚印地迈向全球市场。企业积极参与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可以开拓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投资过程中学习东道国较为先进的科技、管理方式及经营模式。

从国家层面讲，一方面，可以使得政府根据各种影响因素的变化，适时地出台相关的政策或服务来鼓励并帮助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完善我国的法律制度，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提供法律保障。由于外向型经济的投资需要投资者对东道国要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因此，政府通过以上的做法，可以更好地引导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的市场、区位及时机等方面更好地把握；另一方面，我国拥有巨额外汇储备，这既说明我国外汇储备实力强，但同时也意味着我国外汇储备利用效率不高。积极地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有效利用这些储备资源，减轻由于美元贬值造成对我国外汇储备的冲击，同时，也有利于推进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国际学术界在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理论研究方面成果颇丰，全面深入研究了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主要的理论有以下几种。（1）美国学者海默（Hymer，1960）提出的垄断优势理论。该理论假设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各国企业存在着不完全竞争的特点，本国与东道国的跨国公司存在着各自独占优势，它们各自凭借其在某方面的垄断优势进行海外投资。（2）美国学者弗农（Venom，1966）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这一理论将产品的生命周期划分为成长、成熟和标准化阶段，指出了不同产品阶段企业有着不同的战略，即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需要随着产品生命周期而变化，企业在对外投资时需要将自身垄断优势与在东道国能得到的投资区位优势结合考虑。（3）学者巴克利和卡森（Kasson & Buckley，1976）提出的内部化理论。该理论着重考虑了交易成本，通过将中间产品纳入到企业的内部活动中，通过采取有效手段降低企业成本，从而达到提高利润的目的。该理论着重考虑了交易成本对于企业的影响，控制好交易成本，做好内

^①数据来源于《2011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部整合，具有一定的创新性。给企业的启示是，通过构建发达的企业信息平台和网络平台来减少中间交易成本，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对企业具有实践层面的指导作用。（4）日本教授小岛清（Kojima, 1978）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应根据比较成本的原理将国内已经成为边际行业的这部分产业转移到具有低廉的劳动力、资源等要素价格的国家进行二次发展，较好地解释了日本企业在对外投资初期的行为。（5）国际生产折衷理论（John H. Dunning, 1977）。该理论综合了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并结合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资源禀赋学说，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提出了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应有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只有当企业资产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同时具备时，对外直接投资才会获得成功。这个理论具有较为完整的解释力，被认为是比较完善的对外投资理论。

以上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共同点，都是着重分析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由于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有着较大差异，因此，以上理论在解释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时，会有缺乏解释力的问题。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对外投资活动中表现日益活跃，一些学者也越来越重视发展中国家在对外投资中扮演的角色，提出了许多关于讨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有如下几种。（1）小规模技术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威尔斯（L. Wells, 1977）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小规模生产技术、民族产品和低价销售三方面优势。但是，这个理论显然无法解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2）技术地方化论。英国学者拉奥（Lall, 1983）提出这个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对其加以消化、创新，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使得其产品在国外市场逐渐具有一定的竞争能力。（3）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英国经济学家坎特威尔和其学生惕诺（J. Cantwell, 1991; P. E. Tolentino, 1993）提出这个理论。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进程是一个积累的阶段，首先进行对周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而后为了获得技术等方面的进步，继续向发达国家投资。（4）投资发展周期理论。邓宁（Dunning, 1981）认为，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其所拥有的内部化、区域化和所有权优势，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重要影响。该理论将对外投资量与 GDP 挂钩，但是，这个理论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选用了人均 GDP 指标对国家进行分类，指标过于单一。

（三）国内理论研究

国内学者在借鉴国外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具体情况，也做了很多深入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1）二阶段理论。吴彬与黄韬（1997）认为，对外直

接投资可分为“经验获取阶段”和“利润攫取阶段”。如果我国企业具有垄断性优势，则主要攫取利润；反之，则应以获取经验为主。（2）技术累积与竞争策略模型。冼国明、杨锐（1998）针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建立了学习型和策略竞争型两个模型来进行分析。（3）综合优势论。孙建中（2000）认为，综合优势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由于我国存在着二元经济形态，既有发达国家特征，也有发展中国家特点，所以，在投资的动机方面有多机性；二是对比其他东道国，我国的这种特殊性存在着差别优势；三是因为我国对外投资的开展经历了诸多阶段，发展空间巨大。（4）五阶段周期理论。冯雁秋（2000）根据在投资发展过程中优势产业与边际产业的互相转换，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划分为五个阶段。在不同阶段中，各种类型的投资都会有所不同。（5）跨国投资门槛论。楚建波与胡罡（2003）根据企业投资动机将对外投资分为三类，分别为利润获取型、资源获取型和优势寻求型。在企业考虑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行性时，需要关注自身的投资能力及投资要求的“门槛”，并将这些因素充分结合起来予以考虑。

除以上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外，国内诸多学者也都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各个相关领域有过相关研究，但是总体来看，目前国内的研究多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不多。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东道国拉动力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迅速上升，许多学者对此现象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将分别从东道国和母国两个角度对已有的部分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在基于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中，东道国的经济情况、资源禀赋、市场状况、汇率水平、政治因素等特别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一）东道国经济情况

许多学者研究表明，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影响。东道国的 GDP 水平是能够较好地表现其经济发展情况一个变量，能够较为充分地反映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Kofstad & Wiig（2010）用 GDP 表示市场规模，认为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越大，对于投资国的吸引力也就越大；胡博、李凌（2008）选用 2003 年-2006 年我国对 54 个东道国投资数据分析，发现东道国 GDP 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正相关；而王文明、王聪、张新乐（2007）对 2003 年-2004 年间我国对 51 个东道国的投资样本建立了面板数据模型，得出东道国 GDP 对于我国对外投资影响不显著，并且与我国直接投资负相关的结论。

（二）资源禀赋

近年来，在资源禀赋方面我国企业主要考虑东道国的资源、技术和劳动力。国际化

理论认为，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和东道国自然资源量成正向关系。所以，我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获取资源，以满足经济持续发展的需求。

Buckley (2007) 对我国 1984 年-2001 年间的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分段检验，他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由市场导向到资源型导向的时间转折点是 1992 年；Pradhan (2011) 将中国与印度的跨国公司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更偏好于在临近的周边并且资源较为充沛的小国家进行投资，而印度则是对这种区位因素不敏感，倾向于投资于具有较大市场规模的东道国；胡博、李凌 (2008) 通过实证检验，采用 2003 年-2006 年的面板数据模型发现，我国在对发达国家的寻求技术型投资对我国直接投资影响效果显著；Sanfilippo (2010) 选取我国在非洲直接投资的 41 个国家进行分析，发现这些东道国的自然资源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正相关，并且双方密切的经贸合作关系也对直接投资有显著影响。

(三) 市场状况

我国学者在研究市场状况时，大多集中在市场开放程度和贸易领域进行讨论。

陈恩、王方方 (2011) 选取 2007 年-2009 年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建立了面板数据模型，得出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市场寻求型的，东道国市场开放程度越高，我国对其直接投资也越多的结论。蔡锐和刘泉 (2004) 以小岛清的边际产业理论为基础，对我国在 1990 年-1999 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我国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对于进口有促进作用，同出口关系不显著；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则得到相反的结论，对出口有促进作用，同进口关系不显著；张如庆，徐松 (2005) 通过时间序列的方法对 1982 年-2002 年间的数据分析，得出我国的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有着单向因果关系；官建成、王晓静 (2007) 用 1993 年-2005 年数据进行 OLS 回归，发现出口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正向作用。而邱立成 (2008) 的结论与上述两位学者的结论不同，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成显著的负相关性，即出口贸易额的提高会减少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替代作用；张为付 (2008) 使用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和东道国的出口规模发现，两者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在对进口情况的考察上，项本武 (2007) 在其 2005 年研究的基础上，分析我国对 49 个东道国在 1999 年-2001 年这 3 年间的直接投资数据，发现进口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

(四) 汇率水平

汇率水平的变化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对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收益具有较大影响。在研究时通常选取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及东道国对美元汇率或是人民币直接对美元汇率。

关于汇率问题，我国学者的研究众多，以下仅举几例。张谊浩（2003）通过实证检验指出，在保持人民币汇率长期稳定的情况下有利于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张西林（2009）通过实证，得出了与张谊浩相似的结论。此外，我国学者也考虑到了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外汇储备的关系，如赵美英（2009）通过实证检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外汇储备规模具有显著的关系。

（五）政治因素

在对东道国进行投资时，我国企业要充分考虑到可能面临的政治风险。东道国的制度、政策等方面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重大。

Buckley（2007）研究发现，我国倾向于投资制度环境较好、政策较为完善的东道国，特别是临近的周边具有相对稳定的政治体系的小国。但 Cheung & Qian（2008）经研究发现，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与东道国的制度水平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影响关系。贺书锋、郭羽诞（2009）发现，我国对外投资倾向于与我国具有相似文化、沟通交流较好且国内政治稳定的东道国。

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拉动力的实证分析

随着全球经济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了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协定中。通过双方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双边投资协定等优惠的双边政策，进一步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经济往来，为双方企业的投资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本文首先确定了模型的因变量为我国对东道国的投资流量；自变量包括东道国市场规模、人民币与东道国货币之间的汇率水平、东道国的经济开放程度、东道国的能源产量和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出口比。

选取变量因素，具体见表 1。

表 1 变量的设定及含义表

变量性质	变量名	变量含义
被解释变量	ofdi _{it}	t 期我国对 i 国的投资流量
解释变量	gdp _{it}	t 期 i 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er _{it}	t 期人民币兑 i 国货币的汇率
	open _{it}	t 期 i 国的经济开放程度
	energy _{it}	t 期 i 国的能源产量
	exzhangex _{it}	t 期 i 国的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出口比

综合拉动力的理论分析,从东道国角度建立了对我国直接投资流量影响因素的假设如下:

假设 1: 东道国的市场规模 GDP 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有正向作用;

假设 2: 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正向影响;

假设 3: 东道国的经济开放程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正相关;

假设 4: 东道国的能源产量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正相关;

假设 5: 东道国的科技水平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正相关。

(一) 数据来源说明及处理

本部分数据选取期间为 2003 年-2010 年,根据数据可获性和及我国对其直接投资有正流量的国家或地区的年度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共选取了 46 个国家(地区),包括: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孟加拉国、博茨瓦纳、巴西、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智利、埃及、埃塞俄比亚、法国、德国、加纳、香港、匈牙利、印度尼西亚、意大利、日本、哈萨克斯坦、肯尼亚、毛里求斯、摩洛哥、莫桑比克、纳米比亚、荷兰、尼日利亚、巴拿马、秘鲁、菲律宾、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沙特阿拉伯、新加坡、西班牙、瑞典、瑞士、泰国、多土耳其、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英国、美国、委内瑞、越南和赞比亚。

我国对东道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ofdi)数据来源于《2011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东道国能源产量(energy_{it})和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出口比(exzhangex_{it})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网站;东道国经济开放程度(open_{it})数据采用东道国每年吸收 FDI 流量占其 GDP 比重来表示,此数据与东道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_{it})和东道国及本国汇率数据(er_{it})来自 EIU CountryData 数据库^①。

考虑到在模型分析时可能会遇到异方差等问题的出现,所以在模型实证研究时,对各个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异方差的影响。

(二) 面板数据平稳性检验

本部分实证研究数据包括了横截面、时间和变量三位信息,只利用截面数据或时间序列并不能满足分析的需要,所以,在此选用面板数据(panel data)模型。分析面板数据的一般形式如下:

$$y_{it} = \alpha_i + x_{it}\beta_i + u_{it} \quad i=1, 2, \dots, N \quad t=1, 2, \dots, T \quad (1)$$

其中, y_{it} 为被解释变量, x_{it} 为解释变量, α_i 为常数项, β_i 表示斜率, N 表示样本中

^①<https://eiu.bvdep.com>.

的个体数， T 表示样本观测长度，随机误差项 u_{it} 相互独立且均值为零，方差相等^①。

在进行面板数据回归之前，首先要采用单位根检验的方法，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考察，目的是防止产生虚假回归。检验方法分为两种：一种是相同根下的检验，方法包括 LLC、Breitung 和 Hadri；另一种是不同根下的检验，方法包括有 IPS、Fisher-ADF 和 Fisher-PP。单位根检验是通过三个模型完成的，首先由带有截距项和趋势项的开始，然后只有截距项，最后是两者都无的模型。只有三个模型都不能拒绝原假设时，才能得出时间序列不平稳的假设；只要有一个模型拒绝了原假设，就认为这个时间序列具有平稳性。在检验时首先从水平序列情况开始，如果有单位根，则对序列进行一阶差分继续检验，若发现仍有单位根，则进行二阶乃至高阶差分，直到不存在单位根为止^②。本文选取 LLC、ADF 和 PP 检验的方法，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 2。

表 2 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类型(C,T,P)	LLC 检验	ADP 检验	PP 检验	检验结果
lnofdi	(1,1,0)	0.0000*	0.0001*	0.0000*	平稳
lngdp	(1,1,0)	0.0000*	0.5396	1.0000	平稳
lner	(1,1,0)	0.0000*	0.6475	0.2593	平稳
lnopen	(1,1,0)	0.0000*	0.0236*	0.0000*	平稳
lnenergy	(1,1,0)	0.0000*	0.0017*	0.0000*	平稳
lnexzhangex	(1,1,0)	0.0000*	0.0003*	0.0001*	平稳

注：(c, t, p) 表示，c=1 时有常数项，c=0 时无常数项；t=1 时有趋势项，t=0 时，无趋势项；p 表示滞后期数。* 表示 5% 下 P 值小于 0.05，显著。

由表 2 的检验结果可知，以上变量均为零阶单整，我们可以得到面板数据的模型方程如下：

$$\ln ofdi_{it} = \alpha_i + \beta_1 \ln gdp_{it} + \beta_2 \ln er_{it} + \beta_3 \ln open_{it} + \beta_4 \ln energy_{it} + \beta_5 \ln exzhangex_{it} + \beta_6 FTA + \varepsilon_{it} \quad (2)$$

（三） 面板数据模型选择

面板数据的各类模型大致可分为混合回归、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三类。首先，

①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Eviews 应用及实例》，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19-321 页。

②同上书第 346-350 页。

需要判断模型的选用形式。

在检验时，经常使用协方差分析的方法进行检验，主要检验以下两个假设：

$$H_1: \beta_1 = \beta_2 = \beta_3 = \beta_4 = \cdots = \beta_N$$

$$H_2: \alpha_1 = \alpha_2 = \alpha_3 = \alpha_4 = \cdots = \alpha_N$$

$$\beta_1 = \beta_2 = \beta_3 = \beta_4 = \cdots = \beta_N$$

接受假设 H_2 的是混合回归模型，即不变系数模型；如果拒绝 H_2 ，需要检验假设 H_1 ，若接受 H_1 ，则是变截距模型；如果同时拒绝 H_1 和 H_2 ，则应采用变系数模型。

计算统计量 F_1 和 F_2 的公式如下：

$$F_1 = \frac{(S_2 - S_1) / [(N-1)k]}{S_1 / [NT - N(k+1)]} \sim F[(N-1)k, N(T-k-1)] \quad (3)$$

$$F_2 = \frac{(S_3 - S_1) / [(N-1)(k+1)]}{S_1 / [NT - N(k+1)]} \sim F[(N-1)(k+1), N(T-k-1)] \quad (4)$$

样本中， $N=46$ ， $K=5$ ， $T=8$ ，由式（3）和（4）计算可得到两个 F 统计量分别为：

$$F_2 = 4.5 \quad F_1 = 1.26$$

通过 Eviews 软件计算在 5% 显著性水平下的 F 统计量的相应临界值为：

$$F_{2\alpha}(270, 92) = 1.349 \quad F_{1\alpha}(225, 92) = 1.341$$

由于 $F_2 > 1.349$ ，所以拒绝 H_2 ；因为 $F_1 < 1.341$ ，所以接受 H_1 ，即此处选用变截距模型。

下面继续分析选用固定影响模型还是随机影响模型。通常采用豪斯曼（Hausman）检验来判断固定影响模型与随机影响模型的选用。

通过使用软件计算可得 Hausman 统计量数据为：Chi-Sq. Statistic=217.45，Chi-Sq. d.f.=5，Prob.=0。检验结果表明，拒绝选择随机影响模型的原假设，应该采用固定影响的面板数据模型。

（四）面板数据回归结果

由于选择样本中截面个数是 46，而时间序列个数为 8，时间序列个数相比横截面个数较小，所以，选择截面加权估计法（cross-section weights）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来解决可能出现的异方差现象。得到了如下的回归结果：

通过观察回归结果，可知， $\ln gdp$ 和 $\ln er$ 在 1% 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ln open$ 、 $\ln energy$ 和 $\ln exzhangex$ 在 10% 的置信水平下显著，模型的 R^2 为 91.17%，调整后的 R^2 为 89.78%，拟合度较好。回归方程如下：

$$\begin{aligned} \ln ofdi_{it} = & 8.0994 \ln gdp_{it} + 1.5955 \ln er_{it} + 0.0204 \ln open_{it} + 1.3563 \ln energy_{it} + \\ & 0.0619 \ln exzhangex_{it} - 24.1271 + \varepsilon_{it} \end{aligned} \quad (5)$$

观察表 4 可知，在样本期间内，各东道国的固定影响有着较大差异，其中最低的是

表 3 模型系数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	P 统计量
C	-24.1271	0.0001
lngdp	8.0994	0.0000
lner	1.5955	0.0016
lnopen	0.0204	0.0817
lnenergy	1.3563	0.0503
lnexzhangex	0.0619	0.0598

表 4 各样本的固定影响

国家	固定影响	国家	固定影响	国家	固定影响
阿尔及利亚	7.9149	印度尼西亚	7.2970	沙特阿拉伯	-3.2656
澳大利亚	-5.0280	意大利	-20.0872	新加坡	-3.4780
孟加拉国	4.3016	日本	-15.2687	西班牙	-18.1790
博茨瓦纳	13.9410	哈萨克斯坦	12.2194	瑞典	-2.1707
巴西	-13.9602	肯尼亚	14.6715	瑞士	-8.7295
柬埔寨	28.1256	摩洛哥	-0.5810	泰国	-0.4098
喀麦隆	18.2924	莫桑比克	21.0195	土耳其	-13.0707
加拿大	-11.1756	纳米比亚	16.8660	乌克兰	-2.4430
智利	4.8993	荷兰	-9.3455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0.8587
埃及	-1.8289	尼日利亚	9.2024	英国	-17.0839
埃塞俄比亚	12.2447	巴拿马	5.0734	美国	-26.4684
法国	-18.3935	秘鲁	-1.6463	委内瑞拉	0.1080
德国	-18.5166	菲律宾	0.7989	越南	16.6796
加纳	7.4697	波兰	-7.8557	赞比亚	21.3152
香港	-2.3732	罗马尼亚	-1.3218		
匈牙利	5.3488	俄罗斯联邦	-5.9671		

美国，其固定影响值为 -26.4684；最高的是柬埔寨，其固定影响值为 28.1256。总体看来，在样本内的国家中，发达国家（地区）的固定影响值较低，而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固定影响值较高。

（五）结果分析

将在本文选取的样本期间内分析所得的回归结果与先前的假设对比，不难发现：

1. 东道国的 GDP 水平与我国对其投资成正相关，假设得以验证。东道国的 GDP 每增长 1%，会引起我国对其直接投资接近 8.1% 的增长。此外，在样本期间内，东道国 GDP 所对应的弹性系数是其他各因素所对应弹性系数最大的，说明东道国 GDP 所代表的市场规模因素是所用因素中最为重要的一个。

2. 汇率上升，直接标价法下表示本币贬值、外币升值，一方面，使得我国在对外直接投资时，在东道国所销售商品的利润按东道国货币可以换算成更多的人民币，提高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益；另一方面，可以加强东道国对于我国产品或服务的购买力，促进我国企业对东道国投资或者商品的出售，扩大我国的市场规模。而这与假设相反，说明现阶段我国企业更加偏重市场规模的扩张。

3. 东道国的市场开放程度与我国对其直接投资正相关的假设得以验证。根据回归系数表示，东道国的开放程度每提高 1%，我国对其直接投资流量会提高约 0.02%，虽然检验结果显著，但影响还是较小。

4. 东道国能源产量与我国对其直接投资正相关的假设也得到验证。东道国的能源产量增加 1%，我国对其直接投资流量增长约 1.36%。这个结论也与我国近些年来的海外投资举动相符。根据《2011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所示，2011 年末我国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达到 144.5 亿美元，占比 19.4%，主要集中在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黑色金属和煤炭方面^①。例如，2011 年中国中化集团公司收购挪威石油公司巴西佩格里诺油田 40% 股权；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收购加拿大日光能源公司 100% 股权；2013 年 2 月份完成了一笔中国能源史上交易额最大的海外并购案：中海油以 194 亿美元的价格完成了对尼克森公司的并购，进一步拓展了海外业务及资源储备^②。

5. 用高科技出口品占制成品出口比衡量的东道国科技水平因素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成正向关系，验证假设成立。根据选取的样本区间及指标来看，东道国的科技水平每上升 1%，我国对其直接投资流量提高近 0.062%。结合科技兴国、科技创新的战略背景，我国企业对海外的技术投资将会保持一种稳步上升的趋势，我国企业以其“走出去”，学习发达国家企业先进的技术、管理模式和经验，从而更好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从结果上看，我国企业对于技术增长的需求占据了显著的地位。

四、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主要研究东道国因素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根据数据可获性及我国对其直接投资有正流量的国家或地区的年度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共选取了 46 个国家（地

①数据来源于《2011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②资料来源于各公司网站。

区) 样本, 进行面板数据分析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 东道国的 GDP 水平与母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都成正相关。说明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时, 在本国经济发展迅速的背景下, 会重视考察东道国的市场规模情况。同时, 东道国的科技水平越发达, 也越能吸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第二, 从资源和技术层面讲, 东道国的资源产量和技术水平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考虑方面。东道国的资源产量越丰富, 对于我国的对外投资吸引力越大, 东道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仍然对于我国对外投资有着很大吸引力。

第三, 与东道国的双边汇率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影响, 并且存在负向关系。也就是说当人民币贬值时, 会使得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上升, 说明我国在对外投资中还是在以市场寻求为主。

第四, 在市场层面, 东道国的开放程度对于我国直接投资具有正向关系, 即东道国的开放度高, 会有着较大吸引投资的力度, 使得我国企业更多地投资东道国。

第五, 双边优惠政策安排也对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着促进作用, 但一些政策安排在具体执行时存在着一定的时滞效应。随着多边或双边互惠相关政策的进一步落实, 将进一步提升东道国的吸引力。

鉴于东道国吸引力和国内推动力共同作用,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 “走出去”的步伐越来越快, 但企业境外经营普遍存在“水土不服”问题。根据从东道国因素的分析结果, 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议。

(1) 注重东道国经济、技术、政策优势, 提高投资水平。在投资过程中, 我国企业应该仔细分析东道国的经济形势变化和未来的发展态势, 重点考虑一些具有较大的市场规模, 更快的未来经济增速, 且市场开放程度较高, 与我国有着较为密切贸易关系的东道国, 增加可以为我国企业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使得我国企业能够受益于规模效益的东道国投资。

(2) 服务国内产业结构调整, 鼓励夕阳产业向外转移。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国内的服装、纺织、食品、钢铁、光伏、风电等行业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应该鼓励这些相关的企业向对这些行业的产品或技术有需要的国家投资, 利用比较优势延续产业生命。

(3) 加快能源储备投资, 服务经济安全。进行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时, 我国企业不仅能够获得国外的廉价而又丰富的资源, 也能够更充分地利用本国的资源。在前些年大力扩展海外投资的基础上, 我国企业应该充分利用当今世界经济情况, 结合自身的实力、战略等因素继续资源投资, 为获得国家建设所需的能源做好准备工作。比如, 可以用独资或合资的形式收购国外矿藏, 寻求合适的时机控股或并购国外能源企业, 与东道国或第三方国家的相关企业共同开发矿藏资源。

(4) 注重中国企业品牌,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我国除了少数具备雄厚实力的企业在资源型投资上颇有建树外,大多数企业还是以市场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为主,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次要位置。一方面,企业应积极树立品牌形象,做好市场定位细分工作,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另一方面,国家也应该做好企业品牌和专利认证、保护,保护企业创新积极性,使我国自主品牌走向国际。

(5) 主动改善对外投资经营环境,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水平。随着我国与各主要东道国之间投资与贸易合作不断推进,将进一步提升东道国吸引力。政府通过更具体措施,加深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往来。一方面,可以建立海外东道国的公共信息网络平台;另一方面,也可促进双边投资的展开,共同制定有利于双方企业的投资或贸易政策,在政府支持政策的帮助下,打造一批具有雄厚竞争实力的跨国公司。

参考文献:

1. 官建成、王晓静:《技术能力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影响》,《技术经济》2008 年第 1 期。
2. 胡博、李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投资动机的视角》,《国际贸易问题》2008 年第 12 期。
3. 邱立成、王凤丽:《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宏观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08 年第 6 期。
4. 吴彬、黄韬:《二阶段理论:对外直接投资新的分析模型》,《经济研究》1997 年第 7 期。
5. 项本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基于 Panel Data 的地区差异检验》,《统计与决策》2007 年第 24 期。
6. 于津平:《汇率变化如何影响外商直接投资》,《世界经济》2007 年第 4 期。
7. 楚建波、胡翌:《发展中国家 FDI 理论的新探讨——跨国投资门槛论》,《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3 年第 7 期。
8. Hymer. 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 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MIT Press, 1976.
9. Vern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 Quarter Journal of Economics, 1966, P.190-207.
10. Wells, L.T. Third world Multinationals: The Rise of Foreign Investment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3.
11. Dunning, J.H. Explaining the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Position of Countries: Toward a Dynamic and Development Approach,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1981 (1): 30-64.
12. Kofstad & Wiig. What determines Chinese outward FDI,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10.
13. Pradhan, JP. Emerging Multinationals: A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Indian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s, 2011, 3 (1), P.113-148.

14. San filippo, M. Chinese FDI to Africa: What is the nexus with foreign economic cooperation, African Development Review, 2010, 22 (1), P.599-614.

15. Kuemmerle. W. Building effective R&D capabilities Abroad,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7 (3): P.61-70.

责任编辑：刘英奎

附录：科学技术进步贡献率计算数据

年份	GDP	固定资产投资额	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资本存量	从业人数	y	k	l
1990	18667.80	4517.00	100.00	25386.18	56740.00	0.10	1.35	0.26
1991	21781.50	5508.80	109.50	29625.67	58360.00	0.17	1.10	0.17
1992	26923.50	7854.98	115.30	35604.23	59432.00	0.24	1.00	0.08
1993	35333.90	12457.88	126.60	44599.20	66373.00	0.31	0.95	0.37
1994	48197.90	16370.33	110.40	58606.11	67199.00	0.36	0.80	0.03
1995	60793.73	20019.26	105.90	76375.61	67947.00	0.26	0.99	0.04
1996	71176.59	22974.03	104.00	96745.83	68850.00	0.17	1.30	0.08
1997	78973.03	24941.11	101.70	118762.54	69600.00	0.11	1.91	0.10
1998	84402.28	28406.17	99.80	143991.50	70637.00	0.07	2.55	0.22
1999	89677.05	29854.71	99.60	169614.12	71394.00	0.06	2.53	0.17
2000	99214.55	32917.73	101.10	196786.15	72085.00	0.11	1.45	0.09
2001	109655.17	37213.49	100.40	227533.27	73025.00	0.11	1.50	0.12
2002	120332.69	43499.91	100.20	263693.93	73740.00	0.10	1.79	0.10
2003	135822.76	55566.61	102.20	310044.89	74432.00	0.13	1.44	0.07
2004	159878.34	70477.42	105.60	367622.92	75200.00	0.18	1.18	0.06
2005	184937.37	88773.61	101.60	444918.06	75825.00	0.16	1.38	0.05
2006	216314.43	109998.16	101.50	541340.13	76400.00	0.17	1.28	0.04
2007	265810.31	137323.94	103.90	658998.54	76531.00	0.23	0.93	0.01
2008	314045.43	172828.40	108.90	799829.24	77046.00	0.18	1.46	0.04
2009	340902.81	224598.77	97.60	1011821.02	77510.00	0.09	2.81	0.07
2010	401512.80	278121.85	103.60	1255190.81	78388.00	0.18	1.15	0.06
2011	472881.56	311485.13	106.60	1512390.19	78579.00	0.18	1.52	0.07

数据来源：《2012 年中国统计年鉴》。

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的 远景与突破

匡贤明 何冬妮

摘要：在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大背景下，以打造“10+1”升级版为突破口，加快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中国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中之重。本文提出，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新阶段经济全球化的重头戏；推进亚洲区内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区建设，应成为中国深化对外开放的战略重点。加快“10+1”升级版进程，应以“类欧盟”为目标导向，争取3年左右明显突破，5年左右初步形成“10+1”经济一体化的新格局。

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类欧盟 远景 突破

作者简介：匡贤明，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
何冬妮，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2013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提出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的倡议，随后，在第十六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提出“2+7”的合作框架。在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大背景下，打造中国-东盟（以下简称“10+1”）自贸区升级版，在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中，具有战略性、决定性和基础性作用，成为深化中国与东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战略重点。应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尽快取得重大突破。

一、打造“10+1”升级版的战略考虑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世界经济格局深刻复杂变化的背景下，打造“10+1”升级版，既是中国新阶段向北对俄开放、向西对中亚开放、向西南对东南亚和南亚开放的新三大战略重点之一，也是落实“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等战略部署，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现实突破口。在“10+1”自贸区业已取得的良好基础上，尽快取得“10+1”升级版的重大突破，战略位置全面凸显。

（一）尽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经过 35 年的开放，中国初步建立了与国际贸易投资规则接轨的开放型经济体制，但与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现实需求相比，以开放倒逼改革、以开放促进转型的任务仍然艰巨，服务业准入、外商投资审批、民营企业走出去等方面的对外开放，仍然面临重大体制机制障碍。打造“10+1”升级版，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合作等领域，对东盟采取更多开放举措，将形成深化改革的倒逼机制，加快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步伐。

例如，随着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增强，中国沿海地区靠土地换投资、靠资源换市场、靠政策换外资的模式已难以为继；内陆沿边地区对外开放总体滞后，不同地区间的对外开放不平衡、不协调、难以互补等问题突出。打造“10+1”升级版，着力推动中国沿边地区与越南、缅甸、老挝沿边贸易的传统优势转型升级，把广阔的东南亚市场与中国长江经济带有机联结在一起，对构建沿海、内陆、沿边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大意义。

再例如，美欧正积极推动高标准的“新一代自由贸易协定”，要求开放的部门更多、开放程度更高，在政府采购、知识产权、投资准入、劳动权益、环境保护等领域的标准更严，“新一代自由贸易协定”很可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流趋势。打造“10+1”升级版，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合作等对外开放领域先行先试，是中国推进自贸区 2.0 版建设的重要举措，不仅有利于有序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压力测试，而且对中国更深融入经济全球化、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都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

（二）积极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

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头戏。WTO 多哈回合谈判由启动到现在已 12 年，谈判过程艰难曲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纷纷转向设立各种形式的区域、次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谋求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不断拓展市场空间，培育经济全球化的新红利。据 WTO 统计数据，截至 2013 年 7 月底，全球向 WTO 通报的区域性贸易协定

达 575 个，已生效 379 个，是 2000 年的 6 倍。一些超大规模的区域贸易协定，如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亚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欧日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中欧自贸区都在酝酿当中，这些贸易协定中任何一个一旦成立，都会对世界经济贸易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在这个背景下，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避免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中被边缘化，迫切需要以“10+1”升级版为突破口，加快推进亚洲区域内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区建设。

（三）把握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机遇

作为人口最多、经济增长潜力巨大、贸易增长最快的区域，亚洲已然是各方争夺的重要市场。亚洲共有 48 个国家，人口 35 亿，占世界总人口的 60%，资源丰富，发展前景十分广阔。2009 年，亚洲 GDP 已达 14.46 万亿美元，占世界 GDP 的 24.9%，与北美 28.4%、欧盟 28.3% 的差距越来越小。2011 年，亚洲地区国家进出口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达到 32.5%，比同期北美地区贸易比重高出近 18 个百分点，正在逼近欧洲 36.8% 的份额。

“10+1”自贸区是亚洲大市场中最具市场潜力的板块之一。2002 年-2012 年，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额从 548 亿美元上升到 4000 亿美元，年均增长 23.6%，相互投资累计超过 1000 亿美元，增长 3.4 倍。中国已经成为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东盟则是中国仅次于欧盟、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双方在服务贸易、贸易本币结算以及货币互换等方面，也都有重要进展。基于中国-东盟的人口总规模、经济发展活力和潜力，与北美自由贸易区等相比，“10+1”自贸区仍然有巨大潜力，升级空间巨大。尤其在欧美国家再工业化进程加快、贸易保护主义升温、中国外部需求持续萎缩的背景下，更好地开发利用“10+1”自贸区的自由贸易潜力，具有现实迫切性。

（四）保障能源安全与通道安全

东盟诸国是中国近邻，其中缅甸、越南、老挝与中国山水相连，处在中国连接东南亚、南亚、中亚直至欧洲的交通枢纽位置。缅甸拥有中国通往印度洋的要道和港口，加上已经建成的中缅原油管道和即将建成的中缅天然气管道，是中国保障通道安全和能源安全的重要依托。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采取“政府战略、企业实施、社团支持”的方式，加快在中国周边三国布局，力图抢占战略通道的制高点。2012 年，日本与缅甸签署在深水港迪拉瓦（Thilawa）共建经济特区的协议，还计划投资开发孟加拉湾皎漂港（Kyaukpyu）、毛淡棉港（Moulmein）和土瓦港（Tuwa）等重要港口；印度计划投资 1.3 亿美元对缅甸第二大港实兑港（Sittwe）进行改造，一期工程已经开工。保障能源安全是中国周边战略部署核心内容之一，以打造“10+1”升级版为抓手，尽快打通中国与东盟诸国之间的国际大通道，实现高水平互联互通的迫切性大幅增强。

（五）有效应对美国重返亚洲

近年来，中国周边地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随着东亚地区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美国高调重返亚洲，同时加快实施“新丝绸之路战略”，建立以阿富汗为枢纽，连接南亚、中亚、西亚的区域共同市场。力图通过这一计划整合中亚和南亚的各方力量，实现“能源南下”、“商品北上”的区域内经济循环，降低中亚、南亚、西亚地区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政治经济依赖，逐步建立起美国主导的地区新秩序。奥巴马连任后，把泰国、缅甸、柬埔寨作为首访地，与中国传统友邦就经济、军事等一揽子问题进行多轮磋商。美国对老挝的援助，从一年不足 300 万美元，跃升到 2012 年-2013 年的 2700 万美元；在 2012-2013 财政年度，美国对缅甸提供 1.7 亿美元援助；同时，美国计划向越南提供 4000 万美元的清洁能源援助，计划今后 3 年向菲律宾提供 4000 万美元的“海洋安全”援助。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亚太地区目前是美国最大的武器出口市场，美国向中国周边的东盟国家出口武器增长最快。与此同时，日本等国家也加快在东南亚和南亚的战略布局，加剧了周边形势复杂性。日本重启向泰越缅柬老 5 国的政府开发援助（ODA）计划，以形成日本主导大湄公河地区发展的格局，不断挤压中国周边外交空间。

美国加入 TPP 后迅速占据主导地位，并力图通过 TPP 重塑亚洲贸易格局，巩固提升其在亚洲的影响力。一旦 TPP 把具备条件的东南亚国家吸纳过去，东南亚现有的跨区域、区域、次区域经贸合作机制将有可能被架空；达不到条件的国家，将面临在区域贸易中被边缘化的危险，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确定性进一步上升。如果中国不谋求主动，就会丧失参与重塑世界贸易投资规则，提升中国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的重大机遇。因此，构建应对 TPP 的缓冲带，加大中国加入 TPP 谈判的筹码，并利用东盟在亚洲地区的纽带作用，有效推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些都对加快打造“10+1”升级版提出了迫切需求。

二、打造“10+1”升级版的远景

从中国现实需求和周边环境出发，建议以“类欧盟”为远景和基本方向，推进“10+1”升级版。通过多方努力，3 年左右明显突破，5 年左右形成“10+1”经济一体化新格局。

（一）以“类欧盟”为远景

借鉴欧盟模式，不断增强各方战略互信，消除相互开放的狐疑和猜忌。在各国平等协商的前提下，加快推进“10+1”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区内无障碍流通，基础

设施区内无障碍互联互通，以及政策规划区内无障碍协调沟通的进程，尽快形成较高水平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格局。这不仅将显著降低区内交易成本，使打造“10+1”升级版成为区内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而且有利于整个亚洲地区的和谐稳定。

（二）形成区域共同市场

在“10+1”自由贸易区现有框架基础上，形成区内货物、服务、资本、资源、劳动、技术和管理自由流通的统一市场。不断提升、完善双方自由贸易安排，降低敏感产品和服务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缩短敏感行业准入过渡期；尽快启动更高版本的中国－东盟投资协定谈判，进一步降低或取消相互投资的准入门槛，实现商品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

（三）深化金融合作

适应“10+1”贸易投资结算中人民币需求不断上升的趋势，在各国拥有主权货币的前提下，尽快使人民币成为区内贸易投资主要结算货币，争取成为东盟国家主要储备货币之一；深化“10+1”货币合作，探索人民币与东盟国家货币直接汇率形成机制；进一步扩大区域货币储备库规模，尽快将与 IMF 脱钩的比例提高到 40%-50%；加强货币当局战略合作，打造亚洲货币稳定体系、亚洲信用体系和亚洲投融资合作体系。

（四）加强宏观政策协调

在全球经济大变局下，中国应加强与东盟各国的宏观政策协调，强化经济韧性，提高增长的稳定性。整合现有政策对话机制，成立“10+1”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理事会，协调区内各成员国的财政、货币、汇率与贸易等政策；借鉴欧盟起步阶段煤钢同盟的做法，争取以部分产业政策的统一行动为突破口，提高财政、货币、产业、贸易、投资政策的协调程度；实现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制度化，加强政策协调的约束性，逐步建立起共同应对全球和区域性危机的政策协调体系。

（五）在全球性和区域性事务上集体发声

加强“10+1”重大事务协调力度，共同争取在 WB、IMF、WTO 等国际组织内更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在全球经济治理上集体发声，表达区域共同关注；共同推进 APEC、亚洲开发银行等区域性组织的改革创新。

三、尽快取得打造“10+1”升级版的重点突破

以“类欧盟”为远景打造“10+1”升级版，需要在未来 2-3 年内有重大突破。由此，既提升“10+1”对各方的吸引力，又奠定未来 5 年全面突破的坚实基础。

（一）全面提速国际大通道建设

畅通无阻的国际大通道是打造“10+1”升级版的硬件基础。当前，国际大通道建设迫切需要尽快解决三大问题：第一，在大通道不同线路之间存在资源竞争的背景下，亟需明确大通道不同线路建设的优先顺序；第二，地方政府普遍面临资金缺口，亟需形成有效而可持续的融资机制；第三，大通道建设在相关国家之间缺乏有效协调，进而影响建设效率，亟需建立政府间有效的协调机制。

1. 尽快列出项目清单，明确大通道建设的优先顺序。第一，提速西线建设。加快往缅甸方向的国际大通道西线建设，不仅对深化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具有重大意义，而且也关系到中国的能源安全与国际通道安全。尽快实现西线通道建设的重大突破是：加快泛亚铁路西线（昆明－密支那－仰光－曼谷－吉隆坡－新加坡）建设；尽快取得公路大通道西线（昆明－瑞丽－曼德勒－皎漂）建设的重点突破；加大伊洛瓦底江航道疏通，以及境外关键航段整修、改造、升级的援助力度，形成瑞丽至曼德勒并经伊洛瓦底江进入印度洋航道的水陆联运大通道。第二，加快中线建设。往老挝方向的国际大通道中线，是中国－东盟自贸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关键，也是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的重要交通枢纽。在昆曼公路已经全线贯通的基础上，应尽快推进泛亚铁路中线建设（昆明－磨憨－琅勃拉邦－万象－曼谷－吉隆坡－新加坡），重点加快玉溪至磨憨段建设；尽快签订中老泰通关便利化共同协定，提高昆曼大通道的物流便利化程度；加快改善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运通道通航条件，提升航道运能。第三，推进东线建设。往越南方向的国际大通道东线，是中国－东盟自贸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重要组成，应加快规划实施：推进蒙自－河口准轨铁路增建复线，积极参与越南老街－河内米轨铁路准轨化改造；推进昆河公路的高等级改造；推进中越红河国际航运通道和港口建设，加快红河干线航道治理。

2. 建立有效的金融支持体系。按照大通道建设的优先顺序，对重点项目采取财政拨付、财税贴息贷款、信用担保、鼓励社会投资等多种方式，形成多元化的融资机制；尽可能对大通道重点建设项目方和融资金融机构，给予税收、土地等方面的政策支持；争取各方协商授权，探索设立多国金融机构共同出资的跨境通道融资平台；设立大通道建设基金，以“政府出资、市场运作、风险管理”为原则，探索大通道建设可持续的资金支持；积极引入民营企业参与建设，运用BOT、TOT、融资租赁等多种模式，通过平等协商合理确定收益分配方案，协调相关国家在税收、土地、通关便利化等方面，给予企业政策优惠和政策支持。

3. 加强重大项目的协调机制建设。从现实情况看，目前依托部门间、市县间的协调层次较低，难以满足加快大通道建设的迫切需要，需要尽快成立国家层面互联互通高层

次协调机构，由外交部、商务部、交通部等重要部门的代表和专家队伍组成，形成高层协调和高层推动态势，为大通道建设提速提供协调保障；利用多层次的协商平台，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协商；利用 GMS 领导人会议和部长级会议、南盟多边合作框架等，确定南亚互联互通优先领域和项目；设立南亚、东南亚基础设施合作伙伴论坛等；加强地方政府间的沟通协调，将现有地方政府间的双边协调机制拓展为多边协调机制，推动市县层面的互联互通合作；对没有纳入项目清单的项目，通过税收优惠、土地利用指标计划单列等多种方式给予支持；支持、鼓励州（市）县政府先行探索、自主推进，鼓励大通道沿线州（市）县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向大通道建设倾斜。

（二）尽快形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新格局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既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应有之义，又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支撑条件。从打造“10+1”升级版的现实需求看，应当争取在未来 1-2 年内全面推进，2016 年初步形成中国－东盟基础设施全面互联互通新格局。

1. 明确互联互通的重大项目清单。尽快提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交通、油气管道、电网、信息网等关键基础设施“无缝衔接”的项目清单；提出中国与东盟各国，在检验检疫、海关、技术标准等通关便利化方面的项目清单。

2. 构建互联互通的金融支撑体系。加快探索中国与东盟国家金融机构，共同出资组建基础设施融资平台的路径；积极参与东盟基础设施基金建设；尽快发起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多种形式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参与“10+1”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

3. 加快通关便利化的体制机制建设，实现大通道、大通关。加快建设与东盟国家的“一体化”口岸管理机制，借鉴欧盟“单一窗口”经验，探索并推广区外货物进入区内后一次报关、一次查验、全程放行的“大通关”模式。

（三）加快沿边开放的新突破

沿边地区地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前沿，在打造“10+1”升级版中具有重要作用。为此，应当支持与东盟国家陆上相邻的云南、广西充分利用地缘、亲缘、血缘等优势，积极担当打造“10+1”升级版的排头兵重任。

1. 加快设立沿边自由贸易试验区。鼓励云南的瑞丽、孟定、猴桥以及广西的东兴、凭祥等地，整合沿边开放资源，设立具有国际贸易、转口贸易、国际物流功能的“沿边自由贸易试验区”，全面实施贸易投资自由化政策。

2. 大力发展沿边出口加工区。鼓励云南磨憨等地，充分利用周边国家的资源优势和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承接沿海地区加工制造业转移，建设跨境产业合作基地，形成以出口加工为主，以国际贸易、储运服务、国际旅游为辅，面向东南亚和南亚市场，具有自

由贸易试验区功能的出口加工区。

3. 加快跨境经济合作区创新发展。在中越河口－老街以及凭祥－同登跨境经济合作区率先探索“一区两国、自由贸易”，探索跨境经济合作区的运营模式、管理体制机制与多层次跨境协调机制。

（四）主动推进以服务业开放为重点的市场开放

中国－东盟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远远低于东盟－韩国自贸区、东盟－澳新自贸区。建议中国根据具体情况，适时主动降低准入门槛，积极推进以服务业开放为重点的市场开放。

1. 以教育、医疗健康、金融和文娱为重点推进开放。将相关审批权下放地方，逐步扩大面向东盟国家开放教育市场的试点，允许和支持东盟国家知名大学、职业教育机构，以控股、独资等方式在中国设立分校；允许东盟国家在中国独资举办医疗机构，加快中国与东盟国家医疗保险支付系统的对接；加快金融市场的有序开放，进一步降低东盟国家金融机构进入中国的条件；推进文化体育娱乐服务市场开放，允许并鼓励东盟国家有实力的企业进入中国文化体育娱乐服务市场。

2. 尽快启动中国－东盟更高版本的投资协定谈判。进一步降低双方服务业投资准入的各类门槛，在更多领域取消投资准入门槛；尽快把 CEPA 框架下对香港的开放承诺，引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尽快将外资管理从当前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转变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五）加快打造更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

有效应对 TPP 与 TTIP 等更高标准自由贸易规则的形成，客观上需要中国主动加快打造更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为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积累新经验。为此，需要按照市场决定原则，考虑东盟不同国家发展阶段和开放重点的差异，加快推进与东盟国家一对一的 FTA 谈判，探索更高标准的开放规则。

四、加强“10+1”升级版组织协调

打造“10+1”升级版，涉及贸易、投资、产业、货币、外汇以及外交等方方面面，既需要加强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高层次、广领域的协调，也需要加强中国中央与地方的协调、各部门间的协调。

（一）尽快形成方案建议

利用 APEC 在北京举行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契机，提出方案建议。进一步明确

“10+1”升级版的中长期目标、重点任务、项目清单、路线图、时间表，力争在 2014 年底 TPP 完成谈判之前，形成“10+1”升级版的纲领性文件。对事关全局的重大项目，中国可在具体条件上适当让步，以尽快启动项目建设。

（二）建立“10+1”升级版的高层次协调机制

形成国家层面统筹打造“10+1”升级版的工作机制。明确提出“10+1”升级版急需研究的议题和重要任务清单，组织专家进行专题研讨，就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环境标准、促进中小企业发展、金融监管、竞争政策、国有企业条款、经济立法、市场透明、规制等多个领域，进行分析评估，制定备选方案；建立相关部门和地区参与的高层次协调机制，分解任务，确保责任落实到相关部门和地区，形成打造“10+1”升级版的合力。

（三）尽快研究出台中国具体实施计划

在中国向东盟提交的升级版倡议草案基础上，尽快明确中国实施目标、行动路径、行动主体、体制机制与政策支持等。在中国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主动启动，加快实施。

参考文献：

1. Ian F. Fergusson, et al.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Negotiations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January 24, 2013.
2. 迟福林：《危机挑战改革》，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9 年版。
3. 张蕴岭、沈铭辉：《东亚、亚太区域合作模式与利益博弈》，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0 年版。
4. 黄卫平等：《中国加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5. 何帆：《中国不应缺席 TPP》，《金融时报（中文版）》2013 年 6 月 8 日。
6. 李向阳：《亚太蓝皮书：亚太地区发展报告（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
7. 余楠：《当前国内 TPP 研究述评》，《上海海关学院学报》2012 年第 3 期。
8. 刘中伟、沈加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研究前沿与架构》，《当代亚太》2012 年第 1 期。
9. 丁刚：《中国应尽快加入 TPP 谈判》，《环球时报》2011 年 11 月 15 日。
10. 范黎波等：《美日 TPP 战略与中国的应对》，《现代国际关系》2012 年第 12 期。
11. 王勤：《亚洲区域贸易自由化的兴起与中国策略》，《亚太经济》2006 年第 5 期。
12. 黄海洲、周诚君：《新形势下对外开放的战略布局》，《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内部重大课题》2013 年第 5 期。

责任编辑：李蕊

打造浙江经济升级版的路径*

黄 勇 潘毅刚 江振林

摘要：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是新一届中央政府提出的重要施政目标。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区的浙江，亟需在目标指向上加快五大转变，并从行动导向、改革取向上作出适应性调整。文章最后在升级版的衡量标准上提出了几项带有共性的关键指标，为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转型发展提供借鉴参考。

关键词：经济升级版 浙江经济 改革创新 衡量标准

作者简介：黄 勇，浙江省发改委副主任、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院长；

潘毅刚，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江振林，浙江省发改委规划处副处长。

一、目标指向：实现五大转变

（一）加快要素使用从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

当前，浙江经济发展遭遇了要素使用方面的严峻挑战。一方面，挑战来自于要素供应的紧张。经过 30 多年快速发展，浙江要素供应已经难以保障原有的粗放式增长方式需求，地荒、人荒、电荒、水荒、钱荒、能耗和环境容量指标短缺“接踵而至”。另一方

* 参加本文讨论的还有浙江省发改委规划处处长周丹、浙江省发展规划院副总经济师兼经济研究所所长朱李鸣。

面，挑战则体现在要素隐性成本的显现。国际市场低迷、国内需求不振，使得依靠跑量摊低成本的路子难以为继；土地和能源等关键要素价格不断攀升，生态环境破坏和污染，也进一步要求企业必须为污染排放和治理付出巨大成本；人口红利逐渐消退，人力成本以 15% 以上的年均增幅提高，企业的运营成本不断膨胀，原有外延式增长方式迫切需要向集约使用各类生产要素的增长方式加快转变。

（二）加快经济增长从“出口+投资”拉动向“投资+创新”推动转变

入世以来，支撑浙江经济增长的主要是两大动力——出口和投资。考察二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见表 1），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近些年呈现明显下降态势，投资则已成为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但是，必须看到，无论是国际国内还是浙江自身^①经验都表明，投资不可能一味快速增长。只有代表市场需求和创新趋势的投资才是可持续的，让投资成为经济增长持续动力，必须要与创新相结合。

表 1 2000 年-2012 年以来三大需求对浙江 GDP 的贡献率

	GDP (亿元)	最终消费		资本形成		净出口	
		总量(亿元)	贡献率	总量(亿元)	贡献率	总量(美元)	贡献率
2000	6141.03	3150.88	—	2652.77		337.38	—
2001	6898.34	3579.14	0.57	2891.02	0.31	428.18	0.12
2002	8003.67	4062.46	0.44	3467.46	0.52	473.75	0.04
2003	9705.02	4623.26	0.33	4663.83	0.70	417.93	-0.03
2004	11648.70	5416.73	0.41	5748.87	0.56	483.1	0.03
2005	13417.68	6347.60	0.53	6448.72	0.40	621.36	0.08
2006	15718.47	7499.76	0.50	7297.05	0.37	921.66	0.13
2007	18753.73	8620.50	0.37	8662.44	0.45	1470.79	0.18
2008	21462.69	9828.95	0.45	9326.26	0.25	2307.48	0.31
2009	22990.35	10864.59	0.68	10607.33	0.84	1518.43	-0.52
2010	27277.31	12765.63	0.44	12950.46	0.55	2006.22	0.11
2011	32318.85	15041.98	0.45	14743.55	0.36	2533.32	0.10
2012	34665.33	16509.00	0.63	15460.74	0.31	2695.19	0.07
平均值	—	—	0.48	—	0.47	—	0.05

①从投资率看，2000 年以来，浙江投资率一直保持在约 30%。与国际比较，大大高于美国、德国、法国、印度等 20% 左右的水平。从投资效益看，“九五”、“十五”、“十一五”每增加 1 亿元 GDP 需要的固定资产投资分别是 1.39 亿元、3.71 亿元和 3.31 亿元，近 10 年扩大投资的效益趋于下降，不具效益的扩大投资也不具有可持续性。

值得警惕的是，当前浙江创新投入水平依然较低。2011 年，平均每个大中型企业 R&D 经费支出 616.16 万元，列全国第 20 位，拥有 R&D 人员 31.28 人，列全国第 21 位。平均每个企业研发机构人员仅 34 人，低于全国平均值（58 人）；拥有仪器设备原价 453 万元，低于全国平均值（968 万元）。企业技术引进动力不足，2011 年浙江引进技术经费、消化吸收经费、购买国内技术经费三项支出仅为江苏、上海、广东、山东的 30%-50%（见表 2）。如何将投资和创新有机结合起来驱动经济增长，更加关注投资的质量和效益，构建“市场导向拉动——企业主体加大创新投入——产业竞争力不断提升——市场扩量提质增效”经济循环，已成为未来时期促进投资、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问题。

表 2 2011 年部分省市企业技术引进和改造投入比较（单位：亿元）

地区	引进技术经费支出(排名)	消化吸收经费支出(排名)	购买国内技术经费支出(排名)	前三项之和(排名)	技术改造经费支出(排名)
上海	65.2724(2)	28.1930(1)	21.9066(2)	115.372(2)	138.4810(5)
江苏	72.2060(1)	25.4320(2)	23.9696(1)	121.6076(1)	672.9448(1)
浙江	16.9427(7)	8.5523(5)	13.3282(4)	38.8232(6)	257.2742(3)
福建	33.6257(4)	2.2529(6)	10.9507(5)	46.8293(5)	109.5487(6)
山东	29.9241(5)	18.3306(3)	19.8253(3)	68.08(4)	311.4586(2)
广东	56.7613(3)	9.7786(4)	8.4120(6)	74.9519(3)	181.0850(4)

（三） 加快所有制结构从较单一依靠民企为主的内源式发展向依靠更加开放多元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转变

随着我国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和央企等国有经济的做大做强，浙江市场先发优势逐步消退，产品低端、企业弱小、布局分散、所有制单一的问题逐渐暴露，与国际跨国公司和国内大企业先进水平差距明显。一是缺跨国企业和上规模企业。2012 年全省仅有 2 家企业进入世界 500 强，远落后于北京、上海和广东等地。二是缺鲜明有影响力的主业。许多大型制造企业缺乏鲜明主业，多从事配套行业，资产收入主要构成依靠房地产等非主营收入，企业市场集中度较低、依赖性强、市场容量小，抵御市场波动和持续创新的能力都较弱。

浙江企业“低小散弱”的制度性原因有三：一是起点不高、成长慢。由于浙江企业多是民营，起步于小作坊，产品具有很高的同类性、相似性，路径依赖使得同行业企业过度拥挤，缺乏包容性，生长空间严重不足。二是开放度低、更新慢。许多企业运行封闭，难以吸引外部的资源和人才，更多依靠数量型增长，多年来都没有外部资本进入，内在更新缓慢。据统计，2012 年利用外资规模排在全国前 3 位的江苏、辽宁、广东三省

实际利用外资分别是浙江的 2.7 倍、2.1 倍和 1.8 倍。三是体制单一、风险高。浙江民营企业许多仍实行家族式管理，资本结构单一，抓住外部机遇、吸收外部资源、复制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的抗御能力都远不强，抗御风险能力较差。

用发展的眼光看，继续保持民企灵活的优势，适度吸收国资、外资等高能资本，加快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是改变浙江企业走出当前发展困境的重要途径之一。

（四） 加快产业结构从低端产业和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产业和价值链高端转变

与弱质企业相伴生，浙江产业结构总体层次偏低，产业效益较差。2011 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为 14.8 万 / 人，仅为全国的 70%，约为日本的 25%、美国的 20%。分析原因，双重“低端锁定”问题值得高度重视。

一是结构低端锁定。结构调整滞后，工业结构变动率由“九五”时期最高的 38.4%下降至“十一五”的 23.7%。2005 年-2012 年 7 年间，浙江制造业结构变动率仅为 26.4%，远慢于福建、江苏、山东、广东等地，制造业产值年均增速在沿海 4 省中排名垫底（见表 3）。主导产业低端固化，1986 年-2012 年 26 年间，前 10 位制造业产业基本稳定，传统纺织业、电气机械牢牢占据着前 2 位（见表 4）。

表 3 2005 年-2012 年沿海 6 省市制造业增速与结构变动率

	结构变动率(%)	产值年均增速(%)
福建	53.9	20.6
江苏	43.5	20.7
广东	40.9	15.2
山东	39.4	21.6
上海	36.6	10.1
浙江	26.4	14.4

二是价值链低端锁定。典型特征是速度型效益，工业增速增长快，工业效益好；增长慢，效益差。尤为明显的是，增速下滑的“十一五”时期，浙江工业经济效益指标急剧下滑。2010 年浙江规模以上企业利润仅为江苏的 53%。更值得警惕的是，近年来虽然产业产值仍保持一定增速，但效益却明显下滑。浙江制造业增加值率已经从 1986 年的 39.8%下滑到 2012 年的 18.4%（见图 1）。

结构固化、效益下滑的突出矛盾，必须通过加快结构调整和提升产业层次来打破，其核心就是要加快从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转变，加快从低附加值生产环节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升级。

表 4 浙江制造前 10 位行业产值比重变化（单位：%）

1986 年		1995 年		2000 年		2006 年		2012 年	
纺织业	23.9	纺织业	21.3	纺织业	14.6	纺织业	12.9	纺织业	9.9
机械工业	11.1	电气机械	6.8	电气机械	8.9	电气机械	8.7	电气机械	9.7
食品制造	7.7	纺织服装	6.0	纺织服装	6.6	通用设备	7.4	化工	9.0
电气机械	7.4	化工	5.6	通用设备	6.5	交通设备	6.2	通用设备	7.0
建材	5.5	普通机械	5.5	化工	5.8	通信电子	5.9	汽车制造	5.3
化工	5.2	非金属矿物	5.4	交通设备	5.3	化工	5.8	橡胶塑料	4.7
塑料	4.0	食品加工	4.5	通信电子	4.4	化纤	4.6	化纤	4.7
金属制品	3.5	交通设备	4.1	金属制品	4.2	有色金属	4.5	黑色金属	4.5
饮料制造	2.9	塑料	4.1	皮革	4.0	塑料	4.2	金属制品	4.3
电子通信	2.8	金属制品	3.6	塑料	3.9	纺织服装	4.1	通信电子	4.1
合 计	74.0	合 计	67.0	合 计	64.3	合 计	64.3	合 计	6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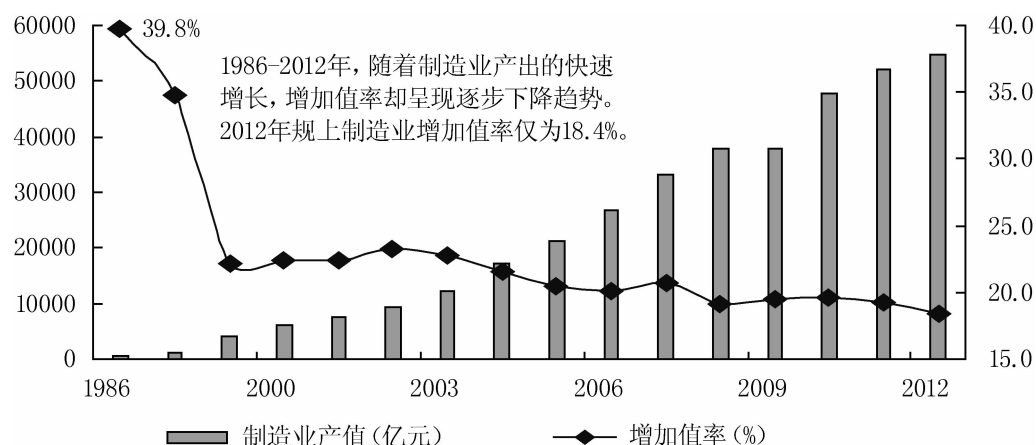


图 1 1986 年-2012 年浙江制造业产值及增加值率

（五）加快经济发展布局从县域经济向都市区经济转变

县域经济为浙江经济起飞做出了巨大历史性贡献。但是，随着发展进入新阶段，县域经济的先天局限也逐步显现：一是资源整合能力有限。受建设用地有限、人才和技术等创新要素不足等县域经济自身资源禀赋条件的局限，导致企业和产业起点较低、规模偏小、技术含量不高，仍停留在以小见长、以量取胜的“小狗经济”、“狼群经济”层面，较难引进和产生行业领军式的龙头大企业，在更高层级的区域竞争中“相形见绌”。二是资源浪费比较严重。县域经济发展早期，因企业就地办厂、分散布局，导致土地浪费和环境污染较为严重。规划建设后，由于县域经济行政分割碎片化，重复建设突出，

资源浪费较严重。产业布局上，由于缺乏跨区域产业链式延伸和各个环节的分工合作，导致县与县之间同类产业区块过度竞争，无法很好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三是资源共享性较差。相对独立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使得与大城市联系不够紧密，中心城市的辐射效应难以向县域渗透。周边县域企业利用中心城市的技术、人才、信息等创新要素也比较困难，人力资源分享中心城市的教育、文化、卫生等公共服务资源十分困难；同时，由于中心城市产业、人口压力难以向周边县域疏解，使得人口膨胀、交通拥堵和环境恶化等成为大城市无法根治的“顽疾”。

从发展趋势看，突破县域行政区划限制，以更宽视野、更广范围来整合优化资源配置，加快从原来的“县域经济”为主体，转变为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具有较强一体化特征的“都市区经济”势在必行。

二、行动导向：做好五篇文章

（一）突出创新驱动，做好加大三项创新投资的文章

从“投资 + 出口”驱动到“投资 + 创新”驱动再到以创新驱动为主，需要一个较长过程。当期阶段，全面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还需充分发挥投资推动创新的关键性作用。一是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加快推动从劳动力流入大省向人才流入大省转变，从人力资源大省向人力资本大省转变，推动少数企业家、偶然性创新向全社会、持续性创新转变。二是加大关键创新平台投资。创新平台在精不在多，要抓住国家加强创新能力基础设施建设有利契机，以都市区高新园区为重点，积极创建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创新型城市，做大做强未来科技城、青山湖科技城等关键载体。三是加大创新基础设施的投资。改变创新设施“全面开花”的观念，优先投资于都市区的骨干设施，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国家示范区建设，系统谋划区域骨干设施建设布局，推进实施宽带战略和智慧城市战略，提高骨干设施现代化水平，构建科学高效、现代化的陆、水、港、空立体智能交通网络，为信息、人才等关键要素自由地在省域内实现充分流动创造条件。

（二）突出结构调整，做好“腾笼换鸟”产业升级的文章

坚持“腾笼换鸟”增量优化与存量提升并举的原则，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一是提升特点。浙江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特色产业，不可能完全抛弃，也不能一成不变。要适应发展新要求，加大治水治气和环境综合治理力度，倒逼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通过能耗和污染指标有偿交易、差别定价、能耗双控等市场、法律手段，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二是培育亮点。集中资源重点加快推动“浙江制造”向“浙江创造”转变，大力培育文化创意产业、工业设计等生产性服务业，深化产业技术综合创新试点，

深入推进工业强县（市、区）建设试点，实现由制造业“一枝独秀”转向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双蕾竞放”。三是突出重点。依托都市区领先的城市化水平和产业基础优势，建设一批国家级现代服务业产业化基地，打造国际重要的港航物流基地和旅游休闲中心以及全国文化创意中心、电子商务中心、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在杭甬温等中心城市，建设一批体现金融集聚、科技研发、管理决策和市场运营的总部基地。支持港口城市依托现有产业集群和港口条件，重点发展先进装备、石化、船舶、汽车等新型临港工业。四是做强焦点。大力实施“名企、名品、名牌”战略，集中力量、竞争择优支持一批规模较大、经济效益好、带动能力强、产品具有竞争优势的龙头骨干企业和科技型、创新型企业，通过壮大主业、资源整合、创新发展等方式提升核心竞争力，力争形成一批本土跨国公司、一批小巨人企业、一批高新技术上市公司和一批成长性的科技型中小企业。

（三）突出功能分区，做好经济布局优化的文章

打造经济升级版，必须重视空间资源的合理高效利用，通过布局优化，提升经济持续协调发展能力。一是积极推动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省域国土空间总体布局，科学谋划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框架，确定城市边界、农业区域和生态区域，制定相关配套政策措施，推进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二是以都市区形态组织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我们认为，当前阶段都市区是统筹浙江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最佳空间组织形态。都市区建设应以增强中心城市的集聚辐射能力为首要任务，进一步提升其产业层级，确立在区域产业链中的高端地位。同时，加快构建便捷交通网络，在合理确定都市区规划边界的基础上，对规划区范围内的产业、人口和城镇布局作出前瞻性研究和统筹安排，布局必要的快速交通联系方式。对于交通流量较大的沿线区域，可规划建设轨道交通。同时，要强化中心城市公共服务资源的配置，提高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现代化、国际化水平，成为都市区吸引高端人才、打造宜居环境的“强磁场”。探索建立都市区内公共服务共享机制，推动大城市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功能下沉”，向周边县城和中心镇延伸。三是以中心镇、中心村为核心开展“美丽乡村”建设。把建设生态文明与推进新型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加快中心镇发展与小城市培育，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按“新社区”要求规划建设中心村。

（四）突出效率提升，做好要素集约节约利用的文章

突出质量和效益优先，让市场在土地、能源、水资源和环境容量等要素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尤其是要在土地增效上下功夫，重点做好“四块地”文章，努力破解打造升级版最大的“成长烦恼”。一是用好增量。全面实施“亩产倍增计划”，分类指导、

市场定价，力争到 2020 年新增工业用地平均投资强度比 2010 年增长 40%，单位工业用地总产值比 2010 年翻一番。二是盘活存量。加快盘活城镇、企业低效存量用地，加快“城中村”和利用率不高的低矮房屋整改；在不改变土地规划用途的前提下，鼓励企业单位通过减少绿地、压缩辅助设施用地等途径提高土地容积率，对企业单位二次开发低效建设用地免征土地价款。三是开发地下。要向城市地下要空间，编制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加快出台鼓励社会资金投资建设地下商业街、综合体等地下工程的政策措施，力争“十二五”全省新开发 1 亿平方米以上地下空间。四是建设飞地。打破地域界线，支持国家级高新区和产业园区跨区域建立“飞地式”分区。深化省域间异地工业园建设，与中西部省份共建共享一批异地产业园区。探索与国内外资源丰富的地区共同建立保障国民经济社会安全的粮食、石油、天然气、矿产等重要物质储备体系。

（五）突出平台升级，做好对外开放纵深拓展的文章

加快建设若干深层次、高能级和广辐射的对外开放平台，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以开放促进转型升级。一是做强海上开放平台。强化舟山群岛新区、宁波—舟山港一体化建设为重点的开放门户功能建设。完善舟山群岛新区成为自由贸易园（港）区的基础性条件，加快宁波—舟山港域大宗商品国际储运加工贸易基地和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建设；二是做新内陆开放平台。推动义乌国家级小商品国际贸易区建设，加快义乌内陆综合港建设和航空口岸开放，争取设立义乌综合保税区，积极争取创建国家级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提升义乌国际小商品贸易中心辐射能力。三是做大境内外合作平台。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在境外投资建立更多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加快国际工程承包“走出去”步伐，建立一批战略资源生产供应基地、加工贸易制造基地、科技研发和市场营销基地，输出资本、商品和劳务，输入技术、管理和资源。四是做实虚拟网络平台。以骨干龙头电子商务企业为支撑，推动传统制造、专业市场等传统业态与电子商务互动发展，做实做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国际电子商务平台，让信息化成为推动中小企业、传统产业、专业市场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

三、改革取向：推进五项创新

重点围绕权力体制、要素配置、规划管理、政绩考核、民生保障，推进五项创新，实现“五化同步”，为打造经济升级版释放“改革红利”。

（一）行政审批权力清单化

进一步深化政府改革，建立两个“清单化”制度，力争在行政审批制度创新方面走在全国前列，着力打造“审批事项最少、办事效率最高、投资环境最优”省份。一是建

立政府权力的正面清单制度。在清单范围内履行职能，清单一律向社会公开。清单之外的，一律不得实施审批。完善政府职能监督、评估机制，建立审批事项重大失误责任追究制。二是建立企业和市场的负面清单制度。简政放权，将更多的行政审批权限下放，放权社会、放权企业、放权市场、放权基层，以清单方式列明投资项目不得准入领域。

（二）要素资源配置市场化

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让土地、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等一切生产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生态资源、环境质量的价值充分显现。一是地尽其力。充分利用地上和地下空间资源，建立“以上补下、以下补上”的激励机制，建立低效利用土地市场化退出机制，推广低丘缓坡未利用土地开发。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探索建立农村宅基地跨社置换、有偿退出、有偿使用的机制。二是财尽其用。深化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丽水农村金融改革，加快推进台州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改革创新实验区建设，建设小微金融服务中心和财富管理中心，争取在地方金融服务平台建设、涉外金融体制机制创新、普惠金融等方面取得新突破，促进民间资本和实体经济有效对接。三是人尽其才。加大人才投入力度，鼓励企业建立研发人员报酬与市场业绩挂钩机制，使人才的贡献与回报相匹配，让各类人才脱颖而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四是资源永续。深化能源要素配置改革，加快建立完善省级环保市场，探索节能、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制度和节能减排交易市场，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三）规划管理实施稳态化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将发展蓝图固化、美化，有效执行。一是推进多规统一融合。加强发展规划与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衔接协调，探索编制“浙江省域国土空间利用总体规划”，统筹考虑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和国土空间安排，作为各类规划的顶层设计。加强总体规划与专项规划衔接协调，统筹公共资源和政策配置。加强上下位规划衔接协调，统筹区域与本地经济社会发展。二是完善跨区域规划衔接机制。把好区域规划编制的“入口关”，建立区域规划编制的立项制度。完善区域规划实施的协调合作机制，建立跨行政区的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联席会议制度。三是硬化规划实施执行。加强规划综合管理的建章立制，提高规划法律约束性，加强规划重大项目实施、监测评估，消除“重编制、轻实施”现象。

（四）政绩考核体系科学化

用好“指挥棒”，科学制定政绩考核体系，有力推进经济转型升级。一是导向科学。

进一步完善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减少数量型、速度型考核指标，加大民生改善和环境保护指标权重。二是考核科学。简化考核程序，提高考核效率。按照主体功能区确定的地方干部执政考核目标导向，实现分类考核。对限制开发区域不再考核 GDP、工业和投资等指标，其中，重点生态功能区实行生态保护优先的绩效评价。三是评估科学。建立领导干部任期后评估制度以及相应责任追溯机制，减少领导干部的短期化行为。强化任期内举债情况考核、审计和责任追究。制定违背科学发展行为责任追究办法。

（五）民生保障政策体系化

不断改善的民生保障是经济升级版的应有之义。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稳妥处理好改善民生和发展经济的关系，尤其是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条件下，对部分地区、部分行业和一些企业出现的一些困难，要用“社会政策托底”来解决，织好一张覆盖全民的基本民生安全保障网。一是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积极的就业政策，完善城乡统筹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创业带动就业，推动多渠道多形式就业。二是进一步完善养老、医疗、失业等各类社会保险制度，完善社会救助体系、社会福利制度、社会慈善体系等制度。三是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建立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四是深入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效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基本养老、基本住房、特困群体等居民最基本需求。

四、衡量标准：确立十项指标

基于浙江实践和与沿海省份的比较，我们认为，我国沿海经济先发地区打造经济升级版，面对许多共性问题，有着相同的转型升级目标。鉴于此，对于这类经济先发地区，建议可用“一揽子环境控制指标、两大结构指标、三项收入指标和四方面效率效益指标”等十项指标作为评价经济升级版进程的共性度量标尺。

（一）提高“一揽子环境控制指标”标准

打造经济升级版，必须以绿色发展为硬约束，高标准要求生产生活中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让人民拥有干净的水、清新的空气和蔚蓝的天空。目前，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与发达国家差距仍然巨大，以浙江为例，单位生产总值 SO_2 排放量是美国的 5 倍、德国的 10 倍、日本的 30 倍，土壤、空气和水污染问题也日益突出。建议可进一步扩大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指标范围。在考核的四项主要污染物排放基础上，增加 $\text{PM}_{2.5}$ 、烟尘粉尘排放以及周边海域环境质量、土壤质量等关键生态环境领域的指标作为约束性指标，以此倒逼经济转型升级。

（二）加快“两大结构跃迁”

结构调整是打造经济升级版的核心内容，城市化和服务业主导是经济结构跃迁的“牛鼻子”，也是升级版的战略重点，必须抓好。建议以两方面的宏观指标衡量结构的变化：一是城市化水平。建议采用城市化率以及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城市化率差两方面指标来度量城市化水平。鉴于目前以常住人口口径的城市化率存在虚高状况，而按户籍人口计算的城市化率又严重低估，为寻求相对合理的评价城市化水平指标，建议在用常住人口计算城市化率的同时，增加差值指标来衡量“人口城市化”进程。二是服务业发展水平。从世界范围看，服务业占 GDP 比重是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度量指标。但考虑到现阶段在我国仅用比重指标衡量一个地区服务业发展水平可能有失偏颇，故建议在比重指标基础上再增加人均服务业增加值指标，用两项指标综合考量更为合理。

（三）实现“三大收入倍增”

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是升级版的核心，也是度量物质富裕的重要指标。要实现升级版，收入指标必须保持相对较高增速。建议动态考虑汇率和常住人口增速放缓等因素，提出到 2020 年实现人均 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等三项收入指标的均比 2010 年倍增的计划。三项收入指标的关系上，要求城乡居民收入与 GDP 增速同步，城乡收入差距则趋于降低。

（四）大幅改善“四方面效率效益”

质量效益指标是打造经济升级版的必然要求。建议可选择四个指标进行衡量：一是反映劳动效率的重要指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以浙江为例，当前该指标约为美国的 1/5、日本的 1/4，建议到 2020 年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降低到一半左右。二是反映产业链分工层次和工业产品附加值的指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率。2012 年浙江、江苏、广东、山东均在 25% 以下，而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工业增加值率均在 45% 左右。建议到 2020 年应力争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率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缩小一半，争取达到 30% 以上。三是反映土地产出效率的指标——单位建设用地 GDP。总体目标是实现亩产比 2010 年倍增。四是反映能源投入产出效率的常规指标——单位 GDP 能耗。当前浙江、江苏、山东等发达省份，该指标比发达国家要高出 1.5-2 倍。建议未来总体保持目前削减速度，到 2020 年单位 GDP 能耗可接近发达国家当前水平。

责任编辑：刘英奎

· 案例研究 ·

大型工程承包企业实施“走出去” 战略的探讨

——以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拓展非洲业务为例

朱 杰

摘要：本文以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拓展非洲工程承包业务为例，针对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制定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在非洲的长期发展战略规划；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实施属地化经营的策略；注重企业国际化高端营销人才的培养；对面临的风险应该有充分的准备。

关键词：“走出去” 非洲 建设 水电站

作者简介：朱 杰，中国水电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博士。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实现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要加快企业“走出去”步伐，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党的十八大精神为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进一步做大、做强，拓展国际业务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一、实施“走出去”战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纵观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物质生产的历史。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人们的消费方式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发展成为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世界上各个

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增多，密不可分。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但发展中的中国也面临市场空间有限、资源供应瓶颈、产业升级加快、贸易摩擦激烈等方面的严峻挑战。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提出“走出去”发展战略，鼓励国有大型企业走出国门，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将中国技术、产品、服务推出国门，走向世界。

（一）“走出去”战略是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1978 年以后，中国开始实行“引进来”战略，较大规模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资金、商品、管理和服务，效果比较好。“引进来”的实质是以市场换取投资，以市场换取技术，这是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单向结合。而“走出去”战略的实质，则是以投资、技术换取资源、市场。“引进来”战略与“走出去”战略相互结合，使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双向融合，为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实施“走出去”战略是中国全方位、多领域对外开放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施“引进来”战略的必然结果。

（二）实施“走出去”战略有利于带动中国成套机电设备出口，提高国有大型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多种工业产品的产量已经居于世界首位。中国水电站建设的水平通过三峡等多个国内大型水电站建设的锻炼，已经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具有在国外建设、承包大型水电工程的能力。在国内水电建设市场空间有限的情况下，中国水电建设集团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在国外承包了多项大型水电建设项目，间接带动国内大型水轮发电成套设备、输变电设备的出口，创造了大量国内就业机会，并带动劳务输出。通过多年在国外承包大型工程项目的实践锻炼，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三）实施“走出去”战略有助于解决中国自然资源短缺问题

能源、原材料、各类战略性矿产品供应的瓶颈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全世界自然资源的分布不平均及中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人均资源占有率，是中国长期面临的问题。实施“走出去”战略，赴海外投资能源、油田、矿山，是我们必然的选择。能源及矿山行业是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没有开发资金和技术资源，就没有办法实现增值。中国企业到海外购买资源类资产或者拥有国外资源类企业的全部或者部分股权，可以得到来源稳定、价格成本相对低廉的自然资源，减少价格波动给中国企业造成的损失，从而解决中国自然资源短缺问题。

（四）实施“走出去”战略能提高中国外汇储备的投资效益，保障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全世界开放的贸易体系，给中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凭借相对低廉的生产成

本，中国商品畅销全世界。2013 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突破 4.16 万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巨额贸易顺差给人民币带来了升值压力。到 2013 年末，中国外汇储备已经达到 3.82 万亿美元。目前，中国外汇储备主要用于购买低风险、低收益的主权债券。在美元持续贬值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外汇储备存在贬值的风险。建立多元化的外汇储备管理与投资机制刻不容缓。利用中国充足的外汇储备，大力增加海外投资，支持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加快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保障中国战略资源安全及经济金融安全。

二、非洲水电建设现状及发展前景

非洲是世界第二大洲，面积约 3020 万平方公里。非洲 2/5 的地区年降水量不足 250 毫米，只有刚果盆地和几内亚湾沿岸降水量比较丰富。由于地形和降水等原因，非洲水能资源分布不均匀。位于中非大西洋沿岸的刚果（金）、喀麦隆、安哥拉、加蓬以及位于印度洋沿岸的埃塞俄比亚等国水能资源比较丰富。

刚果河流域面积 376 万平方公里，平均年径流 13000 亿立方米，全流域可开发水能资源装机容量 1.56 亿千瓦，年发电量 9640 亿度。刚果河下游金沙萨到马塔迪，河道长 300 公里，落差 260 米，是世界水能资源最集中的河段，可以分为三级开发，共可装机 6850 万千瓦。仅大印加水电站一级就可以装机 4000 万千瓦，比中国三峡工程装机还要多一倍。目前，刚果河水能资源仅部分开发，装机 175 万千瓦。

尼罗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全长 6670 公里，流域面积 300 万平方公里，流经布隆迪、乌干达、肯尼亚、埃塞俄比亚、苏丹、南苏丹、埃及等国家。尼罗河干流及支流已经开发建成了 10 座水电站，共装机 369 万千瓦，最大的埃及阿斯旺水电站，装机容量 210 万千瓦。

尼日尔河是非洲第三大河，流域面积 220 万平方公里，全长 4200 公里，流经几内亚、马里、尼日尔、尼日利亚等国。在尼日利亚境内规划有 3 座水电站，可装机 214 万千瓦。几内亚、马里、尼日尔境内还有一些瀑布，是适合建设水电站的地址。

赞比西河流经赞比亚、安哥拉、刚果、纳米比亚、博茨瓦纳、津巴布韦、莫桑比克等国，流域面积 133 万平方公里，全长 2574 公里，规划在干流支流上建设 9 座水电站，总装机容量 1388 万千瓦，已经建成 4 座水电站共 392 万千瓦，其中卡博拉巴萨水电站设计装机容量 415 万千瓦，初期建成 208 万千瓦。

非洲是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大陆。非洲各国先后独立以来，经济有了一定增长。但大多数非洲国家经济结构单一，主要依赖于一两种农矿产品，对进一步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充满热情。但是，电力短缺成为制约非洲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只拦路虎。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大部分国家，只有大约 20% 的家庭能够用上电。

水电资源是一项清洁的可以再生能源。非洲各国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对开发非洲的水电资源表现出强烈的愿望和高度热情。目前，非洲水电市场开发已经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2012 年非洲经济增长率为 4.8%，已经摆脱了长期低迷状态，步入稳步增长阶段。许多非洲国家基本上做到财政平衡，非洲的整体财政状况已经从赤字转变为盈余，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控制。非洲经济占全球经济的比例为 1.5%，由于其增长速度高于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对全球经济增长率的贡献达到 2%。非洲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为世界带来商机，也为开发非洲国家丰富的水力资源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目前，非洲人均电力消耗约为每年 500 千瓦时，而西方发达国家人均电力消耗为每年 10000 千瓦时。非洲可开发水电资源占世界的 19%，而水电发电量只占世界的 3%，水电利用率仅为 8%（世界平均水电利用率为 60%）。可见，非洲绝大部分的水电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和利用，资源优势并没有转化为电力优势。非洲国家在人均电力消耗及水电发电量方面与世界其他国家存在着巨大差距，这表明非洲水电市场具有广阔的开发前景，蕴含着巨大商机。非洲水电市场的现状对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机遇是，非洲水电市场大发展的时刻即将到来。有 50 多年深厚的中非友谊做坚强后盾，有 40 多年中非在水电站建设方面的良好合作基础，中国水电集团在非洲水电工程总承包方面大有可为。挑战是，非洲国家普遍缺乏水电建设资金，而水电建设是资金密集型产业，投资回收周期长达十几年。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应该加大融资力度，创新筹资方式，获得充足的资金支持，为非洲人民建设更多更好的水电站。

三、中国水电建设集团非洲业务概况

1964 年，中国水电十一局（原黄河三门峡工程局）承担了新中国第一个援外项目——非洲几内亚金康水电站。经过 2 年辛勤工作，项目取得圆满成功，为几内亚 4 个城市带来光明，传播了中国人民对非洲人民的友好情谊。1988 年，中国水电建设集团通过境外竞标获得第一个工程总承包项目——中非共和国巴利水利枢纽工程。该项目资金由非洲发展银行、世界银行、科威特基金会提供贷款，业主是中非共和国电力公司。巴利水坝工程于 1991 年 5 月竣工，中非共和国总统亲自接见项目工作人员并授勋。这是一个标志着中国水电开始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里程碑工程。

2000 年以后，在“走出去”战略的指引下，在中国进出口银行贷款的帮助下，中国水电建设集团依靠国内设计技术、施工经验、水电设备制造、筹资融资方面的优势，在国际工程承包市场迅速崛起，特别是在非洲承接的项目越来越多，项目的规模越来越大，已经成功中标 10 亿美元、20 亿美元的特大型工程；与此同时，项目管理水平也越来越高，参与项目承包的方式更趋多样化。2003 年，中国水电与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通过竞标，获得苏丹麦洛维大坝土建工程总承包合同，建成了长达 9.7 公里的最长的水电站大坝，该大坝获得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中国水电建设集团于 2007 年开始承

建加纳布维水电站。布维水电站装机三台，总装机容量为 40 万千瓦，年发电量 10 亿度，合同金额为 7.98 亿美元，工程 2014 年全部建成并投产发电。

近年来，中国水电在非洲业务又有了较大增长，仅 2013 年就在非洲 28 个国家有 200 多个工程项目同时进行中。中国水电海外业务的运作模式已经从单纯工程承包，发展到 EPC（工程总承包）、BOT（私人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还进入非洲矿产资源投资业务等高端领域，形成了以工程承包为核心业务、资产经营为重点的业务结构。2013 年 5 月 28 日，总合同金额 13 亿美元、总装机容量 70 万千瓦、尼日利亚目前最大的宗格鲁水电站开工建设，5 年以后，清洁的电力将会源源不断地输入工厂和农村，改善尼日利亚人民的生活水平。

四、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实施“走出去”战略面临的困难及问题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与非洲的合作，从小规模的、带有援助性质的项目合作逐渐转变为大规模的、平等的商业合作，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西方建筑工程承包企业加大在非洲市场开拓力度，非洲项目所在国的工程承包商进步十分迅速，成为中国水电的强劲对手。部分非洲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经济发展，通过各种方式设置贸易投资壁垒，尽量满足本土化要求，增加了中国水电进入的困难。中国水电在实施“走出去”战略的过程中，面临着“前堵后追”的不利局面，主要碰到了如下困难和问题。

（一）资金瓶颈

当前，我们面临的国际经济形势比较严峻。2008 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具有传统意义上周期性危机的特点，更多地表现出结构性危机的特点，使世界经济严重衰退。非洲国家普遍缺乏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到非洲承包水电工程，需要承包企业自带资金。资金筹措风险大，成本高。现有企业资金筹措方式单一，资金筹措困难，往往千方百计争取到非洲水电建设项目，资金迟迟不能到位，对项目完成产生不利影响。

（二）本土化、属地化经营不足及无序竞争

偏好使用中国劳动力资源，当地雇员的使用数量太少。有“干个工程就走”的临时思想，不重视属地化经营，忽视融入当地文化，缺乏社会责任意识。固定资产投资不够，中国水电对非洲各区域总部办公场所建设不够重视，没有做好在非洲长期经营的准备。中国工程承包企业进入非洲的数量越来越多，企业之间存在无序竞争问题，在部分热点市场已经出现过度竞争、低价竞争的现象，给中国国家利益造成不良后果，企业也遭受经济损失。

（三）高端国际业务营销人才及国际工程管理人才不足

非洲的工程承包项目由于参与方众多、操作复杂，商业谈判的困难程度非常人所能

想象。应当重视培养一批熟悉国际政治和非洲商务环境、具有谈判能力和经验的国际业务营销人才。由于管理与经营理念与国际惯例存在差异，与当地员工的磨合需要很长的时间和较高的代价，急需培养一批既懂得技术，又了解非洲当地环境、语言、文化的国际管理人才。另外，有经验的技术专家及工程设计人员大部分在国内，施工现场很难找到高水平的、能解决问题的高端技术人才。建议组织技术专家定期到施工现场巡视，及时解决出现的技术难题。

（四）部分非洲国家政局不稳，投资环境较差

非洲基础设施落后，法律法规体系不够完善健全，政策缺乏连续性，社会治安欠佳。而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导致架空了法律。在非洲国家中，这种表面的法制现代化和深层次的人民法制观念淡薄短期难以消除，非洲国家法律法规体系的不健全，使中国水电在非洲承包工程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非洲国家各级官员腐败问题严重。高素质劳动力缺乏，同时又限制外国劳务数量，给中国水电承包工程带来较大困难。安全问题突出、生活条件艰苦、各种流行病给中国水电员工财产安全及身体健康造成较大影响。

（五）企业自身能力建设不足

总的来说，中国企业还存在着经营规模不够大，主体实力不太强，承接工程项目档次不太高等问题。此外，工程承包企业内部管理水平较低、信息渠道不够畅通、职工素质不够高、国际“游戏规则”不太熟悉等，也是制约我们企业“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因素。对工程项目盯得不够紧，有时出现基本谈好中大项目后麻痹大意，没有趁胜追击、扩大战果，导致前期的辛苦努力开展的好局面白白浪费。利用国际标准建设水电站不够，行业标准与国际没有接轨。虽然中国水利水电施工技术世界领先，但还没有形成品牌优势。

五、拓展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在非业务的探讨

为了进一步拓展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在非洲的基础工程承包业务，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应该在以下几方面做出更大努力。

（一）坚持执行国际业务优先发展战略，制定在非长期发展规划

建立系统性的国际业务优先发展战略支持体系，优先配置非洲项目资源，加强非洲项目的管理与控制，随时把握市场动态，投标工作走在前面。以前所未有的大思路、大手笔，以敢为人先的精神，制定非洲业务远期战略规划、中期战略重点及近期发展目标。

远期战略的重点是，争取到刚果（金）规划中的大因加水电站建设工程尽可能多的市场份额。该项目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预计投资 800 亿美元，发电能力 4000 万千瓦。中国水电建设集团要组织专门班子，指派专人负责紧盯该项目的运作情况，在设计、融资、技术、施工及人才方面做好充分准备，一旦大印加水电站确定开工，马上组织最强

力量参与工程投标，争取一举成功。

中国水电的中期战略重点是，在埃塞俄比亚水电项目群（埃塞俄比亚政府计划在未来 10 年内投资 50 亿美元，新建 8 座水电站，使居民用电普及率由 15% 提高到 60%）、尼日利水电开发项目群、几内亚和塞拉利昂西非水电项目群中获得较多的工程总承包合同。

中国水电的近期目标是，建设好已经签约的工程承包项目，如尼日利亚宗格鲁水电站、科特迪瓦苏布雷水电站、几内亚凯乐塔水电站等在建工程，把这些水电站建设成为精品中的精品，成为树立“中国水电”为著名全球品牌的样板。应该力避短期行为和急功近利，克服“做完一个工程就走”的临时思想，着眼于长期可持续发展，以质量取胜，以品牌取胜。

（二）多渠道筹集资金，满足在非承包水电工程需要

由于在非洲投资建设水电站通常金额巨大、风险点多、融资成本较高，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在非洲遇到的最大难题还是建设资金的筹措。有时项目已经签约，资金迟迟不能到位，影响了工程进度。为了解决资金瓶颈，必须多渠道、多种形式筹措资金，主要采用银行贷款、发行企业债券、企业内和企业间借款等方式及依靠在国内外资本市场公开发行资产支付证券来直接融资。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要积极引入多元化投资融资主体，不断创新项目融资方式，引导金融资源支持非洲水电建设事业，把有资质的水电项目发起方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作为贷款主体，引导更多信贷资源支持水电建设。目前，贷款给中国水电最多的金融机构是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我们正在努力争取从非洲发展银行、世界银行获取部分基础设施建设贷款，使建设资金来源更加多元化，更加安全。

2011 年 10 月，中国水电股票在上海股票交易所上市，共公开发行 30 亿股，募集资金 135 亿元，用于支持国内外水电建设事业。此外，中国水电还于 2006 年发行企业债券 12 亿元，2009 年发行企业债券 13 亿元，2012 年发行企业债券 50 亿元，共募集资金 75 亿元，这些资金都有力地支持了国内外业务的开展。2013 年上半年，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新签国外工程承包合同 293 亿元，比 2012 年同期增长 8%。

中国水电下属 18 个工程局，这些二级单位有很多自有资金。建议把这些自有资金集中起来，组成供公司内部使用的资金池，允许各单位实施小项目或者签约新项目之前又快又稳地使用一部分资金，待工程得到利润以后，按比市场利息更高的金额返还资金池。

（三）实行属地化经营策略，不但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

中非友谊源远流长，有着坚实的基础。中国水电要在非洲长期发展，必须实行本土化、属地化经营策略，不但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特别要注重对非洲人力资源培训和人才培育工作，以提升非洲发展的自我造血能力，提高非洲工人的素质和技能。中国水电接到非洲工程承包项目以后，要大量雇佣当地员工，尽快融入当地社会，借助于

当地员工，尽快熟悉当地法律、法规、技术规范，及时了解工程信息，把握非洲水电市场发展前景。在工程进行当中，积极疏通与当地政府和主管机构的关系，赢得所在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合作。以提供技术、设备、管理、部分资金等多种形式，与当地公司合作，发挥双方优势，争取更多的市场份额，互惠互利，实现双赢。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实行属地化管理，有利于资源的合理化配置，有利于中国工程承包企业进一步开拓非洲市场，寻找新的增长点。中国水电要依法经营，诚实守信，爱护当地资源，保护环境。

实行属地化经营策略，并不是一切岗位都用非洲当地人。公司要对中国水电所有员工进行严格保密培训和纪律培训，对企业的核心秘密绝对不能泄露。企业核心部门限制使用当地雇员，非核心部门大量使用当地雇员。关键部门部分中级岗位限制使用外籍雇员，企业的领导岗位、核心岗位杜绝使用外籍人员。

（四）注重本企业高端人才培养，继续扩大中国水电在非市场份额

要使中国水电成为国际一流工程承包商，培养复合型、高端化的国际型人才是关键。这批人才是大中型水电项目的推动者、谈判者、组织者和决策者。利用国内门类齐全的规划、设计、制造、建设和运行体系，利用中国的资金实力，调动全球资源，包括调动非洲项目所在国的资源，推动非洲的水电资源和其他基础设施开发，推动非洲的经济发展。

中国水电要用好、用足国家优惠政策，争取国内外金融机构对非业务的支持。加强调研和信息服务，增加软交流，提高中非之间互相了解、互相包容，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建设，为当地兴建一些投资小的社会公益项目，和谐中非关系，博得非洲人民的好感。以战略的眼光看待非洲广阔的基础设施工程承包市场，探讨采用多种合作形式，扩大市场份额。建议采用“带资入股”的方式进入非洲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分享少量利润，也承担较小风险。目前，非洲各国私有化浪潮涌现，投资参与成为主流的合作形式。单个中国公司资金实力有限，难以承受。需要公司间采用强强联合、强弱联合、专业联合等多种形式合作，公司间优势互补，以联合体或者分包方式，借船出海，“走出去”承担大项目，承接大工程。采用国际上流行的BT（建设-转让）、EPC（工程总承包）、EPC+融资、BOT（建设-经营-转让）、BOO（建设-拥有-经营）、BOOT（建设-拥有-经营-转让）等方式承接工程项目，既承接“一般性”的短平快项目，也要争取承接规模大、技术含量高、带动出口、收益丰厚的工程总承包项目。

（五）面对投资非洲的风险，制定万全的应对策略

非洲已经成为中国的海外第二大工程承包市场，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超过 170 亿美元。但在部分非洲国家，还存在政局动荡、社会治安形势恶化、官僚主义、贪污腐败及国家资源民族主义思潮盛行的问题，危及到中国企业的投资安全及人员财产安全，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应对策略。

从国家层面来说,中国已经与非洲 33 个国家签订了双边促进与投资保护协定,与 11 个非洲国家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能保护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利益。但在中非双边投资条约中,还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例如,投资条约中有“公平公正”条款,却没有相应条款规定“公平公正”的内涵;在投资定义条款中没有对“投资活动”做出详尽的定义;条约规定所在国可以为了“公共目的”征收中国的投资,但对“公共目的”却没有做出详细、明确的界定,这就有可能导致投资所在国以“公共利益”为理由,把中国的投资攫为己有;在“投资损害与损失”条款中,对“充分赔偿”如何操作,并无具体规定;在缔约双方争议解决条款中,对仲裁依据并没有明确定义。在这些双边投资条约中,除了某些条款定义比较模糊以外,还存在着对中国企业在非投资利益保护力度不够大的问题。为了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对已经签约的非洲国家出现投资纠纷时,启动谈判机制,据理力争,保护中资企业的利益。以后与非洲国家签订新的双边投资条约时要采用附则或者补充议定书的方式,把模糊定义清晰化,使条约定义准确、可操作性强,以便更好地保证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安全。

中国企业本身对于投资非洲可能存在的风险,应有充分的应对准备。参加招投标报价不能太低,尽量争取一些合理、优惠的合同条款;承接项目以后可以通过转包、分包的方式转嫁一部分风险,当然利润也要转走一部分;在判断某些风险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一定会出现时,及时停止实施项目,撤走设备人员,尽可能减少损失;还可以选择多家有实力的保险公司投保,转移一部分风险;中国水电在水电建设领域具有较大的专业优势,还要与具有风险管理技术和经验的西方国家的水电建设大公司 & 国内其它企业充分合作,共同防范经营风险。

六、中国水电在非洲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启示

20 多年以来,中国水电建设集团积极贯彻和实施“走出去”战略,走进非洲,经营规模逐渐扩大,经营层次持续提高。承接了非洲 90% 水电站的建设任务和大量其他建筑工程,在非洲 29 个国家有工程项目,水电站装机容量累计达到 5000 万千瓦,帮助许多非洲国家摆脱了电力短缺;较大地带动了非洲经济发展,带动了就业,直接雇佣当地员工 4.2 万人,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中国水电在非洲实施“走出去”战略有很多启示。

(一) 加快培育中国的跨国公司

经济全球化使全球经济逐步融为一体,国界被打破,产品和要素在国际间充分自由流动,全球生产与全球市场已经形成。面对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中国企业无法逃避:要么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行业领导者;要么成为国外大企业的附庸;要么被淘汰。中国企业要积极参与全球化生产的分工与合作,在经济全球化中掌握主动权,这就需要加快培育中国自己的跨国公司。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平均 9% 的速度高速增长,但中国

还远不是一个经济强国，要真正成为经济强国，必须十分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必须依靠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

（二）注重企业核心能力建设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动力是利用国外的市场和资源，对外直接投资的关键是核心能力或者核心专长的输出。所以，企业在对外投资前要做足功课，充分了解自己的优势和核心能力，包括跨文化管理能力、跨国并购后的整合能力。中国企业要充分了解投资目标国现状，不急于求成，不盲目投资，按照企业国际化的规则行事。把企业人才队伍建设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吸收、培养一批熟悉国际政治，熟悉国际商务环境，具有谈判能力和经验的国际业务营销人才，吸收、培养一批既懂得技术，又了解投资对象国环境、语言、文化的国际管理人才，吸收、培养熟悉本企业业务工作的国际法律人才或者雇佣当地著名的律师、资深人士维护中国企业的利益。

（三）必须实施本土化经营策略

“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要做到人员国际化、生产国际化、销售国际化、研发国际化，雇佣当地员工，使用当地资源，在当地销售产品，将利润汇回国内，在东道国扎根、发展，全面实现本土化，才能成为国际化的跨国企业。实行本土化经营，可以促使中国企业利用当地有比较优势的的生产要素，降低生产成本，减少商品库存，缩短生产周期，节约运输费用，取得竞争优势。实施本土化经营策略还可以打破所在国的贸易壁垒，分散客户风险，享受关税优惠，发挥低成本优势，对冲汇率风险，取得原产国生产及避税优势，同时，还可以为中国企业积累国际化经营的经验。

参考文献：

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 2012 年 1 版。
2. 《中国电力百科全书（第二版）》，中国电力出版社 2001 年版。
3. Gouo Yemtsa、李明：《非洲电力发展障碍和小水电发展前景分析》，《中国农村水利水电》2009 年第 5 期。
4. 刘风秋：《中国水电海外崛起》，《中国三峡建设》2011 年第 1 期。
5. 《中国公司承建非洲九成水电站》，《人民日报》2013 年 6 月 1 日。
6. 郑林平：《资产证券化融资模式选择》，《水力发电》2005 年第 12 期。

责任编辑：刘英奎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理论与实践”论文征集暨优秀论文评选活动参选文章

丹东市旅游局提供支持

• 新书推介 •

一部推动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力作

——评析张祥、张健著《机遇与挑战：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

王晓红

跨国并购是全球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也是企业快速组合全球资源、实现国际化发展的重要路径。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从小到大，已经进入跨国并购大国的行列。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步伐加快，参与跨国并购越来越多，这一趋势既是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需要，也是企业国际化发展的需要。通过跨国并购的方式进行跨国经营，是中国企业一项崭新的实践，也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级企业成长的必由之路。目前，由于许多中国企业缺乏对跨国并购规律性的认识，不熟悉国际规则，不了解国外文化、政治、法律环境等，跨国并购的成功率仍然较低，出现中途夭折、并购后整合困难、企业严重亏损等诸多问题，致使国家和企业利益遭受损失。因此，迫切需要理论指导，跨国并购问题正逐步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但仍缺乏适应新形势，指导性、应用性、针对性强的理论文献，这也对理论界的研究提出了迫切要求。

专著《机遇与挑战：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是一部系统全面地研究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力作，它的问世对于推动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实践发展和理论研究都将产生深刻影响和作用。该书作者张祥教授是该领域资深专家、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理事，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历史进程的见证者、参与者，在他工作期间走访了近 100 个国家和地区，接触了大量的国内外企业，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这部专著是作者站在全球化视野和国家利益的高度，结合自己海内外学习、工作经历，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做出的深刻总结和思考，不仅饱含着沉甸甸的使命感、责任感，作者在研究方法、写作风格、理论探索上的大胆创新，也令人耳目一新。专著将前瞻性、战略性、理论性、实践性、应用性、可读性融为一体，对于国家制定跨国并购战略以及学术界理论研究、企业实务操作，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应用价值。

概括而言，专著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一是具有战略高度，全球化视野。作者站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研究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问题。在系统阐述相关理论，建立跨国并购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密切结合中国实际进行深入分析。分析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面临的新形势、新特点、新问题、新机遇和新挑战。作者认为，从国家战略层面来看，人民币升值、缓解外汇压力、规避贸易壁垒、开拓对外投资新途径，获取战略性资源；从企业层面来看，开拓国际市场，获取国外先进技术和知名品牌，构建全球营销网络等，都将成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主要驱动因素。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起步晚，但发展速度快，主要集中在采掘业、技术密集型等具备一定优势的产业，并购地区主要集中于欧美发达国家，并购方式主要采用协议并购和控股合资方式。同时，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遇到融资渠道狭窄、政策支持乏力、跨国并购人才缺乏、中介机构不规范、缺乏并购后整合等的主要问题。

作者指出，应制定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的总体发展战略、经营战略、区域战略、行业战略、融资战略、进退战略、生产战略、市场战略等。并提出，成立全国跨国并购管理机构，如“海外投资管理委员会”，进行宏观协调和统一规划；加快跨国并购立法工作，制定“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法”，制定、完善跨国并购的法律规范，制定适用的操作方法和程序；修改中国跨国公司并购审批管理制度；完善外汇管理制度，放宽外汇汇出限制；加强国有资产的管理和监督，完善并购的财务管理制度；建立境外投资保证制度，建立企业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建立信息平台，降低信息成本；优化融资环境，拓宽融资渠道；提供税收优惠政策和鼓励措施；发展中介机构，培育涉外人才等政策建议。这些建议对于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二是注重结合实际，应用价值高。专著研究了跨国并购的主要类型：横向、纵向和混合并购，股权收购与资产收购、直接收购与间接收购、现金收购与换股收购、战略性收购与财产性收购等；研究了跨国并购实施流程：并购准备与策划阶段、并购实施阶段、并购整合阶段；研究了跨国并购的风险，主要包括：政治风险、战略风险、法律风险、信息风险、财务风险、反并购风险、文化整合风险、人力资源整合风险等；研究了跨国并购准备、实施过程的风险防范以及并购与文化、商务谈判等相互影响和关系；研究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国内外监管环境，主要目标国的并购监管环境等。

作者认为，目前中国超过 2/3 的国际并购案失败的重要原因是，并购企业不能适应东道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环境，没有迅速调整企业战略、领导风格、管理文化等，出现水土不服现象，为此，重点研究了并购风险问题。认为，政治风险主要表现在立法风险、行业禁止、国家安全审查等；战略风险表现在并购方向、并购规模、并购时机等，表现为：长期并购战略缺失、盲目追求多元化并购、并购战略缺乏匹配性等；法

律风险主要包括反垄断、东道国外资法对海外并购的管制及劳工风险、知识产权、环保风险、间接征收等；信息风险则包括信息收集与沟通困难、财务报表信息不完备、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障碍等；财务风险包括并购前准备阶段、实施阶段的风险；文化整合风险体现在并购前缺乏对企业文化的评估，没有关注双方企业文化差异，忽略有效的文化整合等；人力资源整合风险表现在组织中员工角色模糊、关键人才流失、缺乏有效沟通等。为此，作者从产业整合并购战略、产业扩展型并购战略、新产业构建型并购战略、基于资源与环境的并购战略等不同模式出发，提出了企业风险防范的主要措施：要有成熟的战略部署，做好战略风险控制，合理选择并购目标和中介机构，把握谈判技巧和策略，加强海外并购的法律风险评估，合理选择融资，加强并购后的人力资源整合、财务整合、文化整合等。这些研究针对性、指导性强，对中国企业并购操作极具参考价值。

三是文风质朴，通俗易懂。该书虽是一部学术专著，但改变了当前经济学界的八股研究模式，写作风格朴实自然、大气儒雅、深入浅出，体现出大家风范。作者运用大量的一手资料、经典案例进行研究，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功路径与教训解剖得十分透彻。如，联想并购 IBM、中国石油收购哈萨克斯坦 PK 石油公司、吉利集团并购瑞典沃尔沃公司、三一重工并购普茨迈斯特公司、大连万达并购美国 AMC 影院公司、双汇收购史密斯菲尔特、华为收购英国著名电信供应商马可尼公司、中海油公司收购优尼科公司、TCL 集团收购法国汤姆逊公司等，这些都是近年来中国企业重大的并购案例，既有成功经验，又有失败的教训，可以说是“窥一斑而见全豹”，收到很好的示范效果。

四是注重国际比较研究，充分借鉴国际经验。专著对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主要目标国的并购法律体系、并购审查标准、并购审查门槛、并购审查程序等特点和差异进行研究。研究了跨国并购常见的法律问题，如跨国公司并购我国企业的待遇标准、产业政策、审批制度、并购引发垄断等问题，同时也分析了中国跨国并购过程中存在的法律问题，如并购的审批管理、外汇管理、国有资产管理、财务管理、政策法律支持等。这些对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具有重要借鉴作用。

正如作者所言，中国企业要想成功实施跨国并购，光有钱是不够的，还需要熟悉国际规则，充分认识国际形势，了解国外的政治、法律环境和经济、文化特点，普及跨国并购知识，大力培育跨国并购人才。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经济体来说，软实力是十分重要的。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刘英奎

加快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

——第三届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民间高层论坛综述

徐洪才

摘要：2014年4月12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日本日中产学官交流机构和韩国贸易协会在日本东京召开“第三届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民间高层论坛”，来自中日韩的100余位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参会。与会者认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到了关键阶段，应突破政治等障碍，加快谈判进程；中日韩经济一体化应该“双轮驱动”，在推进FTA谈判的同时，需加强产业合作，特别是节能、环保和金融合作。

关键词：中日韩 FTA 产业合作 环境治理 金融合作

作者简介：徐洪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研究员。

一、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与会者一致认为，目前世界经济重心正在向亚洲、特别是向东亚地区转移，中日韩自由贸易区（FTA）谈判到了非常关键阶段。中日韩FTA进程已远远落后于全球经济发展潮流。不少与会者坦率表达了对中日韩FTA谈判迟滞的焦虑，认为这给三国经济合作

带来了巨大损失，期望 FTA 谈判能够早日达成协议。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经济参赞明晓东认为，建立中日韩 FTA 不仅符合三国的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促进本地区经济繁荣和发展。中国发展将给周边邻国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国积极参与亚洲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继续倡导并积极推动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中国经济越发展，越能给亚洲和世界经济带来发展空间。

日本经济产业省通商政策局局长铃木英夫指出，最近日本经济明显复苏，这对中韩经济发展都将产生正面影响。安倍经济学最受到重视的是“第三支箭”，今年 6 月日本政府还将出台一些新的结构性改革政策。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尽量减小消费税率调高的负面影响。目前，中日韩之间存在一些复杂的政治问题，日本希望不要因此阻碍三方经济合作。

韩国驻日本大使馆经济公使洪东昊认为，目前中日韩合作程度远没有达到欧美之间合作的水平，三国合作意识也远不如竞争意识，在政治和外交等领域存在很多困难。中日韩三国经济基础和所处发展阶段都不相同，有很多地方值得相互学习和借鉴，加强经济合作可以实现互利共赢。

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毕吉耀认为，中日韩互为重要贸易投资伙伴，在东亚经济一体化乃至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没有理由不推进 FTA 建设。中日韩 FTA 是深化东亚经济合作的“催化剂”，将有利于提升东亚经济合作水平。中日韩 FTA 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并行不悖，有利于东亚地区更好地同北美、南美、南亚、大洋洲等地开展经济合作，提升各国人民福祉。建立中日韩 FTA 适应了产业国际化分工需要，使各国比较优势与跨国投资更好地结合起来，可以创造出更高的效率和新的福利。

日本日中产学官交流机构特别顾问福川伸次认为，召开中日韩 FTA 民间论坛可以推动政府间谈判，建立中日韩 FTA 将扩大三国之间的供应链，推进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对 TPP 和 RCEP 起到引领作用，对新的产业革命和三国恢复信任关系做出贡献。日中产学官交流机构理事长清川佑二认为，东亚地区拥有稠密的产业链分工，占世界 GDP 的 20%，但也是世界上唯一没有达成 FTA 协定的空白区域，脱离了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建立中日韩 FTA 的必要性与日俱增。

韩国梨花女子大学国际学部教授崔炳镒认为，中日韩 FTA 谈判正在和时间赛跑。目前，中国经济正从青年期进入成熟期；日本经济已过了成熟期，并迎来全盛期。韩国经济也在经历类似发展阶段。中韩未来都将迎来老龄化社会，而日本将迎来超老龄化社会。未来东亚共同面临的挑战，就是老龄化社会带来的“银发海啸”，迫切需要转向创新型经

济，而中日韩 FTA 为此提供了重要契机。韩国贸易协会通商研究室室长朴天一认为，韩国已和世界上 46 个国家和地区达成 FTA 协议，正在积极推进和中日的 FTA 谈判。RCEP 以东盟为中心，东盟“10+6”共有 16 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难以达成高水准的 FTA。随着东亚经济一体化，达成中日韩 FTA 协议是必然选择。

二、中日韩 FTA 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与会者普遍认为，未来中韩之间、中日之间的垂直分工格局将会延续，日韩在技术、资本和经济治理机制等方面，都有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通过相互扩大开放，日韩可以分享中国经济发展成果，共同为亚太地区经济繁荣乃至全球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中日韩虽然存在分工差异，在很多领域也有竞争，但整体而言，机遇大于挑战，特别是中国新一届政府推进新一轮改革，蕴含着新的机遇，首先要让亚太地区分享这个机遇，特别是分享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机遇。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徐洪才认为，随着美国量化宽松（QE）政策退出渐成现实，一些新兴经济体先后出现金融动荡，亚洲金融危机似乎卷土重来。目前，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风起云涌，全球经济治理正在酝酿新的变革，世界贸易组织（WTO）多哈回合僵局已被打破，TPP 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谈判取得积极进展，但是亚洲地区 FTA 谈判困难重重，摆在中日韩面前的不仅是要加快推进三方 FTA 谈判，还需加快推进中日韩 FTA 与 TPP 和 RCEP 等区域性 FTA 谈判的融合。

日本庆应大学教授木村福成认为，中日韩 FTA 谈判要加快速度和提高质量。在速度方面，已进行四轮谈判，但未取得积极进展。TPP 谈判几乎是每星期一次，在谈判速度上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在质量方面，目前中日韩 FTA 谈判标准太低，因此，中日韩 FTA 和 RCEP 可能会边缘化。日本国际贸易体制研究所专务理事汤泽三郎认为，企业跨国活动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各国法律和监管规则不统一。例如，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反垄断等法律，不仅企业家不懂，专业律师也不明白。中日韩 FTA 应该统一相关规则 and 标准。

崔炳镒认为，东亚经济一体化遇到了各种阻力，客观存在一种排他性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无益于东亚地区经济合作和发展。中日韩有领土纷争，还有地区主导权争夺，这些都要尽快解决。亚洲共同体的观念非常重要，但需要顶层设计。中日、日韩合作应向德国和法国学习。TPP 和 RCEP 不是竞争关系，而是互补关系。如果中日韩 FTA 不能达到高标准，RCEP 将不会取得好的效果。对日本来讲，现在 TPP 谈判突出问题是农业；对韩方而言，中韩 FTA 谈判也是担心中国农产品大量涌入韩国。传统观念是出口越多越好，

这是重商主义带来的弊端。朴天一认为，要解决多个 FTA 造成不同规则冲突、导致“意大利面条效应”的问题。中日韩 FTA 应该对 RCEP 发挥引领作用。在关税壁垒、技术标准、相互认证，乃至非关税壁垒等方面，都要简化和统一。亚洲地区 TPP 和 RCEP 同时进行，现在很多东亚地区国家都把眼光转向 TPP，RCEP 前景可能很难乐观。

韩国新世界未来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李景姬具体分析了中日韩 FTA 不能签署的各种替代方案。她认为，如果中韩 FTA 先行签署，而中日韩 FTA 无法签署，那么韩国将选择加入 TPP，从中获得和日本未能签署 FTA 的效果。对中方来讲，如果中日韩 FTA 签署不了，而 TPP 先行签署，那么比起韩国和日本，中国在东北亚市场将变得更为不利，中国可能会失去主导地位。中国选项还有 RCEP，但是目前这个势头在减弱。对日本来讲，如果中日韩 FTA 无法签署，而中韩 FTA 先行签署，日本比中国和韩国在东北亚市场将变得更为不利，那么日本替代方案将通过 TPP 来弥补。总之，要综合考虑各种机会成本，而实现三国共赢最为重要。

三、推动中日韩尽快达成 FTA 谈判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晋平认为，中国推进 FTA 战略方面有三大任务：一是进一步放宽投资准入，特别是服务业扩大开放；二是推进中美、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推动中国在投资领域、特别是服务业开放；三是推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中国商务部研究院亚非研究所所长宋志勇认为，在 FTA 谈判各方关注焦点不同，日本关注投资市场开放、知识产权，中国关注农产品市场等。应该互相理解对方，考虑到对方发展阶段。中韩 FTA 相当一部分产品已经谈妥，但最关键的还是农产品，韩国更关注农产品，双方应该有个妥协，努力实现共赢。毕吉耀认为，在新形势下，中日韩 FTA 协定相关条款必须扩大覆盖面，除了关税减让、市场开放、原产地规则等内容，诸如扩大服务业开放、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标准、竞争中立等新议题也应逐步纳入谈判范围。还可考虑按照先易后难、互利共赢原则适当提高标准，拓宽市场准入范围，探索签订更高水平 FTA 的可行性和经验，为深化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打造中日韩与东盟 FTA 协定升级版提供参考，也有利于更好地和 TPP、TTIP 对接。

日本庆应大学教授渡边赖纯认为，2013 年全球共有 255 个双边 FTA，日本签署了 13 个双边 FTA，现在日本的努力重心在东亚地区。中日韩 FTA 应在包括市场准入、报关程序、出口限制、通信、知识产权、投资自由化、政府采购等方面达成共识。面对来自欧洲、美洲，还有 TTIP 的挑战，中日韩 FTA 需要以开阔视野进行定位。福川伸次认为，实现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和产业结构高端化，是中日韩 FTA 和东亚经济一体化追求的

三大战略目标，中日韩政治家应该从东亚经济整体利益出发，强化战略合作意识。汤泽三郎认为，中日韩 FTA 谈判主要从进口方面谈撤销关税壁垒，出口限制很少成为议题。日本工业材料、粮食等都依赖外国，过去美国限制日本大豆出口，最近中国限制稀土出口。应将出口限制设为讨论议题。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交流部部长许朝友认为，TPP 是一个高标准的 FTA，日韩现在都加入谈判，中国对此持开放态度。RCEP 是在东盟“10+6”范围内较低水平的 FTA，中日韩 FTA 不应完全成为 TPP 或 RCEP 的翻版，应该是一个中间版本。徐洪才认为，中日韩应该建立多层次合作机制，开展务实合作，在 20 国集团（G20）层面合作还有很大潜力，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 WTO 的合作还很不够。日本在八国集团（G8）中应发挥独特作用，韩国在 G20 平台上应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总体看，三国垂直分工格局将延续，很多方面是互补，而不是直接竞争；即便在某些领域出现水平分工，只要机会均等，也可以实现相互促进。

四、中日韩产业合作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认为，中国产业结构调整 and 改革开放，促使中国经济趋于内外均衡，为外资进入中国创造了有利环境，扩大了中日韩更高层次产业合作空间，但也会改变原有东亚产业分工格局。中国在东亚价值链位次不断提升，将促使合作方式改变。同时，也为欧美企业进入中国创造了空间，如金融、公共服务、电信、环保行业等，欧美企业越来越显现其竞争力，日韩企业将面对越来越多的欧美企业挑战。宋志勇认为，从产业互补性来看，目前日本优势仍然最大，韩国也有机会，而中国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所处位置属于正在从低端向高端走的过程中。总体而言，中日韩达成 FTA 谈判对日本和韩国发展机会可能更多。

徐洪才认为，近年来，中韩贸易增长较快，呈现赶超中日贸易之势。今年一季度，韩国对华投资规模超过日本。日本经常项目持续逆差，越来越多的韩国企业分享了中国经济红利，近期，中欧经济合作发展势头很猛。中国逐渐摆脱对外资和技术进口依赖，开始从主要依靠“引进来”的单向资本流动，逐渐变为“引进来”和“走出去”并存的双向资本流动。中国与发达国家产业分工，也开始由过去垂直分工转向水平分工。但是，中国仍处在城镇化、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将释放出巨大市场需求，为中日韩深化经济合作提供机遇。许朝友认为，中日韩产业垂直分工关系还将持续，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需求的多样性，尤其是中西部地区仍然需要大量日韩产业转移。东亚经济一体化有助于该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更有利地位。

福川伸次认为，在中日韩产业合作过程中，农业、制造业、信息业和金融业曾是先导性行业，今后人的价值将变成新的发展方向，例如：健康、保健、医疗、护理、体育、育儿等将得到优先发展。还有文化产业，例如：时装设计、城市景观、舞台艺术和影视文化等都有很大潜力。日立制作所执行役常务田边靖雄认为，2008 年日立曾遭遇生存危机，现仍在调整业务结构，重点是成本控制、外包业务、将供应链延伸到海外。与中韩合作让日立公司受益匪浅，日立希望尽快达成中日韩 FTA 谈判，降低关税和物流成本；同时也希望中韩政府扩大开放采购市场，切实保护知识产权。未来三国应加强在水资源、环境保护、清洁能源、信息技术、粮食和养老服务等领域合作。

崔炳镒认为，中日韩经济发展在制造业、电子信息、金融服务等方面还有 20 年左右的差距。目前，中韩服务业效率相对较低，东亚地区都在朝着老龄化社会迈进。因此，要转向创新型经济，推动服务业的合作。中日韩经济一体化的理想模式是应该加强供应链垂直分工，不仅要废除关税壁垒，还要深化产业合作。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副院长郑恒昆认为，中日韩产业有很大相似性，竞争越来越激烈，短期内还难以大幅度降低某些领域关税，如农产品；中国服务业部门开放度不够，阻碍了日韩企业进入。从本质上讲，中日韩 FTA 就是结成经济联盟，但是，目前来自政治方面的阻力太大。

五、加强中日韩节能、环保产业合作

赵晋平认为，中日韩经济合作应该走“双轮驱动”的道路，在加快中日韩 FTA 谈判的同时，加强产业合作。中日韩产业合作重点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深挖产业合作潜力，深化技术和产业合作；二是加强资源和能源合作；三是加强技术创新合作；四是推动新兴产业合作；五是通过制定共同产业标准，特别是技术标准，使其成为全球性标准。中华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商会常务副会长黄晓军指出，“十二五”末期中国环保产业将达到 5 万亿元人民币投资，其中政府资金起到重要引领作用，民间资金（包括外资）将发挥主导作用。中日韩环保产业合作重点领域：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泥处置，土壤修复，噪音污染、生活与工业垃圾处理等。中国环境保护部规划院研究员逯元堂认为，中国环保产业仍处在快速成长期，近年环保产业年均增速大概在 30% 以上，产业利润率也远高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平均水平。很多地方政府都把发展环保产业作为发展经济重要抓手。去年以来，中国政府加快制定大气、水和土壤污染治理的法规，特别是推行“第三方治理”新政，将为中日韩环保产业合作创造巨大空间。

许朝友建议，中日韩未来产业合作应逐步向均衡分工合作方向发展，应与 FTA 谈判同步推进。FTA 为产业合作提供更加开放公平的市场环境，产业合作也是三国建立统一市

场的途径，不仅有助于推进中日韩 FTA，也有益于三国相关产业更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中国京东环保产业园开发公司董事长王志国认为，中国环保产业具有广阔发展前景，对日韩技术、资金以及经验都有强烈需求，加强中日韩环保产业合作贵在落实。目前，北京大气雾霾治理十分紧迫。河北省香河正在打造京东环保产业基地，定位于聚集环保产业新技术引进、研发、孵化及推广应用，为环保设备、技术及产品展览提供一个平台。

福川伸次认为，近年来，世界经济复苏缓慢，根本原因就是人类创新能力停滞，遭遇资源能源瓶颈。中日韩应在电子信息、通信技术、生命科学、高端制造、能源高效利用、新能源等方面共享技术信息，加强高层人员交流，合作开展产学研共同研究。木村福成认为，中日韩产业结构存在很多类似、重叠和雷同，需要进行生产网络合理分工；现在关税问题谈得较多，但是产业分工更重要。目前，中小企业贸易成本太高，中日韩 FTA 不仅要为大企业服务，更要让中小企业获益。

日本自动车工业会副会长名尾良泰认为，近年来中日韩汽车行业合作势头迅猛，得益于快速增长的汽车及其零部件贸易以及中国市场，三国相互依赖关系加深。中日韩都把汽车产业作为支柱产业，今后应形成无缝体制，统一技术标准和知识产权保护。达成一个高标准的 FTA，将有助于三国产业健康发展。日本东丽涉外企划室室长前田一郎认为，2011 年日本大地震以来，日本能源、环保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在探索能源结构多样化。三年前日本核电停下来，石油、天然气、煤炭等化石能源占比上升到了 90%。新的政策鼓励智能型消费，包括风力和地热发电。今后，日本将用海水中的氢进行发电，尤其是面向家庭和汽车的应用。核电方面，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也在探讨恢复应用。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开发研究中心主任黑岩郁雄建议，加强中日韩在智慧网络领域合作，政府支持产学研在新兴产业、环境保护、能源、老龄化领域开展共同研究，推动技术创新。在研发方面，统一技术标准，消除关税壁垒，提升三国竞争力。

韩国机械研究院前任研究员李锡奂认为，韩国能源进口占到韩国全部进口的接近 1/3，尽管能效在提升，但人均能耗仍在扩大。已经推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并计划扩大柴油普及率，增加生物乙醇使用；计划到 2017 年将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环保产业贡献率增加到 5.9%。中日韩在环保产业合作、特别在大气污染治理方面，需要加强政策协调。韩国产业研究院前任研究员张锡仁认为，中日韩产业合作应首先在战略上形成共识，适应全球产业结构升级潮流，在产业分工上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减少重复和资源浪费，消除不必要的市场竞争。韩方能源管理公团课长朴庆洵认为，韩国对日本恢复使用核电政策保持关注。韩国正在扩大可再生能源使用，并在探讨智能电网问题。环保方面，韩国正在改进废弃物处理及其余热利用技术，包括将有机物转换成沼气，以及减

少二恶英的产生。中日韩应加强智能化的技术合作。

六、中日韩迫切需要加强金融合作

与会者还对中日韩金融合作展开讨论，认为汇率竞争性贬值无益于中日韩经济发展的整体利益，也不利于亚洲金融稳定。徐洪才认为，中日韩乃至亚洲地区经济一体化，迫切需要创造一个稳定的金融环境。目前，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存在严重缺陷：各国所承诺投入的外汇资金，并未放在统一实体机构里面，而是放在各国央行资金库里。一旦发生危机，临时注资将影响救助效率。应建立危机快速反应机制。具体措施是，参照国际清算银行（BIS），成立亚洲清算银行（BAS），为亚洲各国货币清算提供一个平台。BAS 的职能主要是处理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货币清算，代理有关银行业务，定期举办央行行长会议。该行采取股份公司组织形式，资金来源包括：成员国的股本、各国央行借款、吸收机构存款或发行债券。在此基础上，开展五项合作：一是成员国间贸易和投资采取本币结算；二是结算差额部分采取其他国际货币最终结算；三是建立亚洲汇率稳定协调机制；四是推进亚洲金融市场融合，特别是亚洲债券市场发展；五是加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铃木英夫认为，近期日元急速贬值遭到批评，但是日本为了摆脱长达 20 多年通缩局面，日本央行采取超级宽松货币政策是迫不得已，并非是人为操纵。木村福成认为，亚洲地区汇率波动频繁、各自为政，对亚洲经贸活动产生了负面影响，企业过多承担了汇率风险和汇兑成本。中日韩应深化金融合作，特别是在建立亚洲汇率稳定机制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韩国产业研究院前首席研究员、早稻田大学国际学术院教授朴向俊认为，从三国贸易看，中国对日本顺差，日本对韩国顺差，韩国对中国顺差，相互深度依存，形成一个“金三角”。日元大幅贬值，虽然不会影响中韩之间贸易，但会影响到中韩对美国、对欧洲贸易。近年来，中日韩汇率竞争越来越激烈，相互贸易规模很大，而且都用美元结算，积累了巨量的外汇储备，汇率波动和走势分化对东亚经济整体造成负面影响。韩国外国语大学国际通商学科教授金民宁认为，中日韩 FTA 要避免汇率竞争，可借鉴欧洲创造欧元的经验，建立亚洲汇率稳定机制。亚洲各国储蓄率很高，但是资本市场不发达，影响了企业融资和储蓄转化成为投资。亚洲资本市场要加快融合和统一，阿里巴巴不应该到美国纽约上市，而应该在中国上市。

责任编辑：刘英奎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2014年4月份以来，国际机构对世界经济形势、中国经济形势，以及全球化进行了分析和判断。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对世界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全球经济将继续保持复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朱民4月13日表示，今年全球经济将继续保持复苏，但力度不够强劲，同时面临通胀水平偏低、金融市场波动和地缘政治等多重风险。

朱民认为，受金融危机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目前全球实际产出还低于潜在产出水平，加之石油和食品价格下滑导致进口制造业产品价格下降，全球的通胀水平偏低。要关注有哪些全球性外部冲击可能会引起低通胀转向通缩，以及采取哪些措施来避免这一风险。

朱民认为，今年全球金融市场将持续波动。一方面，全球资产开始重新定价，这一转变过程尚未完成。另一方面，市场关注今年底美联储结束购债计划后，会否转向对其资产负债表进行调整，这可能会对未来的利率水平产生影响。

朱民强调，乌克兰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虽然乌克兰本身经济规模比较小，但俄罗斯经济走弱会通过投资、贸易和侨汇收入三个渠道对周边国家经济增长产生很大影响。

（二）世界经济复苏正在缓慢进行

4月14日，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埃利亚松指出，在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五年之后的今天，世界经济复苏正在缓慢进行，但危机所产生的影响依然存在。

埃利亚松说，世界许多地区的经济呈现积极势头，但五年前爆发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影响依然没有成为过去，一些严重的风险依然存在，例如，增长不充分、失业情况严重、不平等现象加剧等。

（三）世界贸易与全球经济同步进入温和增长

法国《费加罗报》4月21日报道称，根据世界贸易组织4月14日公布的数据，世界贸易2012年增长2.3%，2013年增长2.1%。同期全球生产总值增速分别是2.3%和2.2%。世界第一大出口经济体欧洲的衰退、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放缓等因素可以解释这一现象。鉴于美欧出现的经济复苏，世界贸易也可能自2014年开始并且在2015年恢复一点活力。

全球经济和贸易史远非线性发展，而是可分解成三个十分明晰而对比鲜明的时期。

自上世纪40年代末期到1974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国际贸易每年的增速是世界生产总值增速的1.5倍。这是重大胜利，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达到顶点的保护主义失败了，西欧则得以重建并几乎追上了美国。自1974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国际贸易增速相反地慢于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国际化的停顿同油价攀升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有关。新的风云变幻伴随着“全球化”而始于1989年。“全球化”这个词就在那时出现。在这个第三阶段中，世界贸易增速达到生产总值增速的两到三倍。

这样的贸易加速是史无前例的，并且它涉及的是全球各个大陆。世贸组织首席统计学家休伯特·埃斯凯思说，它反映了生产链碎片化的开始。这种现象自1994年先从欧洲随后在北美出现。它体现了一场真正的革命：无论是汽车还是智能手机，一个国家不再制造一整件产品。自此，生产链超越国界，每个国家都专门精于制造这样或那样的零件。这就是“世界制造”。

世贸组织强调，这种国际劳动分工在冷战结束后首先出现在德国，然后在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以高速传播开来。这是国际贸易炫目式增长的由来。但现在，国际价值链已经确立。因此，国际贸易增速不再有任何理由可以超过生产增速。

（四）世界经济回到健康成长状态尚需时日

欧洲国际政治与经济中心主任、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克·埃里克松认为，世界经济已经走出了困扰其五六年的危机，但是要回到健康的成长状态还需时日。下行风险依旧明显，而且在世界经济恢复的道路上充满了不稳定因素。由于一些欧洲国家的政府在过去几年中过于依赖扩张性货币和财政政策，现在应该对其引发的副作用给予关注。尽管与去年相比，我们对世界经济更为乐观，但这种乐观的前景基础并不牢靠。

（五）全球经济增长将加快

渣打银行日前发布题为《转型中的世界》的全球经济研究报告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会加快，同时波动和风险也会上升。

报告认为，今年将会是多个国家同时发生转型的一年。尽管存在风险，但也不必将波动和转型误认为危机。在持续变幻的全球经济环境中，新兴市场的应对能力得以提高。

报告指出，世界经济的主要构成部分正在经历形式各异的转型。美国从缩减量化宽松规模开始，正由较长期的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向常规化货币政策。报告预计，从美国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利率预期看，首次加息的时点大约在 2015 年 6 月左右。欧元区内部的支持或提振整体增长，报告预计，欧元区内投资尤其是预算受约束较小的北部国家的投资将会增加，这有助于南部国家重获竞争力，提振私人消费和经济增长。

（六）未来两年世界经济缓慢复苏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5 月 6 日发布经济展望报告说，世界经济将在未来两年继续缓慢复苏，发达经济体增速将有所提升，而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速将低于往年。

报告说，考虑到许多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整体增速放慢，经合组织将 2014 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从去年 11 月公布的 3.6% 下调至 3.4%，2015 年增速将提高至 3.9%。

经合组织秘书长安赫尔·古里亚表示，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加速将带动世界经济复苏。其中，美国经济复苏态势最稳健，增速有望在 2014 年达到 2.6%，2015 年提升至 3.5%。欧元区经济在经历连续三年的衰退之后，将在 2014 年和 2015 年分别实现 1.2% 和 1.7% 的增长。日本由于继续实行必要的财政整顿政策，未来两年经济增速将从 2013 年的 1.5% 下降至 1.2% 左右。新兴经济体中，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和南非六国 2014 年平均经济增速将达 5.3%，2015 年提高至 5.7%。

报告说，经合组织成员国（除日本外）实施财政整顿对经济复苏带来的负面影响将大幅减少，有利的财政环境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继续推动经济增长。报告预测，经合组织成员国整体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将在 2014 年和 2015 年分别达到 2.2% 和 2.8%。

二、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中国平衡发展有益于全球经济

前世界银行驻华首席代表、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经济资深兼职教授鲍泰利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不可避免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中国政府希望看到的。中国经济过去 30 多年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这已经创造了历史奇迹。任何经济体增长都有

回落的时候。其实，过去 10 多年来，中国的制造业、房地产和投资等领域已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这些下滑无疑会影响经济增长。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深化改革决议，更加严肃地对待平衡发展的问题，有意通过大胆的经济结构改革来改变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中国经济放缓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经济增速放慢，但并非大幅度放慢，更不是硬着陆。

鲍泰利认为，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过去多年来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特别是 2008 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引擎作用甚至超过美欧总和。中国经济平衡发展，对中国本身、对全球都可能会带来短期的阵痛。这种阵痛可能也会持续几年。但长远来看，这有利于世界经济稳定。

对于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前景，鲍泰利教授认为，中国未来 10 年-15 年的经济增速可能会比过去要慢，投资、出口等在经济中的比重也会继续下降。但是，中国仍将保持较快的速度发展，仍将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2014 年，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实现 7.5% 的增长，甚至可能会达到 7.6% 或 7.7%。

（二）中国经济正经历再平衡

渣打银行日前发布了题为《转型中的世界》的全球经济研究报告。报告认为，中国经济正经历再平衡，私人消费和服务业日益成为重要的经济活动推动力。家庭收入提高和利率升高应会进一步拉动私人消费。与此同时，利率市场化应有助于信贷状况保持紧张，并伴随着去杠杆化过程。中国面临着艰巨的平衡任务：经济再平衡与保持经济增长达到足够的水平。

（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中国经济增速预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 4 月 28 日发布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经济展望》中将今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期上调至 7.5%，比去年 10 月的上一次预期提高 0.3 个百分点，预计明年经济增速将达到 7.3%，同样比上次预期高 0.3 个百分点。IMF 表示，中国经济增速将放缓至“更具有可持续性”的水平。如果中国经济放缓幅度较预期大，将给亚洲地区带来大规模的不利影响，特别是与中国相关的供应链地区及商品出口国家。

（四）中国经济进入温和增长的“新常态”

大华银行的最新研究报告称，随着中国进入改革、结构重组和再平衡的新阶段，其经济也进入温和增长的“新常态”，这一缓慢增长势头有可能延续到 2014 年第二季度。该银行认为，中国政府已经对潜在的增长阻力做出了切实的响应，只是政策较为温和且更具针对性，这与全球金融危机后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截然相反。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也认为，中国近期经济增长的放缓可能已经企稳，但进入二季度的复苏步伐将仍较缓慢。他表示，对未来中国经济逐步温和复苏的前景展望是建立在外需小幅复苏，以及随着近期温和的促增长措施得到落实、基础设施投资有所反弹的基础上。预计未来中国将出台更多促增长措施，但规模不会太大，包括对铁路和保障房建设、环保和清洁能源的投资，以及加快结构性改革步伐，以释放包括民间投资在内的潜在的国内需求。

（五） 经合组织下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测

经合组织 5 月 6 日发布报告，预测中国经济 2014 及 2015 年增速为 7.4% 及 7.3%，比去年 11 月展望报告分别下调 0.8 和 0.2 个百分点。

报告指出，信贷条件进一步紧缩，投资需求随之回落，中国经济在 2014 年初期出现 GDP 增长放缓。投资增长由 2009 年的 20% 峰值，降至今年第一季度的 8%。经济增长虽有所放缓，但中国整体失业率仍维持在低位。报告称，随着中国城镇化的深入，以及一些行业即将对私人投资的开放，中国未来两年的经济增长仍将高于 7.25%。

三、对全球化的主要观点

（一） 全球化水平仍未超越 2007 年顶部

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一份最新报告，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中，全球金融流动陡降，到目前为止仍大大低于 2007 年高点。报告称，商品和服务的流动已经超越 2007 年的高点，相比之下，金融流动仍比危机前水平低将近 70%，占全球 GDP 的比重也从 21% 降至 2012 年的仅 5%。

在麦肯锡的报告中，全球化的下降是一个次要主题，大部分内容强调的是积极方面。报告指出，在连通性方面，新兴市场正在迅速追赶发达经济体，如果信息科技扩散和新兴市场繁荣的趋势持续下去，到 2025 年全球流动将提高两倍，从而提升经济增长。麦肯锡的报告中用来定义全球化的“流动”包括 5 种：商品贸易、服务贸易、金融流动、人口流动，以及数据交换和跨境交流。报告指出，目前 35% 的商品都是跨境的，而 1990 年这一比例为 20%。全球超过 1/3 的金融投资为国际交易，1/5 的互联网流量为跨境。相比之下，人口和服务流动的国际性较低。

根据麦肯锡新编的“连接性指数”，排名居前的 10 个国家和地区分别是德国、香港、美国、新加坡、英国、荷兰、法国、加拿大、俄罗斯和意大利。美国排名靠前的主要原因是它在人口流动方面居于全球首位，而韩国和日本总排名分别为第 20 和 21 位，因为它们在人口流动方面排名靠后。中国总排名是第 25 位。

（二）中国企业全球化两大悖论：高投入没高回报，好战略无好成绩

4 月 16 日，世界经济论坛与博斯公司联合发布《中国企业全球化最佳实践：应对运营挑战》（下称《报告》），对 125 家领先的中国全球化企业进行调研，深入解析中国企业的“走出去”现状、挑战，以及解决之道。

《报告》称，2012 年数据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2008 年-2012 年，按投资目的地划分，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北美和欧洲的增长最为显著。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气势。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在 2012 年总计达到 878 亿美元，2008 年-2012 年间 12% 的 5 年复合增长率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雄踞榜首。通过研究不同行业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报告》发现，2008 年-2012 年间增长最快的领域集中在制造、矿产和批发零售领域。

《报告》称，从地区角度看来，北美和东南亚是最常被中国企业提及的扩张目的地，但也有超过四成的受调研企业计划在未来 5 年内扩大进入欧洲或拉丁美洲，而中东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北亚地区也受到了明显的关注。在扩大地域覆盖面的同时，中国企业也越来越多地考虑在海外市场中建立除市场营销外更多的职能部门并打造相应的能力。在未来 5 年，八成以上的受调研企业计划在海外市场中建立或扩大其销售运营或服务部门。与此同时，有六成的企业计划在未来 5 年内将研发或生产职能迁至海外市场。中国企业还致力于在海外市场中建立战略能力，增长最快的企业职能集中在品牌、人才和技术三个方面。而从中国企业的 5 年规划中不难发现，品牌和人才作为战略目标的重要性已超过市场份额。

《报告》以全球化投入指数（GEI）来衡量企业的全球化工作。《报告》研究了中国 100 大跨国公司的数据，结果发现，企业的 GEI 得分和其业务成功之间并没有统计学上的关联。与最初设想大相径庭的是，无论是在海外还是在中国市场，中国企业的远大理想和切实行动并不能保证带来实际的业务增长。

责任编辑：刘英奎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一、世界经济

表1 2012年-2015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预测值	2015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2014年1月)				
世界	3.2	3.0	3.6	3.9
发达国家	1.4	1.3	2.2	2.3
美国	2.8	1.9	2.8	3.0
欧元区	-0.7	-0.5	1.2	1.5
日本	1.4	1.6	1.4	1.0
发展中国家	4.9	4.7	4.9	5.3
印度	4.8	4.6	5.4	6.4
俄罗斯	3.5	1.3	1.3	2.3
巴西	1.0	2.3	1.8	2.7
世界银行(WB, 2014年1月)				
世界	2.5	2.4	3.2	3.4
发达国家	1.5	1.3	2.2	2.4
发展中国家	4.8	4.8	5.3	5.5
英国共识公司(Consensus Forecasts, 2014年5月)				
世界	2.4	2.5	2.9	3.2
美国	2.8	1.9	2.5	3.1
欧元区	-0.7	-0.5	1.1	1.4
日本	1.4	1.5	1.3	1.3
印度	4.8	4.6	5.4	6.0

注:IMF公布的世界及分类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进行汇总,世界银行和英国共识公司按汇率法进行汇总。

表2 2012年-2015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预测值	2015年 预测值
世界	2.7	2.7	4.3	5.3
发达国家				
出口	2.1	2.3	4.2	4.8
进口	1.1	1.4	3.5	4.5
发展中国家				
出口	4.2	4.4	5.0	6.2
进口	5.8	5.6	5.2	6.3

注:包括货物和服务。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年4月。

表3 2012年-2015年消费者价格涨跌率(上年=100)

单位:%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预测值	2015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2014年4月)				
发达国家	2.0	1.4	1.5	1.6
美国	2.1	1.5	1.4	1.6
欧元区	2.5	1.4	0.9	1.2
日本	0.0	0.4	2.8	1.7
发展中国家	6.0	6.1	5.5	5.2
印度	9.4	10.1	8.0	7.5
俄罗斯	5.1	6.8	5.8	5.3
巴西	6.0	6.2	5.9	5.5
英国共识公司(Consensus Forecasts, 2014年5月)				
世界	3.0	2.7	3.1	3.1
美国	2.1	1.5	1.8	1.9
欧元区	2.5	1.4	0.8	1.3
日本	0.0	0.4	2.6	1.8
印度	9.4	9.8	7.7	7.0

注:英国共识公司的印度数据指财政年度数据。

表 4 2013 年 4 月-2014 年 4 月消费者价格同比

上涨率(上年=100) 单位:%

年份	月份	世 界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2013 年		3.3	1.6	5.8
	4 月	3.1	1.3	7.0
	5 月	3.2	1.5	7.1
	6 月	3.6	1.8	7.6
	7 月	3.7	1.9	7.7
	8 月	3.5	1.7	7.6
	9 月	3.4	1.5	7.8
	10 月	3.3	1.3	7.9
	11 月	3.5	1.5	8.0
	12 月	3.5	1.6	7.7
2014 年				
	1 月	3.5	1.6	7.5
	2 月	3.2	1.4	7.2
	3 月	3.4	1.6	7.4
	4 月	3.5	1.8	7.1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表 5 2013 年 4 月-2014 年 4 月工业生产相关指数

单位:%

年份	月份	工业生产指数 同比增长率(%)			JP 摩根全球制造业 采购经理人指数		
		世界	发达 国家	发展中 国家	全球 PMI	产出 指数	新订单 指数
2013 年		2.7	0.0	5.9			
	4 月	3.4	0.0	8.0	50.4	51.2	50.8
	5 月	2.0	-0.1	4.9	50.6	51.3	51.3
	6 月	2.0	0.0	4.9	50.6	51.4	51.5
	7 月	3.3	0.7	6.6	50.8	51.5	51.6
	8 月	2.6	0.8	5.9	51.6	52.3	53.2
	9 月	3.3	2.2	5.9	51.8	53.1	52.8
	10 月	3.3	2.4	5.3	52.1	52.9	53.3
	11 月	4.0	3.1	4.8	53.1	55.2	54.8
	12 月	4.0	3.3	5.3	53.0	54.9	54.4
2014 年							
	1 月	3.9	3.1	4.7	53.0	54.6	54.4
	2 月	4.6	3.7	5.1	53.2	54.6	54.6
	3 月	3.9	3.7	5.6	52.4	53.5	53.3
	4 月				51.9	53.0	52.7

注:1.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率为经季节调整的数据。

2.采购经理人指数超过 50 预示着经济扩张期。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二、美国经济

表 6 2012 年-2014 年 1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

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2 年		2.8	2.2	-1.0
	1 季度	3.7	2.9	-1.4
	2 季度	1.2	1.9	0.3
	3 季度	2.8	1.7	3.5
	4 季度	0.1	1.7	-6.5
2013 年		1.9	2.0	-2.2
	1 季度	1.1	2.3	-4.2
	2 季度	2.5	1.8	-0.4
	3 季度	4.1	2.0	0.4
	4 季度	2.6	3.3	-5.2
2014 年				
	1 季度	-1.0	3.1	-0.8

表 7 2012 年-2014 年 1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

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2 年		8.3	3.5	2.2
	1 季度	8.6	4.2	0.7
	2 季度	4.7	3.8	2.5
	3 季度	2.7	0.4	0.5
	4 季度	11.6	1.1	-3.1
2013 年		4.5	2.7	1.4
	1 季度	-1.5	-1.3	0.6
	2 季度	6.5	8.0	6.9
	3 季度	5.9	3.9	2.4
	4 季度	2.8	9.5	1.5
2014 年				
	1 季度	-2.3	-6.0	0.7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折年率计算(表 6、表 7)。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6、表 7)。

表 8 2012 年-2014 年 1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

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2 年		2.8	2.2	-1.0
	1 季度	3.3	2.2	-1.7
	2 季度	2.8	2.3	-1.3
	3 季度	3.1	2.2	0.2
	4 季度	2.0	2.0	-1.1
2013 年		1.9	2.0	-2.2
	1 季度	1.3	1.9	-1.8
	2 季度	1.6	1.9	-2.0
	3 季度	2.0	1.9	-2.7
	4 季度	2.6	2.3	-2.4
2014 年				
	1 季度	2.0	2.5	-1.5

表 9 2012 年 -2014 年 1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2 年		8.3	3.5	2.2
1 季度		10.5	4.7	3.0
2 季度		9.5	4.4	3.4
3 季度		6.5	2.8	2.4
4 季度		6.8	2.4	0.1
2013 年		4.5	2.7	1.4
1 季度		4.3	1.0	0.1
2 季度		4.7	2.0	1.2
3 季度		5.5	2.9	1.6
4 季度		3.4	4.9	2.8
2014 年				
1 季度		3.2	3.7	2.9

注:季度数据经季节因素调整(表 8、表 9)。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8、表 9)。

表 10 2013 年 4 月 -2014 年 4 月劳动力市场相关指数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失业率	非农雇员人数环比增加(万人)
		环比折年率	同比		
2013 年		0.5		7.4	219.1
4 月				7.5	20.3
5 月				7.5	19.9
6 月	1.8	0.1		7.5	20.1
7 月				7.3	14.9
8 月				7.2	20.2
9 月	3.5	0.5		7.2	16.4
10 月				7.2	23.7
11 月				7.0	27.4
12 月	2.3	1.4		6.7	8.4
2014 年					
1 月				6.6	14.4
2 月				6.7	22.2
3 月	-1.7	1.4		6.7	20.3
4 月				6.3	28.8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表 11 2013 年 3 月 -2014 年 3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增长 %	同比增长 %	进口额	环比增长 %	同比增长 %	出口额减进口额
2013 年	22723.2		2.8	27438.5		-0.1	-4715.3
3 月	1847.6	-1.1	-0.9	2213.2	-3.8	-5.5	-365.6
4 月	1873.1	1.4	1.7	2266.8	2.4	-1.8	-393.7
5 月	1869.1	-0.2	1.5	2305.7	1.7	0.0	-436.6
6 月	1910.6	2.2	3.2	2254.7	-2.2	-1.0	-344.1
7 月	1897.5	-0.7	3.5	2286.5	1.4	0.8	-389.0
8 月	1896.4	-0.1	4.2	2288.4	0.1	1.2	-392.1
9 月	1892.5	-0.2	1.3	2326.9	1.7	1.9	-434.3
10 月	1931.1	2.0	5.7	2328.8	0.1	3.4	-397.7
11 月	1946.4	0.8	5.1	2298.2	-1.3	-0.8	-351.7
12 月	1912.9	-1.7	1.4	2302.7	0.2	1.4	-389.8
2014 年							
1 月	1924.6	0.6	3.0	2317.4	0.6	1.2	-392.8
2 月	1899.6	-1.3	1.6	2318.4	0.0	0.7	-418.7
3 月	1939.1	2.1	5.0	2342.9	1.1	5.9	-403.8

注: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因季节调整,各月合计数据不等于全年总计数据。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普查局。

表 12 2012 年 -2013 年外国直接投资相关指数 单位:亿美元

年度	季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2 年		1605.7	3669.4	-2063.7
1 季度		354.3	1156.5	-802.2
2 季度		489.5	900.4	-410.9
3 季度		408.9	973.2	-564.3
4 季度		353.0	639.4	-286.3
2013 年		1875.3	3383.0	-1507.7
1 季度		291.2	884.9	-593.8
2 季度		397.4	996.2	-598.7
3 季度		582.3	950.8	-368.4
4 季度		604.3	551.2	53.2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三、欧元区经济

表 13 2012 年-2014 年 1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
增长率(环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2 年		-0.7	-1.4	-0.5
1 季度		-0.1	-0.3	-0.3
2 季度		-0.3	-0.5	-0.3
3 季度		-0.2	-0.1	-0.2
4 季度		-0.5	-0.5	0.0
2013 年		-0.5	-0.7	0.2
1 季度		-0.2	-0.1	0.3
2 季度		0.3	0.2	0.0
3 季度		0.1	0.1	0.4
4 季度		0.3	0.1	-0.2
2014 年				
1 季度		0.2		

表 14 2012 年-2013 年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2 年		-4.1	2.5	-0.9
1 季度		-1.1	0.8	0.0
2 季度		-1.8	0.9	-0.2
3 季度		-0.6	0.7	0.3
4 季度		-1.3	-0.6	-0.9
2013 年		-3.0	1.3	0.1
1 季度		-1.7	-0.9	-1.1
2 季度		0.2	2.3	1.7
3 季度		0.6	0.0	1.0
4 季度		1.1	1.2	0.4

资料来源: 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3、表 14)。

表 15 2013 年 3 月-2014 年 3 月劳动力市场相关指数 单位: %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就业人数环比增加(万人)	失业率
		环比	同比		
2013 年			0.41	-125.4	12.0
	3 月	0.27	-0.07	-71.2	12.0
	4 月				12.0
	5 月				12.0
	6 月	0.36	0.43	-5.9	12.0
	7 月				12.0
	8 月				12.0
	9 月	0.13	0.55	0.9	12.0
	10 月				11.9
	11 月				11.9
	12 月	0.20	0.98	10.5	11.8
2014 年					
	1 月				11.8
	2 月				11.8
	3 月				11.8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增长率;就业人数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环比变化。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6 2012 年-2014 年 1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
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私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2 年		-0.7	-1.4	-0.5
1 季度		-0.2	-1.3	-0.3
2 季度		-0.5	-1.3	-0.6
3 季度		-0.7	-1.6	-0.6
4 季度		-1.0	-1.5	-0.7
2013 年		-0.5	-0.7	0.2
1 季度		-1.2	-1.3	-0.1
2 季度		-0.6	-0.6	0.1
3 季度		-0.3	-0.3	0.7
4 季度		0.5	0.3	0.4
2014 年				
1 季度		0.9		

表 17 2012 年-2013 年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2 年		-4.1	2.5	-0.9
1 季度		-2.7	2.8	-0.7
2 季度		-3.9	3.3	-0.8
3 季度		-4.1	2.8	-1.0
4 季度		-4.8	1.9	-0.8
2013 年		-3.0	1.3	0.1
1 季度		-5.3	0.1	-1.9
2 季度		-3.4	1.5	-0.1
3 季度		-2.3	0.8	0.6
4 季度		0.1	2.6	1.9

资料来源: 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6、表 17)。

表 18 2013 年 3 月-2014 年 3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 亿欧元

年份	出口 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进口 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2013 年	18960		0.9	17365		-3.4	1595
3 月	1609	2.9	-0.5	1435	-1.4	-10.2	174
4 月	1601	-0.5	9.1	1452	1.2	1.6	149
5 月	1564	-2.4	-0.1	1424	-2.0	-5.8	140
6 月	1583	1.3	-2.9	1462	2.7	-5.3	121
7 月	1559	-1.5	3.3	1453	-0.6	0.3	106
8 月	1575	1.0	-5.6	1450	-0.2	-7.4	124
9 月	1588	0.8	3.1	1457	0.5	1.1	130
10 月	1585	-0.2	1.4	1451	-0.5	-3.1	134
11 月	1585	0.0	-1.9	1426	-1.7	-5.1	159
12 月	1567	-1.1	3.9	1419	-0.5	0.8	148
2014 年							
1 月	1586	1.2	1.0	1450	2.2	-2.6	137
2 月	1603	1.0	3.0	1453	0.2	0.1	150
3 月	1595	-0.5	-0.7	1443	-0.6	2.5	152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8 个成员国。贸易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贸易额,为经季节调整后的数据。

资料来源: 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9 2013 年 3 月-2014 年 3 月外国直接投资相关指数

单位:亿欧元

年度	月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3 年		851	1914	-1063
	3 月	45	200	-155
	4 月	163	238	-75
	5 月	566	128	437
	6 月	188	331	-143
	7 月	133	64	69
	8 月	287	291	-4
	9 月	-44	149	-193
	10 月	1788	1585	203
	11 月	46	245	-198
	12 月	-408	-311	-97
2014 年				
	1 月	160	250	-91
	2 月	-157	-465	308
	3 月	-222	-1	-222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8 个成员国。
欧元区外国直接投资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直接投资额。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

四、日本经济

表 20 2012 年-2014 年 1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2012 年		1.4	2.0	1.7
	1 季度	0.9	0.4	1.3
	2 季度	-0.4	0.4	-0.5
	3 季度	-0.8	-0.5	0.5
	4 季度	0.0	0.4	0.8
2013 年		1.5	1.9	2.2
	1 季度	1.1	1.0	0.6
	2 季度	1.0	0.6	0.9
	3 季度	0.2	0.2	0.2
	4 季度	0.2	0.4	0.5
2014 年				
	1 季度	1.5	2.1	0.1

表 21 2012 年-2014 年 1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2 年		3.4	-0.1	5.3
	1 季度	0.1	2.8	2.0
	2 季度	0.4	-0.5	1.4
	3 季度	-1.5	-4.0	-0.4
	4 季度	-0.2	-2.9	-1.9
2013 年		2.6	1.6	3.4
	1 季度	0.3	4.2	1.1
	2 季度	2.3	2.9	1.8
	3 季度	2.2	-0.7	2.4
	4 季度	1.6	0.4	3.5
2014 年				
	1 季度	2.9	6.0	6.3

表 22 2012 年-2014 年 1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2012 年		1.4	2.0	1.7
	1 季度	3.2	3.7	2.2
	2 季度	3.2	3.0	1.3
	3 季度	-0.2	0.9	1.5
	4 季度	-0.3	0.7	1.9
2013 年		1.5	1.9	2.2
	1 季度	0.0	1.5	1.4
	2 季度	1.2	1.7	2.7
	3 季度	2.3	2.2	2.5
	4 季度	2.6	2.3	2.2
2014 年				
	1 季度	3.0	3.5	1.2

表 23 2012 年-2014 年 1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2 年		3.4	-0.1	5.3
	1 季度	5.5	1.0	6.7
	2 季度	6.3	9.2	9.0
	3 季度	2.8	-4.8	5.0
	4 季度	-0.8	-5.0	1.0
2013 年		2.6	1.6	3.4
	1 季度	-1.3	-3.3	0.3
	2 季度	0.7	0.0	0.8
	3 季度	4.3	3.2	3.2
	4 季度	7.1	6.8	9.0
2014 年				
	1 季度	9.6	8.9	15.0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表 20-表 23)。

表 24 2013 年 4 月-2014 年 4 月劳动力市场相关指数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同比增长率	新增就业与申请就业人数之比	失业率
2013 年		1.1	1.46	4.0
	4 月	-1.0	1.39	4.1
	5 月	-0.8	1.42	4.1
	6 月	-2.0	1.48	3.9
	7 月	3.1	1.46	3.9
	8 月	0.3	1.48	4.1
	9 月	6.3	1.51	4.0
	10 月	6.3	1.57	4.0
	11 月	5.6	1.55	3.9
	12 月	6.9	1.61	3.7
2014 年				
	1 月	6.9	1.63	3.7
	2 月	7.1	1.67	3.6
	3 月	6.1	1.66	3.6
	4 月		1.64	3.6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日本央行统计月报。

表 25 2013 年 4 月 -2014 年 4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 亿日元

年份 月份	出口 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进口 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2013 年	697742		9.5	812425		14.9	-114684
4 月	57063	0.9	3.8	64497	0.5	9.4	
5 月	58667	2.8	10.1	66664	3.4	10.0	-7997
6 月	59042	0.6	7.4	65839	-1.2	11.7	
7 月	58296	-1.3	12.2	68014	3.3	19.7	-9718
8 月	59243	1.6	14.6	68084	0.1	16.2	
9 月	59072	-0.3	11.4	70454	3.5	16.7	-11382
10 月	59729	1.1	18.6	71738	1.8	26.3	
11 月	59719	0.0	18.4	73216	2.1	21.2	-13497
12 月	60955	2.1	15.3	72829	-0.5	24.8	
2014 年							
1 月	58884	-3.4	9.5	76400	4.9	25.1	
2 月	60452	2.7	9.8	71997	-5.8	9.0	-11544
3 月	58814	-2.7	1.8	75082	4.3	18.1	
4 月	59181	0.6	5.1	67627	-9.9	3.4	-8446

注: 月度贸易额为季节调整后数据。

资料来源: 日本财务省。

表 26 2013 年 3 月 -2014 年 3 月外国直接投资相关指数

单位: 亿日元

年份 月份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3 年	3624	133860	-130236
3 月	1109	9625	-8516
4 月	-465	13734	-14199
5 月	567	9173	-8606
6 月	997	9620	-8623
7 月	453	36886	-36433
8 月	355	5552	-5197
9 月	797	6183	-5386
10 月	-1152	7887	-9039
11 月	848	5135	-4287
12 月	489	18470	-17981
2014 年			
1 月	1042	12581	-11539
2 月	-1597	6339	-7936
3 月	4328	7376	-3048

资料来源: 日本财务省。

五、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

表 27 2012 年 -2013 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加拿大	英国	南非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2012 年	1.4	0.1	2.5	1.0	4.8	3.5
1 季度	0.8	0.6	2.7	0.8	6.0	4.8
2 季度	1.6	0.0	2.9	0.6	5.4	4.3
3 季度	0.8	0.2	2.2	1.0	5.2	3.0
4 季度	0.9	0.2	2.1	1.8	4.7	2.1
2013 年	2.7	1.8	1.9	2.3	4.6	1.3
1 季度	2.9	0.6	1.6	1.8	4.8	0.8
2 季度	2.2	1.8	2.3	3.3	3.2	1.0
3 季度	2.7	1.9	1.7	2.1	4.3	1.3
4 季度	2.9	2.7	2.0	1.9	4.5	2.0
2014 年						
1 季度		3.1	1.6			

注: 印度年度 GDP 增长率为财年增长率。

表 28 2012 年 -2014 年 1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韩国	墨西哥	中国 香港	中国 台湾	马来 西亚	印度尼 西亚
2012 年	2.3	3.9	1.5	1.5	5.6	6.2
1 季度	2.8	4.8	0.7	0.5	5.1	6.3
2 季度	2.4	4.4	0.9	0.1	5.6	6.4
3 季度	2.1	3.1	1.6	1.4	5.3	6.2
4 季度	2.1	3.3	2.9	3.8	6.5	6.1
2013 年	3.0	1.1	2.9	2.1	4.7	5.8
1 季度	2.1	0.6	2.9	1.4	4.1	6.1
2 季度	2.7	1.6	3.1	2.7	4.4	5.8
3 季度	3.4	1.4	2.8	1.3	5.0	5.6
4 季度	3.7	0.7	3.0	3.0	5.1	5.7
2014 年						
1 季度	3.9	1.8	3.0	3.1	6.2	5.2

表 29 2013 年 4 月 -2014 年 4 月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相关指数

单位: %

年份 月份	加拿大	英国	巴西	俄罗斯	南非
2013 年	7.1	7.7	5.5	5.5	
4 月	7.2	7.8	5.8	5.6	
5 月	7.1	7.8	5.8	5.2	
6 月	7.1	7.8	6.0	5.4	25.6
7 月	7.2	7.7	5.6	5.3	
8 月	7.1	7.7	5.3	5.2	
9 月	6.9	7.6	5.4	5.3	24.7
10 月	7.0	7.4	5.2	5.5	
11 月	6.9	7.1	4.6	5.4	
12 月	7.2	7.2	4.3	5.6	24.1
2014 年					
1 月	7.0	7.2	4.8	5.6	
2 月	7.0	6.9	5.1	5.6	
3 月	6.9	6.8	5.0	5.4	25.2
4 月	6.9		4.9	5.3	

表 30 2013 年 4 月 -2014 年 4 月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相关指数

单位: %

年份 月份	韩国	墨西哥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马来西亚
2013 年	3.1	4.9	3.4	4.2	3.1
4 月	3.1	5.0	3.5	4.2	3.0
5 月	3.2	4.9	3.4	4.2	3.3
6 月	3.2	5.0	3.3	4.2	2.7
7 月	3.2	5.1	3.3	4.3	3.0
8 月	3.1	5.2	3.3	4.3	3.1
9 月	3.0	5.3	3.3	4.2	3.1
10 月	3.0	5.0	3.3	4.2	3.3
11 月	3.0	4.5	3.3	4.2	3.4
12 月	3.1	4.3	3.2	4.1	3.0
2014 年					
1 月	3.2	5.1	3.1	4.0	3.3
2 月	3.9	4.6	3.1	4.2	3.2
3 月	3.5	4.8	3.1	4.2	3.0
4 月	3.7	4.8	3.1	3.9	

注: 1. 英国和中国香港月度数据为截至当月的 3 个月移动平均失业率。2. 加拿大、英国、韩国和中国香港为经季节因素调整后的失业率。

表 31 2013 年 3 月 -2014 年 3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加 拿 大			英 国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3 年	4588.6	4618.5	-29.9	5414.8	6545.3	-1130.5
3 月	397.5	391.5	6.0	469.3	548.6	-79.3
4 月	390.0	401.8	-11.8	454.9	525.0	-70.1
5 月	398.5	395.5	3.0	556.1	521.6	34.5
6 月	378.2	386.3	-8.1	471.5	542.5	-71.0
7 月	359.0	376.0	-17.0	468.0	544.6	-76.6
8 月	373.6	393.2	-19.6	416.0	511.1	-95.1
9 月	387.3	390.8	-3.5	433.6	577.2	-143.6
10 月	405.9	408.5	-2.6	458.5	605.0	-146.5
11 月	379.7	384.3	-4.6	425.2	596.5	-171.3
12 月	374.3	360.0	14.3	432.3	515.6	-83.3
2014 年						
1 月	368.6	346.0	22.6	437.0	566.5	-129.5
2 月	347.5	347.5	0.0	430.2	527.7	-97.5
3 月	397.5	391.5	6.0	469.3	548.6	-79.3

注:加拿大和英国数据经过季节因素调整。

表 32 2013 年 4 月 -2014 年 4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南 非			巴 西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3 年	959.9	1035.0	-75.1	2421.8	2504.5	-82.7
4 月	83.0	92.8	-9.8	206.3	226.1	-19.8
5 月	80.7	84.8	-4.1	218.2	220.2	-2.0
6 月	77.1	78.1	-1.0	211.3	196.8	14.5
7 月	87.7	93.3	-5.6	208.1	236.6	-28.5
8 月	80.3	90.9	-10.6	214.2	211.1	3.1
9 月	76.9	88.1	-11.2	210.0	197.0	13.0
10 月	85.0	95.2	-10.2	228.2	240.3	-12.1
11 月	84.3	84.3	0.0	208.6	200.0	8.6
12 月	74.2	72.2	2.0	208.5	190.4	18.1
2014 年						
1 月	71.4	87.0	-15.6	160.3	210.2	-49.9
2 月	75.4	74.8	0.6	159.3	188.9	-29.6
3 月	74.7	85.3	-10.6	176.3	183.6	-7.3
4 月				197.2	201.1	-3.9

表 33 2013 年 4 月 -2014 年 4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印 度			俄罗斯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3 年	3125.5	4658.0	-1532.5	5232.9	3429.8	1803.1
4 月	243.5	420.3	-176.8	444.8	302.4	142.4
5 月	246.4	447.1	-200.7	409.8	265.9	143.9
6 月	237.2	258.8	-21.6	418.4	281.9	136.5
7 月	255.4	380.2	-124.8	437.1	305.5	131.6
8 月	262.5	368.5	-106.0	425.3	287.3	138.0
9 月	278.6	342.2	-63.6	448.1	289.6	158.5
10 月	272.8	379.2	-106.4	434.7	305.4	129.3
11 月	239.3	336.6	-97.3	468.8	296.6	172.2
12 月	261.5	364.8	-103.3	494.5	323.9	170.6
2014 年						
1 月	264.6	362.1	-97.5	394.6	206.1	188.5
2 月	252.0	334.9	-82.9	365.3	241.1	124.2
3 月	295.8	400.9	-105.1	468.7	271.5	197.2
4 月	256.3	357.2	-100.9			

表 34 2013 年 4 月 -2014 年 4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韩 国			墨西哥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3 年	5596.3	5155.8	440.5	3801.9	3909.7	-107.8
4 月	461.6	436.5	25.1	328.6	349.4	-20.8
5 月	483.1	423.9	59.2	328.4	341.7	-13.3
6 月	466.9	407.2	59.7	310.3	309.4	0.9
7 月	458.3	433.8	24.5	322.1	345.1	-23.0
8 月	463.1	145.9	317.2	326.7	337.6	-10.9
9 月	446.5	410.6	35.9	313.9	315.1	-1.2
10 月	504.8	456.1	48.7	350.9	361.2	-10.3
11 月	479.1	431.1	48.0	317.0	321.5	-4.5
12 月	479.8	443.5	36.3	320.9	312.1	8.8
2014 年						
1 月	455.9	448.0	7.9	270.4	311.0	-40.6
2 月	429.3	420.5	8.8	305.2	304.2	1.0
3 月	490.9	455.4	35.5	333.1	332.2	0.9
4 月	503.1	458.5	44.6	340.7	345.3	-4.6

表 35 2013 年 4 月 -2014 年 4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3 年	5355.5	6222.8	-867.3	3054.4	2699.0	355.4
4 月	444.5	504.3	-59.8	250.4	227.4	23.0
5 月	441.7	522.5	-80.8	263.0	218.7	44.3
6 月	415.3	508.8	-93.5	264.9	231.8	33.1
7 月	454.1	528.0	-73.9	253.0	220.6	32.4
8 月	461.6	573.4	-111.8	256.4	210.4	46.0
9 月	466.7	537.9	-71.2	252.4	229.0	23.4
10 月	485.0	540.4	-55.4	267.1	225.9	41.2
11 月	471.9	551.5	-79.6	257.3	213.8	43.5
12 月	455.3	535.6	-80.3	263.8	241.6	22.2
2014 年						
1 月	437.1	505.8	-68.7	242.9	213.4	29.5
2 月	328.7	414.3	-85.6	212.9	197.2	15.7
3 月	439.3	514.6	-75.3	277.6	258.0	19.6
4 月				266.0	240.6	25.4

表 36 2013 年 3 月 -2014 年 3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3 年	2282.8	2060.1	222.7	1835.5	1873.7	-38.2
3 月	193.1	177.4	15.7	153.1	151.7	1.4
4 月	183.0	179.6	3.4	149.5	162.7	-13.2
5 月	184.9	175.4	9.5	157.6	166.2	-8.6
6 月	180.2	166.5	13.7	148.5	157.8	-9.3
7 月	190.3	181.4	8.9	154.0	177.4	-23.4
8 月	191.7	170.0	21.7	135.3	132.4	2.9
9 月	194.7	168.0	26.7	152.3	154.4	-2.1
10 月	211.1	185.2	25.9	158.4	157.6	0.8
11 月	194.5	164.1	30.4	158.3	150.6	7.7
12 月	202.3	172.8	29.5	169.4	154.0	15.4
2014 年						
1 月	193.6	174.4	19.2	143.9	152.1	-8.2
2 月	178.1	146.5	31.6	147.1	139.0	8.1
3 月	198.1	168.9	29.2	153.1	140.5	12.6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表 27-表 36)。

六、三大经济体指标对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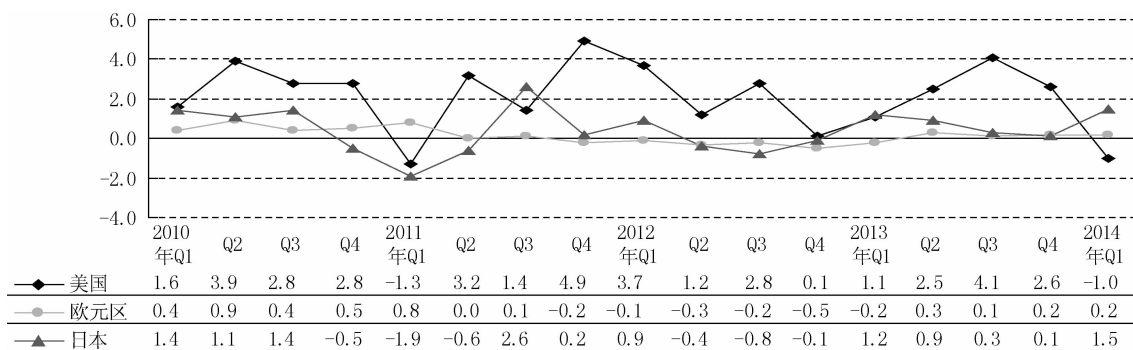


图 1 2010 年-2014 年 1 季度三大经济体 GDP 环比增长率(%)

注：美国为环比折年率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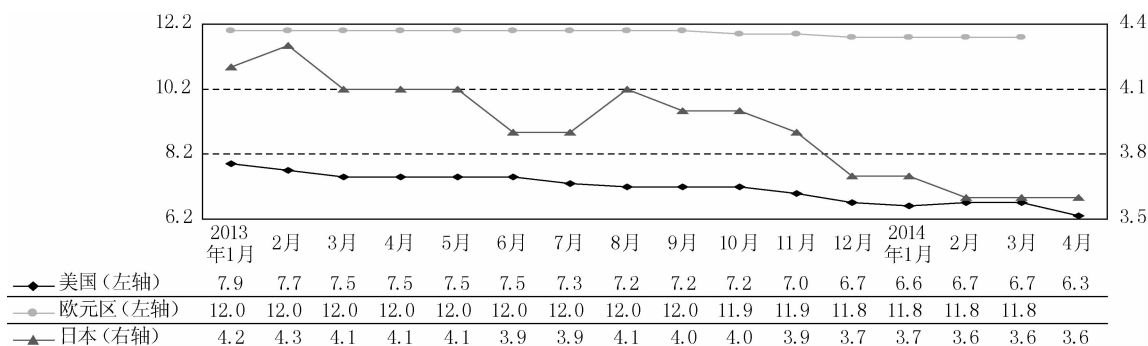


图 2 2013 年-2014 年 4 月三大经济体失业率变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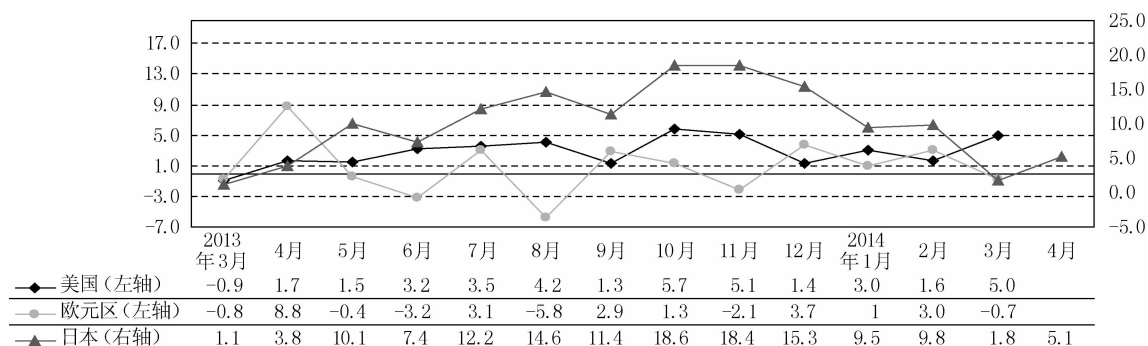


图 3 2013 年 3 月-2014 年 4 月三大经济体出口额同比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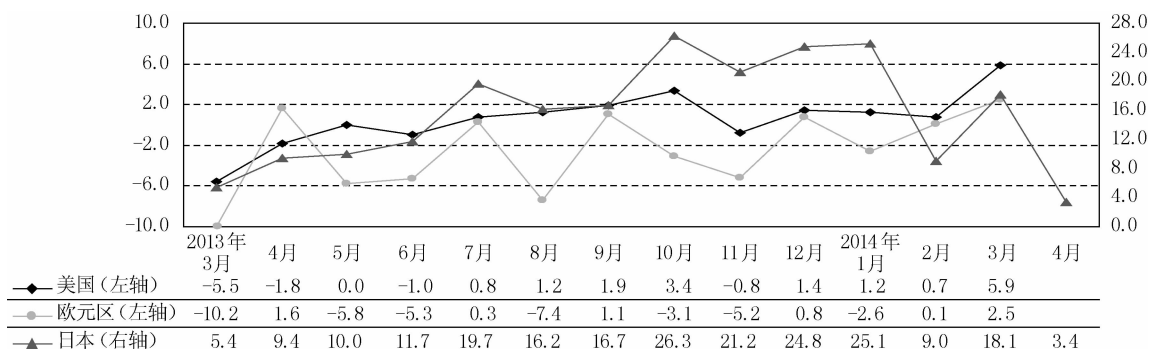


图 4 2013 年 3 月-2014 年 4 月三大经济体进口额同比增长率(%)

数据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图 1-图 4)。

ABSTRACTS

(1) The Evolution of Design and the Future-oriented Chinese Innovative Design

Lu Yongxiang

Design is human's advance conceiving, planning, and scheming to purposeful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activities, and original innovative creations by systematic comprehensive integration. As design creativity pushes forward social civilization, design evolves with the evolution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value ideas, methods and techniques, talents and teams, and so on of design also evolve continually. After more than 3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import, digestion, absorption, and innovation, China has become a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manufacturing power nowadays, but not a design creativity power. It's necessary to take innovative design as a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promoting the innovative design ability of China.

(2) The Present Development Pattern of China: Mechanism, Challenges, and Recommendations

Song Xiaowu and Tao Ran

Over the past more than 3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China succeeded in facilitating the rapid economic growth with a series of policy mixes. The China Model and the East Asian Model have both parallels and their own peculiarities. China goes into the pattern that local governments are overwhelmed by the pursuit of GDP growth in the reform process, which brings negative influences on economy, society, environment, and ecology.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six reform recommendations against the present development pattern of China.

(3) Risks in Economic Growth and Countermeasures

Han Yongwe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isks in China's economic growth in both long term and short term, and puts forward a series of deepening reform countermeasures for cracking difficult issues of development and resolving the risks in the economy. The countermeasures includes building a new pattern of the open economy, optimizing investment structure, perfecting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mechanism, deepening financial reform,

and so forth.

(4) Create New Thinking of Tackling Important Environment Events,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trategy

Yang Chaofei

This article makes a review of the important environment events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analyzes the major distribution areas and their features, development tendency and its features, and internet views of the environment group events, and puts forward some innovative measures for tackling group events.

(5) Thinking and Solutions of Resolving the Excess Production Capacity: Promote Industrial Transfer from the East to the West

Chen Wenling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auses of excess production capacity; makes a proposal of taking the industrial transfer from the East to the West a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resolve the excess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forming the better and stronger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and production capacity in our country; designs the guiding principles for resolving the excess production capacity, forecasts the possible risks that need active precautions, and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measures that need further research on their supporting measures.

(6) Pull Factors of the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of Chinese Enterprises: An Analysis of Host Countries Panel Data

Zhang Biqiong and Li Lun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s of host country factors on the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of Chinese enterprises based on a discussion of motivations and influencing factor mechanism of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Our research result, which is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host country panel data, shows that: the GDP of a host country has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of Chinese enterprises; the more higher the energy production of a host country is, the more higher its attraction to China's investment is; the widening of market openness of a host country promotes China's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the more developed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a host country is, the more investment it attracts from China. Finally, this paper makes some suggestions about optimizing the pattern of the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of Chinese enterprises.

(7) Prospects and Breakthroughs of Creating Upgraded China-ASEAN FTA

Kuang Xianming and He Dongni

With the complex changes of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situation, creating upgraded China-ASEAN FTA has become the top priority for China. Since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s becoming the highlight of eco-

conomic globalization in the new stage, propelling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FTAs in Asia shall become the strategic priority for deepening opening-up in China. We suggest that semi-EU should be the goal of the upgraded China-ASEAN FTA, striving for a significant breakthrough in three years and forming a new economic integration pattern in five years.

(8) The Way to Forging the Updated Version of Zhejiang Economy

Huang Yong, Pan Yigang, and Jiang Zhenlin

Forging an updated version of Chinese economy is a major strategic goal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the new period. This paper argues that, as an advanced area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Zhejiang needs urgently to accelerate some historical changes to achieve the goal, and take both action-oriented and reform-oriented readjustments and reform. Also, this paper proposes ten key indicators of common standards in the upgraded version of Chinese economy as a reference for the eastern coastal areas.

(9) Large-scale Engineering Contracting Enterprises to Implement the “Going Out” Strategy: An Example of the Business of Sinohydro Group Ltd. in Africa

Zhu Jie

Sinohydro Group Ltd. encountered some difficulties in implementing the “Going Out” strategy, and tried to take the following measures to solve the problem to expand business: to develop a long-term strategic plan for Sinohydro development in Africa; to raise funds for construction through multiple channels; to implement a “localization” business strategy;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high-end marketing talent; and to prevent risks fully.

(10) Accelerating the China-Japan-Korea FTA Negotiation: A Summary of the Third High-level Forum on China-Japan-Korea FTA

Xu Hongcai

On April 12, 2014, Chin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s, Japan-China Organization for Business, Academia and Government Partnership, and Korea International Trade Association jointly hosted the third High-level Forum on China-Japan-Korea FTA in Tokyo. More than 100 government officials, scholars and entrepreneurs from three countries attended the forum. Participants argued that China-Japan-Korea FTA negotiation has reached a critical stag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tackle political obstacles to speed up the negotiation. The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the Northeastern Asia should be driven by two-wheels: accelerating the FTA negotiation and strengthening mutual industrial cooperation, especially in energy sav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finance.

Editor: Xie Yunliang

“铁的新四军”红色记忆·经典美术作品展 征稿通知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深切缅怀新四军革命先辈在民族危亡之际砥柱中流，为夺取反法西斯战争和人民解放事业伟大胜利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同时昭展丹青名家并推书画新秀；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联合中国中共党史学会、文化部公共文化司等 8 家单位发起“铁的新四军”红色记忆·经典美术作品展活动，参展作品将在全国范围征集，经活动艺委会评选后的 320 幅优秀作品于 2015 年 5 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首展，之后在相关省市巡展并筹台海联展。同时活动中的部分甄选作品将捐由各大博物馆、纪念馆收藏，永世纪念、教育后人。我们诚邀全国画坛诸位艺术家与各界贤达加盟本次展览。

一、组织机构

（一）组委会

主 任：欧阳淞 蔡 武 陈昊苏

副主任：李忠杰 杨志今 左中一 王占生 邓淮生 薛德堂 毋瞩远 黄如军

委 员：张永新 张光东 韩铁成 桂建平 叶小楠 何光耀 乔泰阳 张淮流

刘延淮 周善平 赵黎明 邓小燕 张末生 彭 华 吴长江 赵长青

葛 华 颜 宁 张士明

（二）主办单位

中国中共党史学会 文化部公共文化司 中组部党建读物出版社

中国美术家协会 中国书法家协会 中国新四军研究会

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 中国海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三）承办单位

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四师淮北分会

中海外爱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四）协办单位

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安徽省、浙江省、河南省、湖北省、江西省、福建省、广东省、山东省、四川省、重庆市、广西壮族自治区等省（市、区）美协及新四军研究会

（五）军史专家委员会

寿小松 黄如军 耿成宽 徐维国 王传厚 张学忠 徐君华

（六）艺术委员会

名誉主任：刘大为

主 任：吴长江 **副主任：**徐 里 杜 军 **秘书长：**丁 杰

二、展出日期、地点

2015 年 5 月（拟定），中国国家博物馆

三、展出规模

本次展览展出美术、书法作品 320 余幅，其中特邀美术名家名作百余幅，全国征稿入选优秀作品 100 件，同书法作品共同展出。评选委员会由中国美术家协会聘请专家组成。

四、作者待遇

1. 该展评选出的优秀作品作者具备申请加入中国美协会员的一次条件。
2. 优秀作品 100 件（税前收藏费：中国画作品 50 件；15000 元 / 件。油画作品 50 件；25000 元 / 件）。
3. 画展将出版画册，每位参展作者均可获赠一本。
4. 组委会向参展作者颁发证书。

五、参展要求

1. 参展作者需提供送展作品照片 1 张（10 寸以上）参加初评，照片注明：姓名（以身份证为准）、标题、详细联系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初评入围者接到电话通知后邮寄原作（送原件地址另行通知），同时通过邮局汇寄 150 元评选费进行终评，初评未入围作者不另行通知，照片不退。终评落选作品退件。

2. 参展作品一律为原始真实创作，如检测后发现作者使用高仿作品参评，中国美术家协会将在三年内拒绝此作者参加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任何展览活动。

3. 初评投递作品照片，相同作品照片如反复多次投递，中国美术家协会将视为无效稿件取消参评资格。

4. 送件要求：中国画幅尺寸不小于 6 尺整张，横竖不限；油画画芯尺寸：不小于 1 米×1 米。送件作品背面右下角请用铅笔写明：姓名（以身份证为准）、标题（和画面相同）、尺寸（高×宽 CM）、详细联系地址、邮编、联系电话、身份证号码，送件须妥善包装并挂号或特快专递邮寄，防止邮寄中破损遗失。

5. 收作品照片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15 年 1 月 31 日止，以收到地邮戳为准。

6. 联系方式。收件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沙滩一号院 32 号楼 A 座 710，邮编：100083；收件人：张英财；联系电话：（010）59759683。画展信息可登录 www.caanet.org.cn（中国美术家协会网站）查看。

六、特别声明

1. 主办单位、承办单位对参展作品有展览、研究、摄影、录像、出版及宣传权。
2. 凡送作品参评、参展作者，应视为已确认并遵守征稿启事的各项规定。

中国美术家协会

2013 年 12 月

2014 年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 暨 1984 年莫干山会议 30 周年纪念 征文启事

1984 年 9 月，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史称“莫干山会议”。2012 年-2013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联合有关单位创办“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并连续举办两届莫干山会议，取得一批重要研讨成果。

今年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又是 1984 年莫干山会议 30 周年纪念，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再次牵头筹备“2014 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暨 1984 年莫干山会议 30 周年纪念”，拟于 2014 年 9 月 17 日-21 日在北京和浙江莫干山同时举办。会议主题暂定“创造公平、开放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国治理”，拟邀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和改革专家出席，特别是一些曾经对中国改革进程具有重要影响的国际知名学者。

为选拔优秀中青年学者出席论坛，现开始在全国范围征文，对象为 55 周岁以下，对改革开放和国家治理问题有独立思考和深刻见解的中青年学者。会议鼓励作者以真切的现实关怀、深邃的历史眼光、宽阔的国际视野，融合运用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方法，科学研究我国国家治理中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问题，主题包括但不限于：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中国的经济外交和全球战略、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金融改革、混合所有制、生态文明建设、边疆和民族问题等。

请于 2014 年 8 月 15 日前将论文电子版（以及对论坛有关建议）同时发至：fcsunny627@gmail.com、brendaxiel04@163.com，或邮寄至论坛秘书处（北京市西城区白云路 1 号 7 层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100045，请在信封注明征文投稿）。论文请严格按照学术规范格式，包括题目、摘要、关键词、正文和参考文献，字数一般限制在 10000 字以内，并注明作者年龄、单位、电话和电子邮箱等信息。论文评选工作将于 8 月底完成，并确定邀请出席莫干山会议代表名单，论坛秘书处还将为获奖论文进行奖励（2013 年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征文共评出：一等奖 1 名，奖金 3 万元；二等奖 2 名，奖金各 2 万元；三等奖 3 名，奖金各 1 万元。获奖名单见<http://mgs.icc-ndrc.org.cn/detail.aspx?newsId=3442&TId=57>）。优秀论文将推荐给国家权威学术期刊，并收录《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莫干山会议·2014）文集》。会议不收取参会费，提供免费食宿，交通费用自理（有困难可申请资助）。

有关“2014 年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暨 1984 年莫干山会议 30 周年纪念”会议筹备详情，请关注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官方网站（www.icc-ndrc.org.cn）。

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莫干山会议）组委会秘书处
2014 年 4 月 28 日